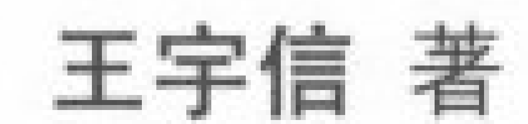
HISTORY Students

中国读本

西周史话


王宇信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 版 说 明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这是半个世纪前我们祭祀轩辕始祖——黄帝时留下的华美篇章。

我国是有着6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不懈的考古挖掘，还在不断延伸着她的历史源头。放眼全球，我泱泱中华，江山多娇；检点历史，我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周易》到《诗经》，自《天问》而《警世钟》，六七千年，流淌不息。这里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浩然博大，也有"何必马革裹尸还"的坦荡豪壮；既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贞刚烈，也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忠奸判定。曾经长时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的进步无私贡献出了自己无数的珍藏。

曾几何时，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打倒孔家店"的激愤一度让很多人盯上了西方的月亮。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让媚外的思潮重新暗流涌动。但与之同时，过度物质化了的西方国家，却把他们的目光重新投向东方文明的古邦，试图从中找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方。为此，我们曾一度犹豫彷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

说不清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曾经徘徊在一些人心头的迷茫逐渐扫去，重视传统，回归本源，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持续进步的动力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她的真实面貌，发扬她的优秀传统，规划她的锦绣前程，是当代中国人既严肃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脉络者，我们的历史是最应珍视的一笔遗产。但中国历史博大精深，古籍文献、文书档案浩如烟海，一部中国史，真不知从何处说起！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社约请、组织在史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一辈历史学家，精心编撰了这套《中国读本》丛书（中国历史史话分卷）。本分卷共16分册，分别是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上、下）、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上、下）、五代、宋朝、元朝、明朝、清前期和晚清。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作者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以大手笔撰写小文章，在各分册中，对该断代的重大事件、经济发展、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社会生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发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既有专业的厚度，又不乏诙谐和幽默，文笔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历史是一个辉煌的存在，历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启迪之学，我们衷心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能从这套丛书中寻到灵感，从6000年历史积淀中汲得智慧，熔铸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崭新的智慧王国。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年6月1日

开 头 语

——略说西周

当你走进历史博物馆宽敞明亮的陈列大厅，马上就会被琳琅满目的周代文物所吸引。看吧，那身饰夔纹的周初“利簋”，记述了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不由得你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牧野之战”的壮烈场面，耳边仿佛有3000多年前商郊牧野战场上刀剑交鸣、杀声震天的声音在萦绕；前不久发现的“何尊”，一看见它，马上就会使人想起成千上万被迁到洛邑的殷朝遗民，承担了沉重的营建东都洛邑的劳动情景；看到“大盂鼎”，更使我们似乎于无声处听到了被赏赐给贵族的那些人们离乡背井的心酸哭喊声……

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西周铜器收入你的眼底，不仅它们的铸造艺术会使你叹为观止，流连忘返；而且它们上面的一篇篇铭文也会打开你求知的心扉。在你为我们的祖先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文明而感到自豪的时候，不禁会想到：我国历史上的西周王朝是怎样兴起的？她又是怎样发展到了我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期？她是怎样走向灭亡的？

周族原是活动于我国西部地区渭水流域的一个古老民族，始祖名弃，以擅长农艺著称，尧时被任命为农官。弃在舜时还曾与大禹一起治过水，因治水有功被封于邰地（今陕西武功县），称姬姓。从弃的曾孙公刘至古公亶父，先后共有10代人居住在豳地（今陕西彬县、旬邑县一带）。后来古公亶父为躲避戎狄，寻求新的安身之地，不得不率领族人迁居周原（今陕西岐山、扶风交界一带）。

古公亶父在周原这片肥美的土地上，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设官分职，建立宗庙、宫殿和城郭，革除戎狄之俗……周人的早期国家已颇具雏形，俨然成为商王朝西部地区的重要方国；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与商王朝关系更加密切，居然娶了商女太妊为妻，并被商王朝封为“牧师”。季历不断对周围戎狄部落用兵并屡得胜利，大批俘虏被转化为周人奴隶。就在季历向四周发展周族势力的时候，被商王文丁借故杀死，商人与周人从此结下世仇；季历的儿子姬昌即位，这就是后世有名的周文王。为报父仇，周文王一方面“阴行善以事纣”，一方面“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加紧发展周族力量。文王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灭掉了密、黎、邘、崇等方国。“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在周围各方国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成为名符其实的西方霸主——西伯。与此同时，文王广求贤才，当时的著名贤人如太颠、散宜生、闳夭（hóng yāo）、姜尚等都投奔到他的麾下，其中不少人在后来武王导演的灭商史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王还把都城从较偏僻的岐邑迁到交通较为方便的丰邑（今陕西西安沣水西岸），一心想继续向东方发展。文王苦心经营多年，灭商之势已成，但壮志未酬，不幸早逝了。

周文王的儿子武王姬发继承了文王的未竟事业，终于在商郊牧野的决战中取得了胜利，并乘胜攻进了朝歌，商纣王兵败身死。600 多年历史的商王朝顷刻瓦解，西周王朝在公元前 11 世纪建立了。周武王为了巩固统治，分封诸侯，设立三监。灭商以后二年，武王就病死了；此后，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为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周公面对“天下未集”的严重局势，“内弥父兄，外抚诸侯”，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并乘胜东征徐奄。经过三年多的东征平叛，终于彻底摧垮了殷朝遗民的反抗势力，使周王朝真正确立了对广大东部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周公还兴建了战略据点洛邑，迁一部分殷顽民到这里。此外，周公还进一步分封诸侯并制礼作乐，调整了周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内部关系，为西周王朝的统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此后，成王

和康王时期，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社会安定，西周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史称“成康之治”；昭王南征，穆王西行，西周王朝与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的交往也进一步加强了。

到了厉王时期，西周王朝每况愈下。厉王时阶级矛盾尖锐，灾异横生，民怨沸腾。但他仍然倒行逆施，终于被国人赶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从公元前 841 年起，西周王朝由周公和召公二位大臣共同执政，即所谓“共和行政”时期。14 年以后，周宣王即位，虽然他励精图治，取得了对西方戎人、猃狁和南方荆蛮、淮夷战争的胜利，史称“宣王中兴”，但“宣王中兴”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他“不藉千亩”和“料民于太原”的改革，虽使奴隶制经济稍有起色，但“落花有意春去也”，到了他儿子周幽王时，西周王朝在内外打击下终于灭亡了。

从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到幽王被杀西周灭亡，西周王朝共经 11 代，12 王，统治了约近 257 年。在我国先秦古籍中，有关这一时期的记载较少，因此要想全面恢复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难度较大。可喜的是，历年不断有西周青铜器出土，不少长篇巨制的铜器铭文，是我们研究西周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而西周考古工作的开展，特别是近年从周人早期都城岐邑，到丰、镐遗址以及东都洛邑，直到远离王畿地区的诸侯国齐、鲁、燕等边远地区，都不断有新的重大考古发现。考古学者把一座座“地下博物馆”和“地下档案库”打开了，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西周奴隶制社会由鼎盛到逐渐衰落这一过程的大批宝贵资料。

对西周时期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何时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即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目前还没有取得较为一致的结论。因此，学者们对西周社会性质的认识，也就出现了很不相同的意见。为了使读者能通过自己独立思考，正确认识西周社会性质，我们在这里把我国古

史分期问题的六种不同看法概要介绍如下：

一、“西周封建论”。持有这种观点的史学家认为，我国自西周始就已进入了封建社会。

二、“春秋封建论”。持这种观点的史学家认为，我国从春秋初年进入封建社会初期阶段——领主制，春秋后期又进一步实现了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化。

三、“战国封建论”。认为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界限应划在春秋战国之交，战国以后进入了封建社会。

四、“秦始皇统一中国封建论”。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时期是奴隶制的上升时期，春秋时期是衰落期，战国时代开始了向封建制的转变。而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封建制在全国确立的标志。

五、“东汉封建论”。持这种观点的史学家认为，我国从夏代至西汉时期是奴隶制的发展阶段，直到东汉以后才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六、“魏晋封建论”。持这种观点的史学家，把西周、春秋时期作为从原始公社解体向发达的奴隶制社会过渡的前期阶段，把战国、秦汉作为奴隶制社会的发展阶段。而汉魏之际，才由奴隶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

本书以“战国封建论”的古史分期为依据，把西周前期作为我国奴隶制的鼎盛期，而把西周中、晚期以后，作为奴隶制的逐渐衰落期处理的。至于如何经过春秋时期向封建社会过渡以及我国封建制在战国时期的确立，是后继两册春秋、战国史所要向读者们介绍的内容了。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很多优秀传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发扬光大。因此，我们也希望更多的青年朋友，能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传统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树立民族自信心，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使华夏大地再现辉煌！

目　　录

第三章　西周的灭亡和东周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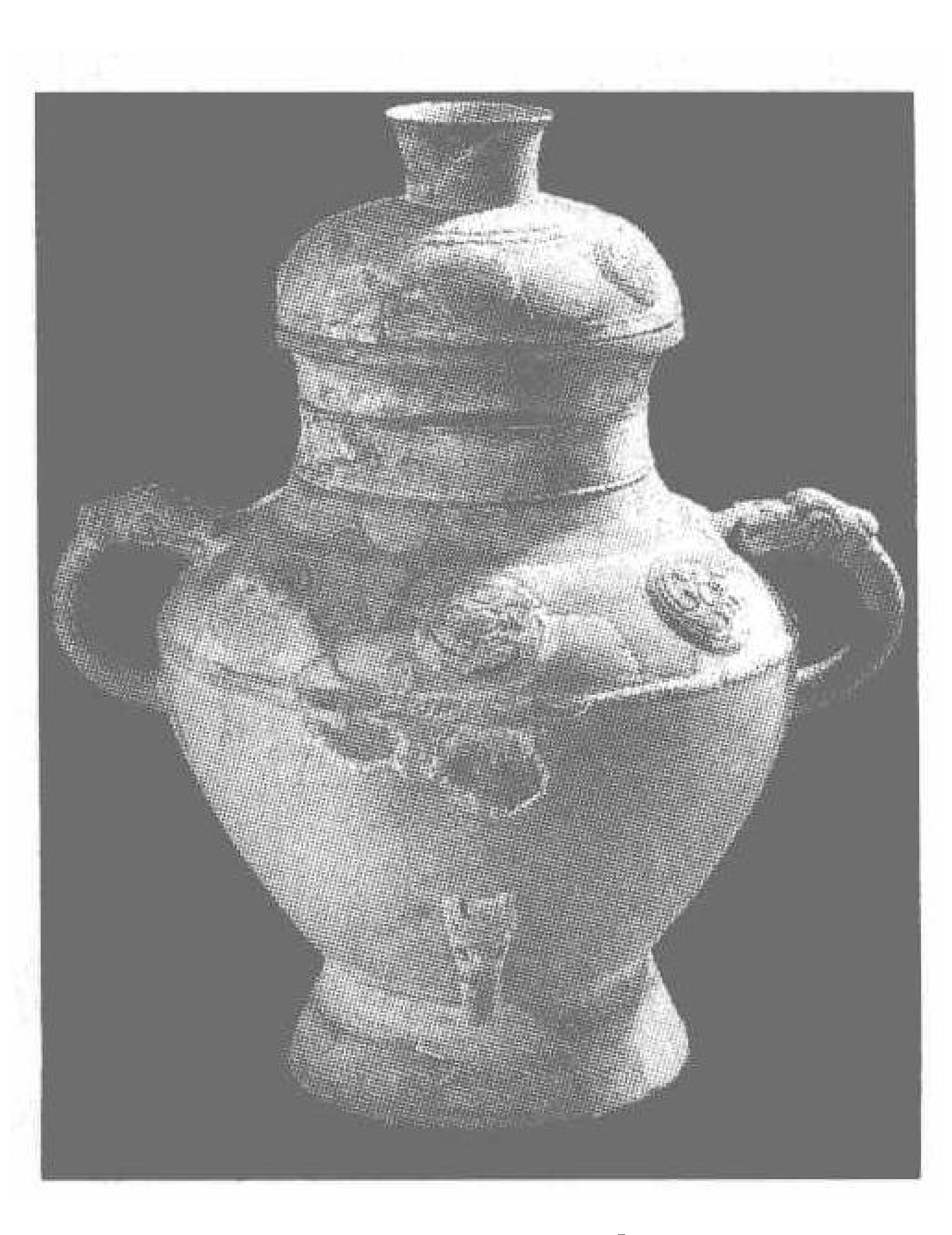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商朝灭亡和周朝的建立

西周（前11世纪—前771）是我国历史上继夏朝、商朝之后建立起来的第三个王朝。孔子曾经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对周王朝十分向往和憧憬。西周王朝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周因于殷礼"，西周不少典章制度都是从商朝继承而来的。因此，我们要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西周王朝的历史，就必须先从商朝后期谈起。

商朝后期，奴隶主阶级的生活非常奢侈腐化，不仅愈来愈加重了对广大奴隶和平民的剥削，而且还连年对外发动战争。特别是到了商王朝末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到处是一片"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尚书·微子》）、"如蜩（tiáo）如螗（táng），如沸如羹"（《诗经·大雅·荡》）的景象。

（一）"耽乐之从"和"酒池肉林"

盘庚迁殷以后，经过小辛、小乙等王，武丁继承了王位。由于商王武丁"修政行德"，使商王朝有了很大发展。武丁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在即位以前，曾"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尚书·无逸》）。据说武丁还是在当太子的时候，曾生活在民间，有所劳苦于王宫之外，并与"小人"——即奴隶和平民阶层有过接触。由于他比其他商王能较多地知道"稼穑（sè）之艰难"（《尚书·无



西周六涡纹缶

逸》)，所以即位以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不敢荒宁”，从而使“殷道复兴”。

武丁死后，他的儿子祖庚继承了王位。祖庚死后，根据商王朝继承制度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其弟祖甲即位。据传说，这位祖甲也曾到过民间，“旧为小人”，与奴隶和平民混迹在一起，所以他也比较懂得“小人之依”（《尚书·无逸》)。正因为他能够了解这些“小人”的谋生之道，所以他当了国王之后，才能够采取一些较为开明的措施。

但在奴隶社会里，像武丁、祖甲这样有作为的商王毕竟太少了。他们以后的各代商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尚书·无逸》)。这些自小就娇生惯养的商王们，根本不知道种庄稼的辛苦和“小人”们的艰辛，一登上王位，就尽情挥霍民脂民膏，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过度的淫逸，使他们“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尚书·无逸》）就一命呜呼，成了一个个短命鬼。

商纣王帝辛是商代最后一个王。据古书记载，商纣王非常聪明能干，不仅见多识广、口才善辩，而且力量过人，能徒手与猛兽格斗。据传说，纣王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有一次曾拉住牛尾，把九条牛拽得向后倒退；又有一次他用手托住宫殿的大梁，让人们从容地换掉梁下的柱子，面不改色。如此等等，商纣王凭着自己天资聪敏，非常看不起手下的大臣。他文过饰非，一意孤行，拒绝了大臣们向他提出的不少有利于治国安邦的忠谏。

商纣王对广大奴隶和平民的盘剥，比以前的各代商王更加厉害。他修了个方圆三里，高过千尺的鹿台。“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通过加重税收的办法，聚敛财富，把鹿台装得满满的。又修了个叫“钜桥”的仓库，装满了从各地搜刮来的粮食。他还把天下的狗马奇物运到都城，放满了宫室。与此同时，他特别宠爱一个名叫妲（dá）己的妃子，对她真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商纣王对商都雄伟壮丽的宫殿还觉土气，又在南到朝歌，北到沙丘、邯郸这样

广大的范围内修建了许多巍峨的离宫别馆，在御苑里放养了许多珍禽异兽，并在沙丘一带的离宫别馆里，修筑了“酒池肉林”。

为了满足商纣王等人永无休止的欲望，商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榨。奴隶主阶级与广大奴隶和平民处在尖锐的对立中。

（二）丧众与焚廪

商朝奴隶们对奴隶主的反抗，除了消极怠工、破坏农具，还有逃亡和焚烧奴隶主的仓库。

甲骨文里反映的最突出的就是奴隶的大量逃亡。逃亡的奴隶有刍（chú）、羌、仆、众、州臣等，甲骨文里常有“亡刍”、“亡羌”等记载。“亡”就是逃亡的意思。其中有一种奴隶的逃亡形式叫“丧众”。如：

1. “贞我其丧众人”。
2. “贞㚔（qín）其丧众”。
3. “□□卜，贞众作藉，不丧”。

所谓“众”或“众人”，就是商代的一种农业奴隶。甲骨文“众”写作日下三人形，古代“三”字代表众多，所以这个“众”字的原来意思就是在太阳下，有许多农业奴隶在田野上劳作。“众”这种农业奴隶要在国王或小臣、小藉臣等官吏监督下从事大规模的“协田”或“藉田”。他们一无所有，甚至连粗笨的石镰都要由奴隶主临时发给。战争时奴隶们还要充当士兵，成为奴隶主掠夺性战争的牺牲品。如甲骨文里有“丁未卜，争，贞勿令㚔氏众伐舌（gōng）〔方〕”，就是记载武丁攻伐舌方时，强迫众人去服役的记录。“丧众”就是奴隶逃跑了。各种奴隶（包括众和众人在内）只不过像牛、马一样是奴隶主阶级的一种财产，一旦逃跑，就等于丧失了一笔财富。因此，商王对奴隶发生逃亡的事情非常关

心，经常求神问卜。我们上面所举的甲骨文，第一条是贞问："我的众人逃亡了么?"第二条是问："㚔这个人的众人逃亡了么?"第三条是问："众人去翻地，不会发生逃亡吧?"所以在甲骨文里经常见到的"丧众"，就是关于众或众人大规模逃亡的记录。

奴隶一旦逃跑，奴隶主会马上动员人马跟踪前去追捕，这在甲骨文里也有很多记载。

武丁当朝的某年十二月，有几个奴隶逃跑了。商王十分着急，马上命令卜人用龟壳进行占卜说：逃跑奴隶能抓住么？商王对贞人的卜问还不放心，又亲自看了卜兆，自己判断说：老天爷保佑，在第二天甲戌日或第三天乙亥日就能抓到了吧？可是卜问了好一阵子，老天爷也没有在龟版上显灵。第二天就适逢甲戌日，逃跑的奴隶到了河边，匆匆登上河边停泊的一条船上想渡过河去，但人地不熟，仓猝之间船又陷在了河里。可是老天爷并没有在龟甲上透露一丁点儿将要发生奴隶陷船的征兆。商王不知奴隶们的去向，结果奴隶们还是逃跑了。过了 15 天以后，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丁亥日将奴隶抓到。有一版武丁时的大龟腹甲，把这次追捕奴隶的经过记载下来：

> 癸酉卜，亘，贞臣得。王占曰：其得唯甲乙。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旬有五日丁亥幸。十二月。
>
> 癸酉卜，亘，贞〔臣〕不其得。

为了杀一儆（jǐng）百，逃跑的奴隶一被抓回，就要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有的被用乱箭射杀，有的被砍去头颅，有的被锯下大腿，有的被用作祭祀祖先的牺牲……

奴隶主对广大奴隶的残酷镇压，只能激起奴隶们更为强烈的反抗。他们不仅继续大规模逃亡，还掀起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商王朝的统治基础。

有一天，殷王派了一批仆奴到受（màn）地的田里去除草，又

派了另一批宰奴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田里去除草。虎狼似的监工挥着鞭子，对奴隶们又打又骂，激起了他们的反抗。

到了晚上，奴隶们汇集到一起，手持棍棒、石铲和火把，向奴隶主高大的粮仓奔去。经过与粮仓守卫士兵的激烈搏斗，一把大火把堆满粮食的仓库点燃。紧接着又烧着了第二座、第三座。三座仓库熊熊燃烧的烈火把黑暗的夜空照得通明……

一个晚上就有三座粮仓被暴动的奴隶们烧掉了，商王武丁吓得目瞪口呆。这不仅使奴隶主损失了大批粮食，还使他们祭祀祖先的大事也受到了影响。商王武丁一直在担心着这类事件的发生，不惜使用整版的牛胛骨，几次进行贞问，其中有一版是这样记录的：

〔癸已卜〕，争，〔贞〕旬〔亡〕祸。二；王占曰：有祟，叀光其有来艰。迄至六日戊戌，允有〔来艰〕，有仆在叀，宰在□，其□薅，亦（夜）焚廪三。十一月。

这些甲骨都是用大字刻写并在字口里涂上了朱砂，反映了商王武丁对奴隶们焚廪暴动的恐惧心情和对这一事件的重视。

奴隶们的逃亡和暴动，不仅在甲骨文里，而且在古代文献里也有记载。据《尚书·牧誓》和《左传·昭公七年》记载，"纣为天下逋逃主"，反映了殷末帝辛时奴隶们的逃亡是非常频繁的。

（三）攘窃神坛与太师、少师奔周

广大的平民阶级，不少与奴隶主阶级同出于一个祖先，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奴隶主阶级的剥削压榨，两极分化得较为厉害。到商朝末年，不少平民已一贫如洗，或由于"负债"、"犯罪"而沦为奴隶。只有少数人地位在逐步上升，成为奴隶主阶级的一员。

商朝平民阶级两极分化的现象，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反映。1953 年和 1958 年先后两次共在安阳大司空村发掘了 217 座平民墓。这些平民墓没有奴隶主墓葬规模那样大，殉葬物也不丰富，殉人也

没有贵族的墓葬多；但平民墓与那些身首异处、四肢不全的奴隶葬坑不同：一般都有葬具和多少不等的随葬品。特别是不少平民墓内都有贝币出现。反映货币流通在这时已经相当普遍了。1953 年发掘的 165 座平民墓中，有贝币随葬的达 83 座，其中最多一座出土 20 枚，少者一枚，以每墓出土一枚贝币者为多。有 5 座殉有奴隶，但也有 7 座墓中一无所有。1958 年发掘的 51 座平民墓中，发现有贝币随葬的墓有 11 座。每墓随葬贝币多少不等，一般以随葬一贝为多，最多的一座墓内随葬贝币竟达 83 枚之多。

自由民的分化，使商王朝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复杂。破产的平民没吃没喝，而奴隶主却把整猪整羊和珍馐美味放到神庙里当作供品。有的穷苦平民把奴隶主土地上的庄稼全部抢走。更有的平民铤而走险，使用暴力，吓得奴隶主无论在外面还是在家里都胆战心惊。平民的破产和反抗，与奴隶们的逃亡和暴动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冲击着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基础。商王朝大贵族微子启深感形势的不妙，他惊呼："现在商朝治国无人，就像被无边无际的大水包围着，马上就要有灭顶之灾了！"

不仅如此，就连一些贵族和方国诸侯也对商纣王的倒行逆施感到不满。商纣王不仅毫无改悔，反而变本加厉。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制定了一系列野蛮的刑罚，镇压那些敢于表示不满的人。特别残酷的是，他把大铜柱的上面涂满了油，又在下面燃起熊熊的炭火，让那些触犯了刑法的"罪人"光脚在铜柱上走，铜柱又滑又烫，"罪人"没走几步就掉在炭火里活活烧死。商纣王和妲己就在一旁看着这种惨状取乐，并给这种刑罚取名叫"炮格之法"（也有的书上叫做"炮烙之刑"）。

西伯昌（即周文王）、九侯、鄂侯在各方国诸侯中有很大影响，被商王朝封为"三公"。纣王时，"三公"也一个个"获罪"，使不少诸侯感到自危，与商王朝的关系愈来愈疏远了。三公"获罪"是从九侯开始的。原来，九侯有个漂亮的女儿被商纣王看中了，谁知道这个美丽、正直的女孩子却不愿陪伴商纣王寻欢作乐。商纣王讨

了个没趣，便勃然大怒，把她杀掉还不算，又迁怒她的父亲，九侯也被砍成了肉酱。鄂侯看到九侯实在死得冤枉，在纣王面前为他据理争辩了几句，也被纣王无辜杀死。西伯昌听到二人惨死的消息，伤心地叹了口气。但隔墙有耳，被一个名叫崇侯虎的商王心腹听到了，马上报告了纣王。西伯昌也因此锒铛入狱。

西伯昌被关进了羑（yǒu）里（今河南汤阴县境）暗无天日的监狱以后，周族的大臣闳夭、散宜生等人多方营救他。他们挑选了美女，又搜集了很多珍宝和名马，献给商纣王。贪财好色的商纣王一看到周人送来了这么多礼物，马上下命令把西伯昌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西伯昌回到周国以后，为了讨好纣王，又献出了大片的土地。西伯昌为了笼络人心，借机请求纣王废除残酷的“炮格（烙）之法”。昏庸的商纣王得到了美女、财宝，又得到了大片土地，不禁心花怒放。他不仅痛快地答应了西伯昌废除“炮格（烙）之法”的请求，还加封姬昌为西方诸侯的首领，赏赐给他斧、钺等象征权力的礼器，使他可以代表纣王征伐西方的小诸侯方国；与此同时，商纣王残害忠良，宠信佞臣费仲和喜欢说人坏话的恶来。恶人当朝，更使大臣和诸侯们感到寒心。

在西伯昌的治理下，周国一天天强盛起来。不少从前依附于商王朝的诸侯相继离叛而去，转以西伯作为自己的靠山。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构成对商王朝的严重威胁。纣王的叔父比干十分着急，谏阻纣王要注意国家的危险局势，可是纣王一点也听不进去；贤人商容，虽然威信很高，商纣王却嫌他碍手碍脚，将他削职为民，再也不能参与政事。西伯昌为了窥探商王朝的国力，率兵灭掉了饥国（又有写作耆或黎的）。商朝的大臣祖伊很有远见，认为这是周人灭掉商王朝的开始，感到十分恐惧，连忙跑去报告商纣王，希望他改弦更张，不然老天爷要把商王朝抛弃了。可商纣王听了这个紧急报告却不以为然，若无其事地说：“我看老天爷又能把我怎么样？”祖伊看到他这个样子，非常沉痛地说：“纣王真是一点也听不进我们的忠言啊！”

微子启几次劝谏商纣王，毫无作用。他看到商王国离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真想一死了事，以免国破家亡，沦为周人的奴隶。但太师却劝他说："老天爷让纣这个败家子来糟蹋殷国，看来商朝气数已尽，存在不了几天了。如果你的死能挽救颓势，复兴商朝，那倒也还值得。但如果国家照样灭亡，死又有什么价值？依我看，还不如找个地方躲一躲呢！"……另一个贵族箕子，发现朝廷上不见了微子，心里早已明白是怎么回事，怕多说话招来横祸，便装疯卖傻，与奴隶们搅在一起，结果还是被纣王关了起来。

贵族比干听到微子逃跑、箕子疯了的消息，心里有很多感慨。他长叹一声说："为人臣的看到国君有错误而不去谏阻，是不忠心的表现。怕被杀死就不敢说真话，是不勇敢的表现。只有看到国君有错就谏阻，不采纳我的正确意见就以身殉职，这才是真正的忠于君王！"他就抱着这样必死的决心，在纣王面前整整劝说了三天而不离去。纣王虽然心里早就烦透了这个敢于犯颜直谏的比干，但却假惺惺地说："我今后应该怎么做呢？"比干说："您要爱护百姓，多做善事，不要侈靡过度！"纣王听了以后，气得暴跳如雷，说："我听人说，绝顶聪明人的心与众不同，是不是你的心有七窍，才敢这么大胆？"下令把比干处死，并残忍地挖出他的心剖开看个究竟。

比干惨死的消息，震动了商王朝的朝廷内外。太师、少师看到商朝的重臣一个个被杀的杀，关的关，逃的逃，知道商纣王已不可救药了。为了免遭横祸，悄悄地把宗庙里的祭器和各种乐器收拾起来留作见面礼，急忙投奔周国去了。

纣王时期，广大平民的破产和反抗，说明商朝末年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加深和激化。而不少大奴隶主贵族的被杀和出走，说明奴隶主阶级再也没有能力继续对商王朝统治下去了。奴隶主阶级纷纷作鸟兽散，600 多年的商王朝已经是衰微破败，就要瓦解了。

（四）商末与东夷的长期战争

在现在江、淮之间和山东半岛一带，商朝时居住着一个生活习

惯和文化信仰都与中原不同的古老民族——夷方。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处在商王朝的东南，所以又称为“东夷”。

还是在武丁时期，东夷就和商王朝有了接触，甲骨文里有不少关于商王朝与夷方进行战争的记载。商王朝著名的女将——武丁之妻妇好，曾率领大军，驰骋在与夷方战斗的战场上。甲骨文“□午卜，卜宾，贞王亩妇好令征夷”就是商王武丁命令妇好出征夷方的记录。据说妇好武艺超群，深通韬略。她不仅能身先士卒，斩将搴（qiān）旗，还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商王朝开疆辟土立下赫赫战功。妇好参加征伐夷方的战斗时，一位著名大将侯告就在她的指挥之下，甲骨文记载了他们的行踪说：

> 贞王令妇好从侯告伐夷。
> 贞王〔勿〕令妇好从侯〔告伐夷〕。

由于妇好等人连年对夷方攻战，使夷方臣服了商王朝。武丁以后有好几代的时间，甲骨文里再也不见商王朝与夷方的战争。

1976 年，考古学家在安阳殷墟发现了妇好的坟墓，为研究商代的历史和考古提供了珍贵资料。

商王朝末年，夷人的力量又逐渐强大起来。由于商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和对各方国盘剥的加强，东夷与商王朝矛盾进一步加深，成为对商王朝统治的巨大威胁。帝乙、帝辛时代，商王朝与东夷的战争连年不断。这些战争，不少在甲骨文、金文和古代文献里有所反映。

帝乙十年九月甲子日，商王对征伐夷方之事进行了一番卜问。闰九月癸亥这一天，帝乙率领大军到达了雇地（今郑州以北）。在雇地停留 6 天，休整军队以后又继续前进。十月辛丑，商王帝乙到达了商（今河南商丘），十二月己巳到达攸（今安徽桐城）。帝乙在攸与攸侯喜的军队会师，并又休整军队。十天以后（辛巳日）大军开往前线，攸侯喜是这次征伐东夷的重要将领，在战斗中不离商

王左右。训练有素的商朝军队打得夷方军队望风而逃，帝乙乘胜追击，夷方的同盟者林方也被击溃……直到帝乙十一年正月乙巳日，商王才率领大军从前线回到攸。商王在攸地赏赐了攸侯喜等有功将领并犒赏了士卒，庆祝这次伐夷的胜利。商王在攸地又逗留了29天以后，才踌躇满志地班师回朝。在回来的路上，商王到处游猎，流连忘返，直到七月才回到了商都。这次征伐东夷，前后整整花去了一年多的时间。

商王朝与东夷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帝乙十五年，与东夷的又一次大规模战争爆发了。帝乙亲自率领军队出征，战争所经过的地区比上次范围更广，一直达到了山东的齐、顾等地，战斗进行得比上次更为激烈、艰巨。有几件传世的商代晚期铜器铭文，记载了帝乙十五年征伐东夷的历史事件，最著名的是“小臣艅尊”。

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在今山东省梁山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有一件名叫“小臣艅尊”。这件尊做成犀牛的形象，鼻上的牛角粗壮，两眼传神，栩栩如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当时是做装酒用的礼器。尊上有铭文：

> 丁巳王省夒仓，王锡小臣艅夒贝。唯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

“省”即巡行、巡省。“夒仓”是地名。“小臣”是官名。根据对铜器上铭文的研究，我们可知在商王帝乙十五年的肜（rōng）季（商人一年对各世祖先祭祀一遍叫“周祭”。“周祭”划分为五个不同阶段，“肜季”即其中之一），有一个叫艅的小臣，因为随从商王征伐东夷有功，在班师回朝的路上，得到了商王帝乙赏赐的堇贝。小臣艅为此铸造了一件牺尊作为纪念，并把事情的原委也铭铸在铜器上。

帝乙死后，帝辛继承了王位。纣王在打败黎国（今山西黎城县）不久，东方的夷族就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商纣王不理睬大

臣祖伊等对他要防范周人的劝谏，倾全国兵力，投到远方与东夷的战争中。“纣克东夷”（《左传·昭公十一年》），取得了巨大胜利，俘虏了“亿兆夷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作为奴隶。夷方从此一蹶不振，臣服于商王朝。

据《吕氏春秋》等古书记载，商人在与东夷的长期战争过程中，曾经使用了象队。这支象队在战场上所向无敌，具有巨大的威慑力量。根据甲骨文材料和考古发掘材料的研究，商代中原气候远较现在为暖，适合大象等亚热带或热带动物的生存。商人不仅猎取野生的象，还把野象驯化为家象并繁殖小象。1978年春，在安阳殷墟王陵区的一个祭祀坑里，发现一只脖子上系有铜铃的小驯象，这是继解放前发现一个象坑之后发现的第二个象坑，对研究商代中原的气候和动物种类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文献记载的商王朝曾把驯象用于与东夷的战斗中，是有可能的。


周原出土西周早期的折觥

商王朝与东夷的战争，虽然以东夷的最后失败而告终，但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耗尽了商王朝的财力和人力，而且俘虏的奴隶也与商王朝“离心离德”。这一切，就更加深了商王朝的社会危机，从而给周人造成了可乘之机。

虽然如此，商王朝末年，特别是商纣王对东南的经营，使较为先进的中原文化传播到了夷人居住的广大地区，加强了这些较为落后的边缘地区与安阳殷都为中心的先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客观上对我国历史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五）文王访贤

周族在岐山立国以后，力量还很弱小，经常受到戎狄等少数民族的欺侮。国君古公亶（dàn）父为了使周族强大起来，一方面努力改革周族本身的各种陋习弊政，以便于老百姓休养生息；一方面礼贤下士，搜罗人才。他经常告诫儿孙们说："只有把才能出众的人都请到周国来，我们才能变得强盛！"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太伯，二儿子叫虞仲（又称仲雍），三儿子叫季历。古公看到三儿子季历聪明能干，便把复兴周国的希望寄托在他和他的儿子昌的身上。

古公死后，周人打破了"传位以长不以贤"的惯例，由有才干的季历继承了君位。季历继续实行古公时的政策，并加强与各方国诸侯的交往。在商王朝文丁时期，王季（即季历）被封为"牧师"，掌管商王朝的畜牧业。周族力量的日趋强大，引起了商王文丁的疑惧。他找了一个借口，把才提升为牧师不久的季历杀掉了。自此，商周两大民族结成了世仇。

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继承了君位，这就是后世有名的周文王。为了报杀父之仇，姬昌不顾国力，在帝乙二年曾仓促出兵伐商，结果被商王朝打得大败。他不得不改变斗争策略，表面上继续臣服商王朝，暗中却在加紧作灭商的准备。姬昌的假相迷惑了商王朝，他被封为西方的霸主——西伯，地位曾至"三公"。他遵循祖先后稷、公刘等人的遗训，大力发展农业。还不忘祖父古公、父亲王季的榜样，为了使周族强大和报杀父之仇，他敬老、慈少，努力增殖人口，广求天下人才。据传说，西伯昌思贤若渴，为了接待有本领的人，常常耽误了中午吃饭，所以他很受当时各地名士、贤人们的爱戴。西伯昌尊重有经验的老年人也是闻名天下，连离周原很远很远的孤竹国（今河北卢龙一带）也有人去投奔他。不少当时有才能的著名人物如太颠、闳夭、散宜生等都成了西伯昌的座上宾，

这些人在周族灭商的过程中起了不小作用。

西伯昌励精图治，广求贤才，不仅使周国大治，而且他在各方国诸侯中的威望也愈来愈高。商纣王以西伯昌同情九侯和鄂侯为借口，把他关进了监狱。在狱中，西伯装做什么都不懂的样子，以减轻纣王对他的疑虑。原来，周文王的大儿子伯邑考曾在商朝当人质，纣王把他杀死做成肉汤送到狱中让文王喝。文王假装不知道这么回事，若无其事地喝了肉汤，但眼泪只得悄悄往肚里流。纣王听了报告以后得意地说："谁说西伯是什么见多识广、未卜先知的圣人？他喝了用儿子肉做的汤都不知道呢！"再也不把文王放在心上。

西伯被放出监狱以后，更做出一副对商王朝忠心耿耿的样子。但在他心底里，却念念不忘父亲被无辜杀害，自己身陷囹圄，儿子被残杀的桩桩仇恨。他经常四出寻访，决心要找到一个能辅佐他灭商的人物，早日报他与商纣王的不共戴天之仇。

有一天西伯要出去打猎，行前照例进行了一番占卜。据说这一卦与往常不同，预告他出猎并不能获得什么珍禽异兽，而是要得到一个能成就他霸王之业的辅佐。西伯昌将信将疑，行至渭水的南岸，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白发苍苍的老头在钓鱼。只见他不慌不忙，每起一钩，就钓上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西伯在一旁看的着了迷。后来西伯与钓鱼的老人搭了话，两人真是相见恨晚，愈谈愈投机。周文王从他对天下形势的精辟分析和他对治国安邦的一整套见解，认识到这是一位才能非凡的人物。文王心悦诚服地说："记得我们的老太公曾说过：'只有把才能出众的人请到周国，周国才能强盛起来'，您恐怕就是这样的人吧？我们老太公可盼望您多少年了！"于是周文王把这位钓鱼的老人请上了自己的车子，一起回到了京城，立为管理军队的太师。周人因而把这位新立的太师，叫做"太公望"。

"太公望"名姜尚，字子牙，又叫姜子牙。他的祖籍原在东方夷人地区。据说，他的祖先在舜时为"四嶽（yuè）"之一，曾帮助大禹治水立过功，被封在吕，姜为其族姓。到了夏、商时

代，姜姓的子孙逐渐分化，有的成为穷人，姜尚就是他们的子孙。古时常常“以地名氏”，因姜尚的祖先曾被封在吕地，所以又称他为吕尚。吕尚的家里很穷，为了维持生活，年轻时曾在繁华的朝歌城里宰牛卖肉，当过屠夫。他也曾在孟津开过酒店。虽然吕尚满腹经纶、才华出众，但他在商朝怀才不遇，只得混迹于市井，在失意中耗去了宝贵的年华。但满头白发更显得他阅历过人，仍一心寻找施展才能与抱负的机会。当他听到西方的周文王广求贤良的消息后，认为实现自己多年的理想与抱负的时机来到了，便在岐山西南渭水的支流，有一条叫兹泉水的源头凡谷钓鱼，等待遇到文王的机会。

据说姜尚钓鱼时，手气开始并不太好。他在水边钓了三天三夜，也没有一条鱼来吃他下的饵。姜尚气得甩掉了帽子，扔掉了上衣，但也无济于事。正当他十分狼狈，想不出把鱼钓上来的办法的时候，有一个农夫模样的人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别着急，再钓一次试试看！不过你要把鱼线弄得细一些，鱼饵也要做得香一些。下钩时要尽量轻一些，千万不要使鱼惊动！”姜尚依法办理，果然钩钩不空。他从中悟出了个道理：和钓鱼一样，要想灭掉商朝，也必须从长计议，一切都悄悄做好准备，但不能让商纣王看出破绽。

周文王得到姜尚以后，真是如虎添翼。他事事与姜尚商量，一方面用各种计谋悄悄地动摇商王朝的统治基础；一方面加强实力，整训军事力量。在姜尚的建议下，周文王积极作争取同盟国的工作，虞、芮等一些小国都纷纷归顺周国，使周的国力和声威大大加强了。接着，文王又对西部的犬戎和密须（今甘肃灵台）大举征伐，解除了后顾之忧，然


陕西宝鸡境内的姜子牙钓鱼台

后挥师东渡黄河，灭掉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邘（今河南沁阳），从邘又回师灭掉了商王朝西部的重要同盟国崇。由于不断的对外战争，周人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俘虏，在沣水西岸又修建了丰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到这时，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都大大超过了商王朝。

周文王灭商的夙愿还没有最后实现，就病死了，姜尚又继续辅佐文王的儿子周武王，完成他灭商的未竟之业。周武王对姜尚十分尊重，称他为“师尚父”。姜尚也忠心耿耿，辅佐周武王继续加强周国的力量，争取各方国诸侯，并为武王最后灭商选择了十分有利的战机，灭掉了商朝。由于吕尚辅佐文王、武王灭商有功，被西周王朝封在齐（今山东中、南部），成为历史上有名的齐国始祖——齐太公。

（六）牧野之战与“利簋”的发现

武王继位后的第二年，就曾率领大军进入商王朝境内。为了增加号召力，他在军中供奉着文王的神主牌，表示他是奉父亲之命才采取军事行动的。出发前，他对司马、司徒、司空等官吏训话说：“你们都认真、严肃地听着：我这个人很愚笨，没有什么本领。但我的祖先为我遴选了许多德高望重的贤臣和留下灭商之势已成的大业，我只不过是完成先人的未竟之业而已。我一定赏罚严明，你们要努力多立战功，把先人灭商的愿望早日付诸实现！”师尚父也发布命令说：“整顿好你们各自统率的队伍，准备好渡河用的船只，如果有谁故意迟到，我就把他立即斩首示众！”武王坐在大船里渡过黄河时，看到舟楫整齐，卒伍士气高昂，心里很是高兴。据说船行到黄河中流时，有一条银白色的大鱼一跃正好跳入武王的船里。为了鼓舞士气，武王指着这条大鱼宣布说：“殷人崇尚白色，这是殷人要自取灭亡的象征！”周武王的大军上了岸，忽然有一颗红色的流星划破长空，声音震天动地，更增加了战前悲壮、森严的气氛。周军长驱直入，直指孟津。恨透了商纣王的各国诸侯一听到武

王出兵的消息，都不约而同地前来助战，一下子就有800诸侯自动赶到孟津与周武王会师。他们纷纷向武王建议说："现在可到了把商灭掉的时候了!"但周武王的这次出兵，是为了刺探商王国的实力，只不过是灭商战斗的一次预演而已。通过他对商王朝政治形势和军事力量的观察，觉得周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把商王朝一举灭掉。因此他毅然收兵回国，继续加强准备和等待有利的时机。

又过了二年，周武王听到了商王朝的一些重臣被纣王杀的杀、关的关，有些逃跑了，知道灭商的时机到了。他采纳了师尚父的意见，决定大举伐商。并把这一决定通报各国诸侯说："商纣王涂炭生灵，罪大恶极，有正义感的人都来参加灭商的战斗呵!"周武王率领了一支由战车300辆、虎贲3 000人、甲士4.5万人组成的伐商大军出发了。周军过了孟津，又会合了前来助战的各方国诸侯，兵力更加强大。一路所向披靡，浩浩荡荡直向商都前进。

公元前1027年二月甲子日早上，天刚蒙蒙亮，武王率领的灭商大军就在离商都仅有70多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南）摆开了决战的阵势。大战开始以前，武王一手拿着明晃晃的大钺，一手持着指挥大军的白旄旗，面对排列成战阵的军队，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典礼。誓词说：

"你们这些从西方远道而来的战士们、我的友好盟邦的首领们、军队的各级指挥官们，以及庸、蜀、羌、髳、微、卢、澎、濮的兄弟们，你们辛苦了！现在请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牌，立起你们的长矛，听我向神明发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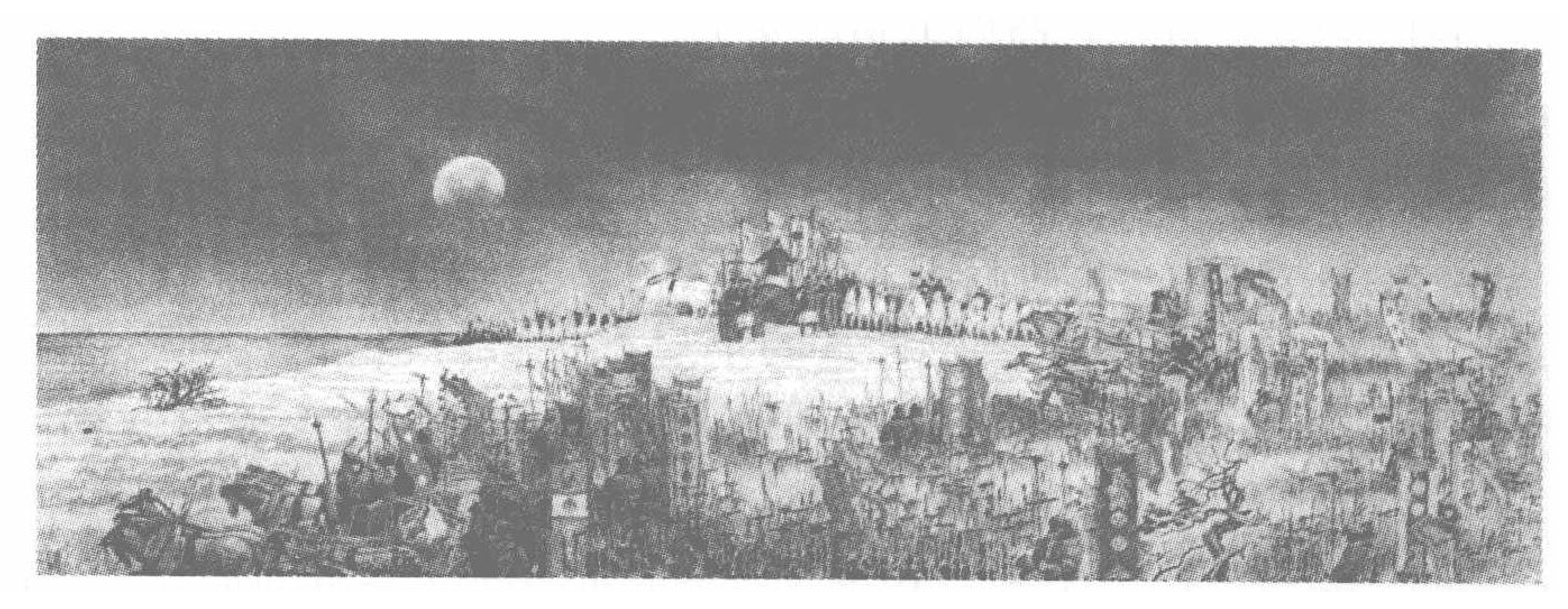
"有一句俗话说：'母鸡不打鸣。如果出现了母鸡打鸣的怪事，这家人就要遭祸了'，现在商纣王光听妇人的话，就和母鸡打鸣一样，商朝就遭了殃。他不祭祀祖宗，忘记了神明，无论家还是国都被他搞得一塌糊涂。他把王室的贵族勋臣丢在一边，反而起用罪人逃犯。这些小人一得志，老百姓就倒了霉。现在老天爷对商纣王的倒行逆施发怒了，让我代表老天爷来执行惩罚纣王的任务。

"今天的仗一打起来，你们每移动六七步就要整理一下队形，

可要保持阵容整齐呵！你们每用戈向敌人砍四下、五下、六下、七下，也要注意调整一下队形。只有保持阵容整齐，才能充分发挥兵器的威力。

“在战斗时，一定要向作战勇敢的人看齐！你们一个个要像猛虎那样威武，像熊那样有力，像豺那样狠，像螭（chī）那样灵活。你们一定要注意：对那些投降的人不要杀掉，留着他们将来好给我们干活。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胆敢不听我的话，我就要立刻把他杀掉！”

周武王的这篇誓词，就是保存在《尚书》里的《牧誓》。这是一篇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牧野之战

武王誓师以后，周军对商军发动了凌厉的攻势。战幕才一揭开，武王命令师尚父率领很少的士卒为先锋在前面挑战，随后以战车 300 辆，虎贲 3 000 人，士卒 4.5 万多人攻击商纣王的军队。商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多是才俘虏不久的夷族奴隶，他们与商纣王“离心离德”，早就盼着周人快点打过来解放他们。因此两军稍一接触，商纣王前边的军队纷纷倒戈，商军登时就乱了阵脚，溃败下来。周武王抓住战机乘胜追击，直捣商纣王的老巢朝歌。

纣王见大势已去，急忙逃回朝歌，躲到了鹿台之上。他眼睁睁地看着周人的军队冲入了都城，无计可施。商纣王众叛亲离，只剩下了孤家寡人。在当天晚上，纣王把宝库里的名贵玉石围在身边，

放了一把火，自焚而死。武王威风凛凛，率军向商都朝歌前进，商奴隶主们早已跪在城外迎接。武王让大臣们安抚这些吓得魂飞魄散的贵族们说："你们不要害怕，这是老天爷给你们带来了福音！"武王来到纣王烧死的地方，真是恨从心头起，亲自射了三箭还不解气，又把纣王的头颅砍下，挂在大白旗上示众。还对着纣王宠幸的妲己等二个嬖妾的尸体也射了三箭，并把她们的头割下挂在小白旗上示众。武王为祖父、父亲、哥哥报了仇，雪了恨，就又离开商都，回到军营里去了。

第二天，一批大臣簇拥着武王，在象征拥有天下的社坛上举行了隆重的典礼。周武王宣布说："周朝灭掉了商朝，老天爷命令我来治理天下！"自此，西周王朝建立了。



利簋铭文

关于牧野之战的战斗经过，不少古籍里都有记载。特别是《尚书·牧誓》，不仅详细地记载了武王的战争誓词，甚至连开战的具体日期——甲子日的早晨都记得一清二楚。但《尚书·牧誓》成书的年代，学者们看法很不一致，因此对这场战斗发生在"甲子"日的准确性有所怀疑。1976年陕西临潼发现了一件西周早期铜器"利簋（guǐ）"，从而为文献所记载的甲子日爆发了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找到了新的证据。

"利簋"深腹、方座，双耳有珥。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器腹和方座上都是以云雷纹为底，又在上面装饰兽面纹、夔龙纹。方座的平面四角装饰蝉纹。簋的圈足也是以云雷纹为底纹，上面饰以夔龙纹。这件铜器不仅造型古朴，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上面还有十分重要的铭文32字：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

贞，克。昏夙又商。辛未

王在窩自，锡有事利
金，用作旜公宝尊彝。

铭文中的“珷”即武王。“朝”即早上。“岁”是举行岁祭。而“贞”是卜问的意思。“锡”即“赐”字。“利”是人名。利簋全篇铭文的意思是说：“武王征伐商，在甲子日的早晨，先举行了岁祭并进行了贞问，兆象很好，说能够如愿灭掉商朝。过了8天以后，辛未日武王在窩自这个地方赏赐了一个官吏（有事）名字叫做利的金（即铜），利觉得很荣耀，作一个铜器作纪念。”这件珍贵的铜器，是一个叫做利的牧野之战的参加者，在战斗结束后的第8天，为了纪念自己得到周武王的赏赐而作。特别是铭文中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的记载，证明我国古文献的可信。而铭文中的“甲子朝”与《周书·世俘》的“甲子朝”和《尚书·牧誓》的“甲子昧爽”的记载竟基本一样。

“利簋”是目前除“大丰簋”（又称“天亡簋”，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外的第二件有明确纪年的武王时期的铜器。它不仅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一件重要标准器，还为研究西周初年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七）兵家之祖姜尚

《诗经·大雅·大明》是一首歌颂周朝建国的史诗。在描写著名的牧野大战时，诗中这样唱道：

牧野广阔摆战场，　　（牧野洋洋，）
战车坚实亮堂堂，　　（檀车煌煌，）
驾车红马真强壮。　　（驷騵彭彭。）
冲锋陷阵好姜尚，　　（维师尚父，）
勇武如鹰任翱翔。　　（时维鹰扬。）
胆气冲天助武王，　　（谅彼武王，）

以少击多伐商邦，　　　　　（肆伐大商，）
鏖（áo）战大胜迎天亮。　　　（会朝清明。）

这首诗歌颂了姜尚在参加牧野之战时，威风凛凛的英雄形象。虽然“殷商之旅，其会如林”，但身为周军太师的姜尚毫无惧色，只见他身先士卒，勇插敌阵，如同搏击长空的雄鹰，以少胜多。经过在黎明前的昏暗中与商军一阵厮杀，打得商军抵挡不住，倒戈而逃。姜尚用牧野大战的全胜，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早晨……从这首歌颂姜尚的诗中可以看出，作为军事指挥员的姜尚，在这次灭商之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其实，灭商之战的胜利，也是文王和姜尚长期进行军事准备的结果，但在整个武王灭商的活动中，作为军事谋略家的姜尚，其作用就更为显著了。比如，周武王九年，大会800诸侯于孟津，虽然各国诸侯同仇敌忾，都说：“现在是到了伐商的时候了！”但周武王在大好的形势下，力排众议，说：“老天的意志我还没摸透，现在还不能贸然进行伐纣”，毅然回兵。其实，周武王灭商之心早已急不可耐，只不过是听从姜尚的意见，考虑到灭商的决战时机还未成熟而已。《说苑》记载了在这次伐商预演前，周武王与姜尚关于选择决战时机的一番谈话。

武王问姜尚：“我一直想要达到这样的三个目标，仗还没打就能知道我有胜利的把握，不用占卜就能知道事情很吉利，不是我国的民人但能为我出力。能有什么办法做到吗？”姜尚回答说：“办法还是有的。您如果深得天下民众的拥戴而去征伐倒行逆施的暴君，就一定能在仗没打之前知道必然胜利；如果贤明的君主去征伐昏庸的坏蛋，不用占卜也能知道事情是吉利的；别国的民众，受到本国君主的涂炭摧残，而我们吊民伐罪去解救他们。虽然这些人不是我国管辖之下的民众，也会感谢我们，为我们卖力的！”

又经过两年的准备，武王决定出兵伐商。出兵前，周武王先用龟壳进行了一番占卜，但兆象说这次伐商不吉利。说来也凑巧，只

见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夹着暴雨，更加重了武王和出征将士的疑虑。但是姜尚却胸有成竹，他早就经过了周密的调查并分析了双方的形势，深信商纣王不堪一击。他非常镇定自若地说："这些干枯的乌龟壳和烂蓍草又能知道什么吉凶!"坚决主张按原定的计划出兵。当周军浩浩荡荡地走到邢地的时候，晦气的事情又发生了：大楯折断为三截，接着又连下三天瓢泼大雨。武王忙问姜尚说："是不是老天显灵，警告我们不可伐商啊?"姜尚解释说："大楯折为三截，是老天提示我们应兵分三路。连下三天大雨，是老天特意为我们洗去兵器上的征尘，杀起敌人更为锋利!"显然，姜尚对伐商战略时机的选择，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姜尚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与商朝战争的长期戎马生涯，使他在军事理论上也有所总结和创造。相传著名兵书《六韬》即姜尚所作。他认为"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独往独来。"就是说用兵最重要的原则是军事统帅高度的集中统一指挥。统帅经过正确判断形成的决心，不能轻易改变。在作战的战略战术上，姜尚也有很出色的见解。周武王曾向他请教说："敌我双方大军相遇，谁也不敢先发制人，只得两军设垒互峙。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要想先袭击敌人，但又找不到有利的条件，应该怎么办呢?"姜尚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想办法迷惑敌人，一要把队伍故意搞得外边很乱，但实际上内部却很严密。二要使敌人看起来军队没粮吃，但实际上粮草却很充足。三要使人看起来军无斗志，但实际上战斗力却旺盛得很。此外，必须使自己的军队机动灵活，保守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的机密。把营寨筑得高高的，将精锐埋伏起来，使对方不知我方的一点情况。然后，"欲其西，击其东"，真正的打击点虽然选择在西边，但先派兵在敌方东边挑战，给敌人造成错觉。这就是为后世兵家所常用的"声东击西"法。周武王还请教过姜尚，如果遇到对我方的军事情况和用兵谋略都很熟悉的敌人，我们怎样做才能战胜他呢?姜尚说："只要我们随时暗中注意发现敌人的弱点，用兵迅速地攻击他。再出其不意地在他没有准备的时候发动大规模攻

击，使他在混乱中来不及调动兵力，就能一举把他打败!”这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也为后世的军事家所继承。

如此等等，姜尚在协助武王灭商的战争指挥上，特别是在伐纣战略时机的选择和战役决心的形成方面，表现了卓越军事统帅的才能。他总结的用兵战略战术，对后世兵家有很大影响。因此，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赞扬他说：“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姜尚被后世誉为“兵家之祖”。

（八）周人灭商的重要同盟军——羌族

在牧野决战开战之前，周武王曾大誓军队。他在誓师时曾特别慰勉了同盟军庸、蜀、羌、髳、微、卢、澎、濮人，可见这8个同盟者是他伐商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周人倾全国之兵，也仅仅才动员了3 000能出车的精锐虎贲队伍。按照春秋时代出兵“长毂九百”而“遗守四千”（《左传·昭公五年》）的常例，周人留守与出征兵力的比例也基本上为四比一的话，那周人全部的兵力也不过1.5万人。以五口之家出一人计算，周族全部人口也不过10万左右，这就是周人一直自称“小邦国”的原因。小邦周要想打败有“亿兆夷人”的大邦殷，只有与周围一些同受商朝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结盟，才能壮大自己的声势和力量。而在周伐商的8个同盟军中，羌族一直是周人亲密的同盟者和依靠的重要力量。

据不少学者研究，羌与姜本为同源，是居住在我国西部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古书中记载说，炎帝族是在姜水流域发展起来的，炎帝就是姜姓。生活在现宝鸡岐山一带的姜族，本为“四岳之裔胄”，应是炎帝向东发展以后，留在当地的姜炎子孙。而居住在现在甘、青一带的羌族，被称为西羌。“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后汉书·西羌传》），他们原是姜炎族的一个分支。姜族与夏朝关系密切，据说“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序》），所以又称“戎禹”。因此在夏朝灭亡以后，商王朝一直对羌族深恶

痛绝，不时大加挞伐，不少羌人（或姜人）俘虏，被用为祭祀时的牺牲或生产奴隶。有时甚至抓住他们的首领，将头砍下去祭祖。这一切，在殷墟甲骨文里多有记载。商人在庙堂里也常以他们先王对羌方的赫赫战绩引为荣耀。《诗经·商颂·殷武》唱道：

先君成汤武力强，　　（昔有成汤，）
臣服西方氐与羌，　　（自彼氐羌，）
何人胆敢不纳贡，　　（莫敢不来享，）
天下纷纷来朝王，　　（莫敢不来王，）
都称“共主”是大商！　（曰商是常！）

“同病相怜”，由于羌人与周人处于同样的地位，他们都经常受到商朝的侵略和压迫，所以联合起来与商朝对抗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周与姜很早就发生了联系。周人的始祖弃，就是姜嫄——姜族的女子所生。周族古公亶父迁居周原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姜族联姻。《诗经·大雅·绵》里记述这件大事说：

古公迁岐避戎狄，　　（古公亶父，）
骏马奔驰沭晨曦。　　（来朝走马。）
西离故土求生存，　　（率西水浒，）
止于岐下周原地。　　（至于岐下。）
喜与姜女结亲眷，　　（爰及姜女，）
踏勘地形屋宇起。　　（聿来胥宇。）

在阶级社会，贵族之间的通婚，往往是一种政治行为。古公亶父所娶的姜女，就是后来有名的太姜。周族通过婚姻这条“连理带”，与原居此地的土著姜姓部落结成了联盟。季历是太姜所生的儿子，古公亶父后来把王位传给季历而不传长子太伯和次子虞仲，

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季历是姜族的外甥，他继承王位能得到姜族的全力支持。武王的妻子也是姜女，名叫邑姜。可以说，通过结亲与姜人结成联盟，是周人自古公亶父以来的基本国策。因此武王伐商，姜（羌）人与周人休戚与共，积极参加。

周人与羌（姜）人的政治联盟不仅有亲密的婚姻纽带，而且在文化上也早就互相影响，直至融为一体。因此羌人才成为周人伐商战争中重要的同盟军和成为一支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

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姬姓统治者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忠实的同盟者，除了论功行赏，不少被立为守土一方的“异姓”诸侯外，还与姜族保持着“通家世好”的亲密关系。据学者考证，西周11代王中几乎每隔一代就要娶一个姜姓女子为妻。这不仅反映了西周建国前后始终把姬姜联盟作为巩固王朝统治的重要国策，也反映了姜姓一直是左右西周政治形势的重要力量。

第二章　西周的兴起和发展

周人灭商以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奴隶制王朝——西周。西周王朝经过了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等人的几代经营，达到了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自恭王时期起，也就是西周中期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社会内部逐渐滋长着新的因素，我国奴隶社会开始逐步进入衰落时期。

一、从后稷到古公这段历史谈起

以善于经营农业著称的周族和夏、商一样，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部落。其先祖后稷曾为尧的农官并与夏禹、商契一起服事过舜，后稷还协助大禹治过水。周族自弃以后有了明确的世系，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农牧业的发展，周族内部逐渐产生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到了古公亶父时期，周族进入阶级社会，在陕西周原建立了国家，成为对商王朝构成严重威胁的一支政治和军事力量。

（一）后稷种百谷

周族的始祖后稷，原来的名字叫“弃”，意思就是“被丢弃的孩子”。弄明白这个奇怪名字的来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周族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历史。

根据历史传说，我们只知道弃的母亲叫姜嫄，她可能是羌族的妇女。有一天姜嫄和同伴到野外去游玩，忽然看到路上有一个奇怪

的脚印。姜嫄看到这个脚印很大，十分好奇，不由自主地就把自己的脚踩在了这个大脚印上，说也真奇怪，她的脚才踩上去，只觉得自己肚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自此她就怀孕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姜嫄怕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给自己带来灾祸，便想把他丢弃。她把孩子丢弃在狭隘的小巷里，想让走过来的成群牛马把他踩死，可是当牛群马群通过小巷时，都小心地避开，没有一头牲畜踩他一脚。姜嫄抱回孩子，又丢弃在没有人迹的深山密林。可是真巧，这天密林深处却来了许多人，姜嫄又把他从山林里搬开，丢在河面的冰上，想让他冻死。又哪里知道，一群飞鸟落在这个孩子周围，用毛茸茸、暖烘烘的翅膀覆盖在小孩身上……姜嫄看到孩子大难不死，着实觉得有些奇怪，便改变了最初的念头，把他抚养成人。因为一生下来就想把这个孩子丢弃掉，因此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弃”。

在母系氏族社会，妇女拥有较大的权力并受到尊敬。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没有私有财产和剥削。男女的婚姻关系是不固定的族外婚，氏族的血统只能以女系计算。弃无父而生的传说，正是周族也曾经历过“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反映。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男人们逐渐成了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发生了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深刻转变。在父系氏族社会里，血统是以父系大家长为中心的男性计算的，这样就保证了把财富传给自己确切的儿子。姜嫄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不知父为何人而生的弃丢掉，可能是因为受了父系氏族社会这种强大舆论压力的影响。这说明，弃时周族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社会的残余，已逐步确立了。

弃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喜欢种植麻和豆类等作物，经常给这些小苗浇水、除草、施肥，所以他栽培的麻类豆类作物长得很好。弃长大成人以后，由于自小就养成了种庄稼的习惯，所以很喜欢钻研种庄稼的学问。他还能分辨土质的好坏，并能在适合不同作物生长的土地上种不同的庄稼，所以他的庄稼总是获得好收成，周族老

百姓看到弃种庄稼有办法，纷纷照着他的样子做，果然也都增了产。

弃种庄稼很有学问的事，一下子传到尧的耳朵里。尧把弃请来，任命他为管理农业的官。弃把他种庄稼的一套办法向全国推广，果然获得了大丰收，受到了尧的奖励。

舜时，弃参加了禹治理洪水的斗争。洪水退后，赤地千里，老百姓都没有粮食吃。为了解救受灾的老百姓，舜命令弃教老百姓种植百谷。弃多年参加治水，疲惫的身体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就又踏上了广大的田野，认真而辛劳地教老百姓种植谷、稻、高粱、豆子……

由于弃管理农业有功，被舜封在邰，人们称他为有邰氏，他的封地近姬水，所以又称姬氏。这个姬姓的弃，因为主要当管理种植黍稷的农官，所以人们又叫他做“后稷”。后世把后稷作为农神供奉在庄严的社坛里，表示对他发展农业的尊敬与怀念。在《诗经·大雅·生民》这首诗里，周人的后世子孙歌唱他道：

后稷种庄稼，	（诞后稷之穑，）
学问真不少。	（有相之道。）
除去田中草，	（茀厥丰草，）
好谷长苗茂。	（种之黄茂。）
吐芽又含苞，	（实方实苞，）
茁壮渐长高。	（实种实褎。）
茎长谷花香，	（实发实秀，）
杆坚穗匀好。	（实坚实好。）
穗垂籽粒实，	（实颖实粟，）
就要进家了。	（即有邰家室。）

（二）公刘居豳

周族自后稷起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后稷对周族农业的发

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在周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由于后稷的威望和他早已逐步把姬姓部落的权力都抓在了自己手上，所以在他以后，不经过全部落选举就把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不窋。

不窋末年，正是夏王朝衰落的时候。夏朝统治者太康奢侈腐化，政教失修，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不少方国诸侯相继离叛而去。不窋继承父亲后稷的职务当了个农官，但夏朝统治者只顾享乐，根本不去过问农业上的事情，后来索性把这个徒有虚名的农官也罢掉了。不窋丢官之后，就率领姬姓部落跑到戎狄地区放牧牛羊去了。不窋死后，君位传给了他的儿子鞠。鞠死后，君位又传给了他的儿子公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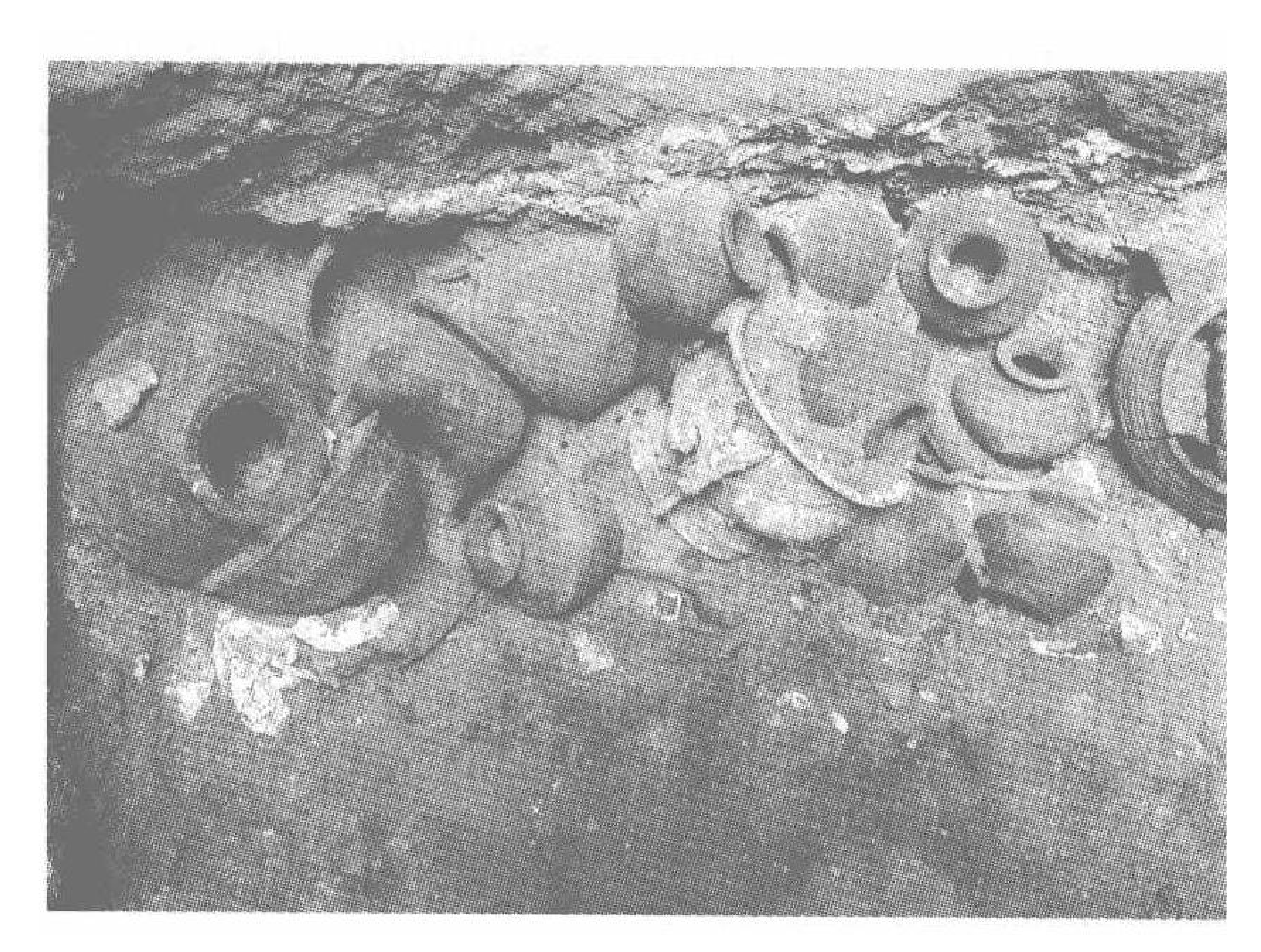
公刘虽然身处戎狄，但对畜牧业不感兴趣，一心想恢复他高祖后稷重视农业的好传统。公刘为了种好庄稼，一天到晚在田野上忙个不停，带领全部落的人整治田地，种植庄稼。到了收获时节，不仅部落的公共仓库里装得满满的，而且各父系家族也有了自己的积蓄。

公刘为了求得自己部落的农业得到更大的发展，他看中了隔渭河相望的豳地。在原始社会，虽然地广人稀，但每一部落都有自己的管辖范围，其他部落的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只有用武力把原居住地的部落征服或赶跑，别部落的人才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公刘为了得到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豳地，率领着本部落的人民，在武装男子的护卫下，带着干粮，手持弓、矢、斧、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人们到了豳地一看，这个地方有山有水，土地肥沃，再没有人想离开这块富庶地区，回到原来居住的戎狄地区去了。他们在依山傍水平坦的地方建起房屋，高高兴兴地定居下来。

人们住下以后，公刘又率领大家去伐树除草，开垦荒地，为种庄稼作好了准备。公刘还登上山顶，利用太阳的影子测量土地的方位，观察土地的冷暖和水源的情况。然后他又丈量规划了土地，并将土地分给每个父系家族耕种，还规定每个家庭根据分得土地的多少向部落交税和助耕。从此，豳地日渐开辟，一天比一天繁荣

起来。

公刘从戎狄地区来到豳地以后，跟他一起去的其他部落成员，一个个都富裕起来，也有了家庭的私有积蓄。而那些留在戎狄地区没有走的人，因为公刘在时早就教会了他们种庄稼，所以也都有不少存粮。无论是到豳地去的人还是留在戎狄地区的人，都交口称赞公刘做了大好事。特别是那些留在戎狄地区的人，很是怀念公刘的恩德。后来，不少人也悄悄地迁到了豳地，又与公刘生活在一起了。



周原出土西周早期墓葬文物

公刘居豳，在开发荒原的过程中，周族的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据说这时已经能够“取厉（lì，砺的本字）取锻”，使用天然的陨铁制作生产工具。

因为公刘继承并恢复了后稷重视发展农业的好传统，为以后周族的崛起打下了基础。所以周族的后人对他的功劳念念不忘，在《诗经·大雅·公刘》的诗中歌颂他说：

品格忠厚高尚的公刘呵，	（笃公刘，）
带领我们迁居豳地。	（于豳斯馆。）
渡过了渭河不怕困难，	（涉渭为乱，）
捶打陨铁做工具。	（取厉取锻。）
发展农业，一切都从头做起，	（止基乃理，）
人丁愈来愈兴旺。	（爰众爰有。）
…… ……	…… ……
我们周族能有今天这么强大，	（止旅乃密，）
是因为你遵从祖训，不忘后稷。	（芮鞫之即。）

（三）古公居岐建周国

公刘以后，又经过了八九代，到他以后的第十世，古公亶父被立为姬姓部落的君主。古公继续实行后稷、公刘以来治理部落的各种好办法，尤其重视发展农业。古公亶父不仅善于处理全部落的政事，而且为人心地善良，对人和气，在部落中有很高的威信。

姬姓部落人民生活逐渐富裕，引起了临近的戎狄部落的贪欲。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处在比周人要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专以打仗和掠夺邻人的财富为光荣。熏育戎狄就处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熏育部落向古公亶父居住的豳地大举进攻，蛮不讲理地向姬姓部落勒索财物。古公没有办法，只得把不少财宝给这些“野蛮人”送去。但这并没有使他们的无理要求得到满足，反而又提出要占有古公部落的大片土地作为牧场，还要把古公部落的成员变为放牧牛羊的牧奴。

古公部落的人听到了熏育的苛刻条件，一个个义愤填膺，表示要与戎狄决一死战。古公面对前来请战的人群大声地说：“你们大家让我当君主，为的是让我给你们多办些好事。现在戎狄发动战争，目的是夺取我管理下的这个部落的土地与人民。想一想吧，你们在我治理下生活，与在戎狄那里生活不是一样的吗？你们下决心要与戎狄打上一仗，还不是为了我？战争一打起来，你们当中有人的父亲或儿子就要战死。他们为我战死，和我把他们杀了有什么区别？我不忍心干这样的事！”古公劝了半天，众人也不肯散去。古公为了减少老百姓为了自己与戎狄打仗的伤亡，便带着很少的几个亲信，晚上悄悄离开了居住多年的豳地。

古公一行人渡过了漆水和沮水（今陕西麟游县），时而傍水而行，时而爬山过岭，越过了梁山（今陕西麟游县东南部），到了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下的平原上就停止前进了。古公和一个姜姓的羌族妇女结了婚，在这片平原上定居下来。居住在豳地的人们见古公离开他们走了，十分怀念地说：“古公可是个好人，我们决

不能离开他！”便也都带着一家老少赶到了岐山。其他部落那些羡慕古公为人的人，也纷纷跑到古公的部落来居住。

岐山南面是一片平原，自古以来人们都称它为“周原”。传说这片土地十分肥美，连长出的苦菜都是甜的。古公亶父一下子就看中了这个地方，他向上帝和祖先进行了一番卜问，得到的也是好兆头，便在这里建起房子并定居下来。从此，姬部落的人就被称为“周人”——即居住在周原的人。

古公亶父一面要本部落的人开垦周原的土地，修好田界和排灌的沟渠；一面又命令官吏们监督人们加紧修起一座座宗庙和宫殿。在宗庙和宫殿的外面，还修起了坚固的城墙。古公又下令改革“戎狄之俗”——即原始氏族社会的残余习惯，并设置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等五官有司。耸入云霄的宗庙和宫殿，使周人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坎。坚固的城墙和壕沟，是埋葬周人氏族制度的坟墓。周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古公亶父成了这个才诞生的周国的君主。古公亶父后来被周武王追尊为太王。后人在《诗经·鲁颂·閟宫》诗里歌颂他的功绩说：

后稷好后代，　　　（后稷之孙，）
第一周太王。　　　（实维大王。）
定居岐山下，　　　（居岐之阳，）
从此灭殷邦。　　　（实始翦商。）

（四）文丁杀季历

古公亶父的三个儿子太伯、虞仲和季历不仅非常尊敬他们的父亲古公，而且彼此之间也互敬互让，团结友爱。

季历的妻子太妊是一位品格高尚的妇女，她和季历一样很讨古公的欢喜。一年秋天，太妊生了个儿子，不知什么人放了一只鸟儿，恰巧这只红色的鸟儿落在了太妊屋子的窗户上，嘴里还衔个写满祝贺文字的缣帛，上面写着：“平时处事以小心谨慎压抑住疏忽

怠惰，才能保证事事成功。如果疏忽怠惰压住了小心谨慎，事情就要遭到失败。做事情不努力争取做好，就要前功尽弃。而小心谨慎，自强不息才能千秋万代不出漏子!"

古公见季历和太妊生儿子招来了"祥瑞"，心中十分欢喜，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字叫"昌"，这就是后来的文王——姬昌。古公很想将来把王位传给这个孙子，但无奈孩子太小，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胜任。按照惯例，古公死后应把王位传给太伯，但他为了把王位传给昌，想让这个孩子的爸爸先继承王位，再由昌正式当周国的君主。古公故意给三儿子取名为季历，"历"就是经历的意思，表达了他想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过渡以后，再把君位传给季历生的这个心爱的昌的意思。

太伯和虞仲理解父亲的心意，便假托为古公采药之名，跑到了南岳衡山，又从那里跑到了远离周原的荆蛮。在遥远的蛮夷之地，他们断发文身，改从少数民族的风俗，当地的人民拥戴太伯为首领，在吴地（今江苏无锡）修建了城郭，建立了国家，成为吴国的始祖。

古公病重时，太伯和虞仲曾回来探望，季历再三让位于太伯，太伯坚持不受，又回到了吴。古公死后，季历继承了君位。他对内继续执行古公时实行的发展农业的政策，对外争取团结各国诸侯，周族的力量又有了发展。他为了争取强大的商王朝支持，在商王武乙三十四年与商王朝改善了关系，亲自到商都朝歌去觐见武乙。武乙十分高兴，赏给了王季 30 里的大片土地，还赏给他 10 双美玉做成的大璧和 8 匹好马。王季有了商王朝的支持，开始对长期欺侮他们的戎狄进行反击。在与商王朝恢复关系的第二年，也就是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历率领军队征伐西落鬼戎。西落鬼戎的不少部落被周人打败，12 个部落的首领做了俘虏。

王季出师告捷，不仅一洗多年受戎狄欺侮之耻，而且获得了大片土地和大批奴隶，使国力得到了加强。到了商王文丁时期，王季又率领周人去攻伐燕京之戎。但这次军事行动失败了。文丁四年，

王季总结了上次伐戎失败的教训，又去攻伐余无之戎，这一次大获全胜。就在这一年，商王文丁看到季历很有才干，封他为殷牧师，管理商王朝的畜牧业。季历虽然身为商王朝的官吏，但一直也没有停止对戎狄的军事行动。文丁七年，季历又去攻伐翳（yì）徒之戎，将他们打败，并杀了他们的三个重要大臣。季历通过这一系列战争，解除了戎狄的威胁，保证了周王国边境的安全和扩大了疆域。在不断的战争中，周族统治者获得了大量财物和奴隶。

周族的积极向外扩张和势力的不断发展，逐渐构成对商王朝的威胁。就在文丁十一年，商王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把季历杀死了。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继承了君位，这就是后世有名的周文王。

（五）先周文化探索

所谓先周文化，指的是周人在灭商以前形成的考古学文化，对探讨周民族的起源和周族在灭商以前的社会面貌很有意义。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在周人早期活动地区，即现在的渭水、泾水流域，发现了不少先周遗址。特别是在漆水下游的武功一带，传说中后稷所封的邰地就在这里。1981 年在武功镇以东半公里的郑家坡村南，发现了一处面积较大的先周遗址。遗址里发现了先周房基 17 座、灰坑 15 个、窖穴 3 个、陶窑 2 座。还出土了大批先周遗物，除陶、石器外，还发现有铜镞、卜骨、陶人头像等遗物。郑家坡遗址的发掘，为先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典型和全面的资料。经考古学者研究，一种意见认为先周文化是一种具有自己特色并受到



西周蟠龙兽面纹罍

夏、商文化和姜戎族影响的土著文化，它为灭商以后的西周文化开了先河。正是创造这一古老文化的周民族，灭商以后成了周王朝的主宰者。

另一种意见认为，周人最早居住在现山西南部的新绛、闻喜一带，根据就是这里有稷王庙、后稷庙和姜嫄墓等和有关周人始祖的传说。证明周文明的曙光最早应来自山西。

有的学者认为，兵家之祖姜尚应就是羌族的首领。姜太公垂钓渭滨的传说，正说明他是居住在渭水上游一带羌族的部落酋长。而周文王与姜尚遇于渭阳，象征着羌族与周族为了反商的共同目的，联合起来了。羌人本是一个强悍的民族，战斗力很强。因此周羌盟军在与商王朝的战斗中，羌人总是首当其冲。西周王朝建立以后，随同武王东征的姜（羌）族首领被封在齐、许、申、吕等地，乐不思归，逐渐融合为中原华夏族的一部分。而那些乐土重迁，留在西方的羌人，仍然在甘、青一带过着畜牧和游猎的生活。

以上关于先周文化来源问题的陕西“土著”说和自山西“迁入”说，反映了学术界对周民族起源问题研究的深入。虽然目前各家还是各执己见，但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问题的解决是指日可待的。尽管先周文化的来源问题还在争论不休，但先周文化形成以后，周民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是争论各方一致承认的。先周文化反映了周人已定居，并从为数不多的几个地点逐渐发展到整个泾渭地区。也反映了周人与姜戎、夏、商的相互联系和融合，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被打破了。此外，先周墓葬的大小不一和出土遗物的多少不同，反映了周人社会阶级分化的加剧。数量多、种类复杂的青铜武器，正是装备特殊的武装队伍所需的。凡此，都是我们前面所谈“古公居岐建周国”的有力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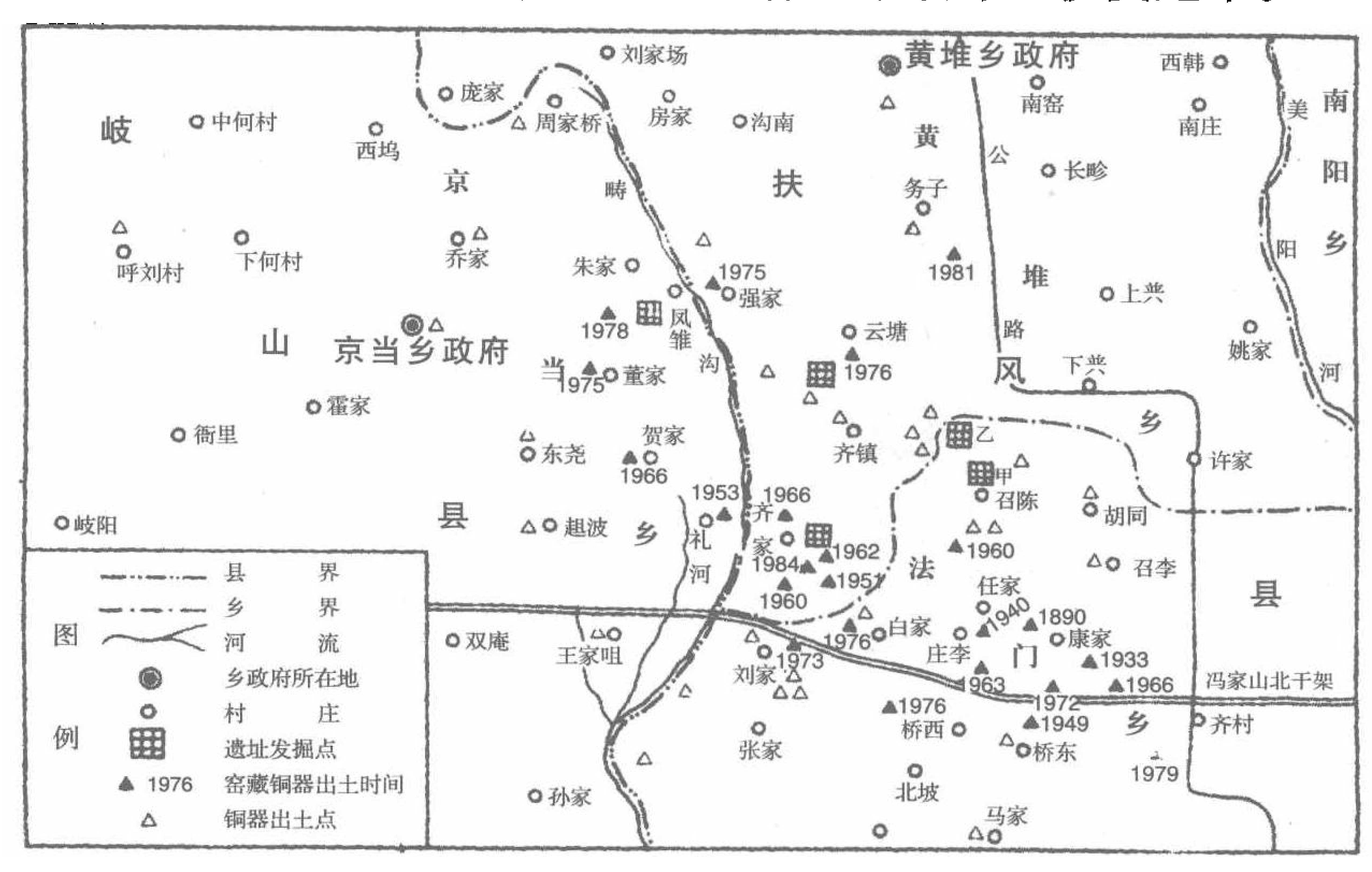
（六）周原的宗庙和宫殿遗址

根据古文献记载，周人在古公亶父时，因避戎狄，从邠（即豳）地迁到周原，在这里修建了宗庙、宫殿和城墙，建立了国家。

又经过王季、文王的经营，直到文王迁丰以前，这里一直是西周早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岐邑的所在地。

周原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北靠岐山，南面渭水。平原上河渠交错，宜于灌溉，土地肥沃，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生存，保存了许多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为了探索西周早期的历史和文化，我国考古学家在陕西岐山县京当乡和扶风县的法门乡及黄堆乡一带作了多年调查研究，进行了大面积的钻探和试掘工作。通过对发掘的丰富遗迹和大量遗物的研究，使我们对西周早期历史和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 1976 年岐山县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和扶风县召陈村西周建筑基址群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西周早期都城岐邑的地望及城市的布局提供了珍贵资料。

据学者研究，凤雏建筑基址是西周早期的宗庙。这座宗庙是一座南北长 45.2 米，东西宽 32.5 米，总计 1 469 平方米的坐北朝南的廊院式建筑群。这座埋在地下深约一米左右的 3100 多年前的周代早期建筑物，虽然地面上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但地下部分保存较为完好，全部房基建筑在一个约 1.3 高的夯土台基上。我们可以根据建筑基址的分布情形，把这座雄伟的宗庙布局恢复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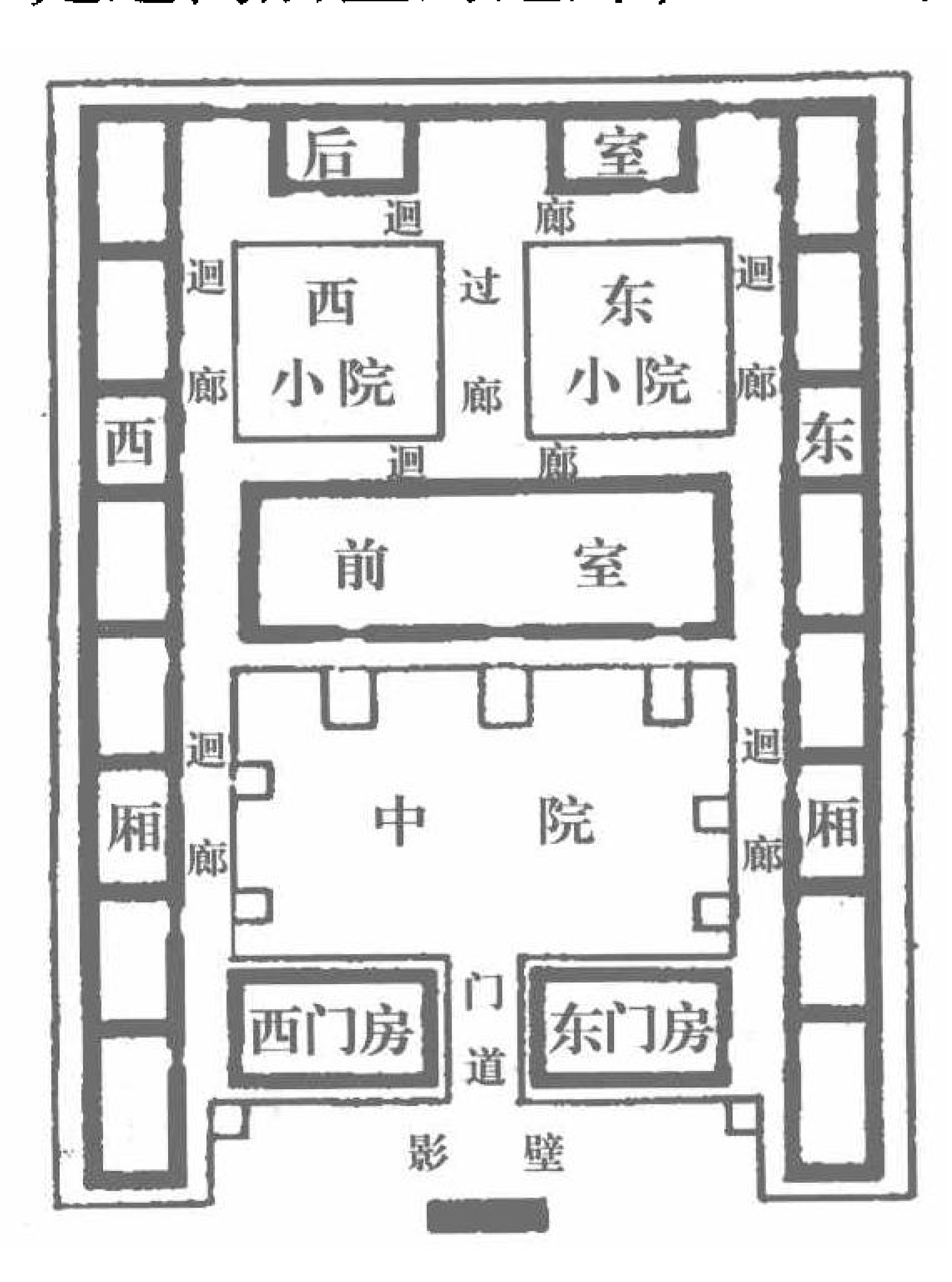
岐邑遗址分布图

宗庙的最前部是“影壁”。影壁东西长4.8米，厚1.2米，残高0.2米。从影壁残基看，当时在壁外抹有由细砂、白灰和黄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墙皮。从影壁东部有南北排列两块石柱础和西部的木炭痕迹看，当时影壁上面当盖有护顶。

门道。影壁北部4米处是门道，门道两边是各3间的东西门房。门道南北长6米，东西宽3米。门道的中间地面稍高，南北两面有缓坡，北面和墙壁都用三合土涂抹，光滑坚硬。门道的中间偏北的地方，有一个门槛。通过这个门道，就到了宗庙的中院。

宗庙的中院是一个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2米的大院。院的东西两边各有两个三层的台阶通往东、西走廊，北边也有三个三层的大台阶通向前堂大殿。前堂大殿是这座建筑基址的主体，为一个面阔六间，进深三间，总面积104.9平方米的建筑物。大殿前面可能有三个门通向中院，后面也有门通向回廊，从此可经过东西小院中间的过廊到达后室。

东西小院和后室。东西小院大约各有60多平方米，小院中间是通向后室的过廊，两边都有柱洞，当时上面有盖顶。通过这个过廊，就到了东西排列的五间后室，后室门向南。这座以门房、前堂、后室为中心的建筑物两边，还各有南北排列、左右对称、面向院内的8间厢房。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建筑是由若干个建筑组合而成的建筑群。



凤雏甲组宫殿基址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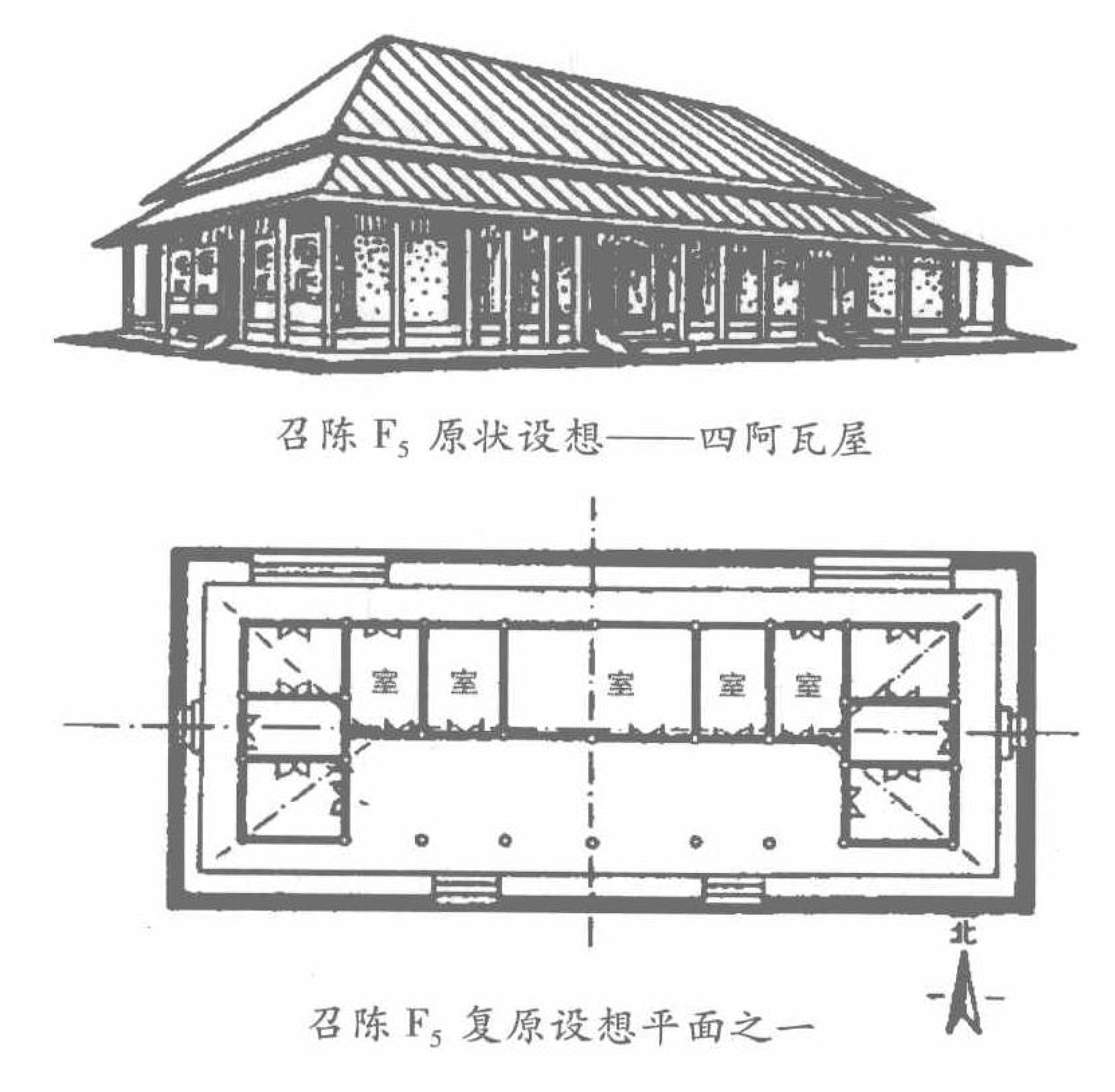
此外，在东门房台基下，发现了一条用陶管做成的南北走向的水道。在后院过廊中部的下面，也发现了一条用卵石砌成的东西向的水道，通过东小院和第六东厢房，就可把水排到东边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水沟内，这是当时的排水设施。在这里，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瓦。瓦为泥条筑成，背面饰有绳纹，并带有瓦钉或瓦环。把这样的瓦安置在大殿屋

脊或天沟上，可以防止雨水冲刷屋面和延长屋顶的寿命。营造技术的进步，说明周人的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就在这座雄伟的宗庙里，西周早期的国王们，很可能都来这里举行过各种大典。他们或祭祀祖先神明，祈求对他们的保佑；或献俘告捷，庆祝对戎狄战争的胜利；或灼龟卜筮，占问国事的疑难……这座宗庙是西周早期政治活动的中心。

在发掘凤雏村西周早期宗庙遗址的过程中，1976 年在建筑基址的西厢房二号房间内的两个窖穴里又有重大发现，这就是 1.7 万多片西周早期甲骨的出土。这批甲骨，卜甲 1.6 万余片，为龟腹甲。卜骨 300 余片，为牛的肩胛骨。目前已清洗出有文字的卜甲 290 多片，不同的单字有 1 000 多个。每片卜甲字数多少不同，少的一字，多的达 30 多字。

与此同时，在距岐山凤雏宗庙遗址东南方只几里路的地方，即今扶风县召陈村也发现了一处大型西周建筑基址群。在召陈遗址仅发掘的 6 375 平方米范围内，就发现了建筑基址 15 处。其中有两处基址（基址七、基址九）是属于西周早期的，而其余的 13 座基址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判断，应为西周中期修建并一直使用到西周晚期才废弃。遗址里也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瓦。瓦有板瓦和筒瓦两种，并分为大、中、小三种不同的型号。板瓦在瓦背或沟面上还带有单钉或双钉，以便在建筑物上加固。根据柱础的分布情况，学者们将有的基址复原为进深三间、面阔八间的“四阿瓦屋”，也有的基址被复原为进深三间，面阔七间的“四阿瓦屋”。



召陈 F_5 原状设想——四阿瓦屋

召陈 F_5 复原设想平面之一

虽然召陈遗址的各建筑基址之间关系目前我们还不太清楚，但

这一座座气势雄伟的四阿瓦屋式宫殿，应当是西周奴隶主举行各种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决不会是寻常的村落遗址。

周原凤雏宗庙和召陈宫殿群的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宫室制度和古代建筑艺术的发展有很大学术价值，而且也为探索西周岐邑的中心地区和西周中晚期王室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外，在周原一带历年还有大量重要的遗迹和遗物的发现，其中以青铜器最为重要。这些铜器有的出自墓葬，有的出自窖藏，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形多样，造型精美，花纹瑰丽多变，堪为艺术珍品；此外，不少铜器上都有长篇铭文，为西周史的研究提供了大批重要资料。其中 1975 年岐山董家村发现的铜器窖藏，共出土鼎、簋、鬲、盉、豆、盘、匜等铜器 37 件。1976 年扶风庄白发现的微史家族铜器窖藏，共出土铜器 103 件，解放后出土铜器铭文字数最多的“史墙盘”，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件稀世珍品；在扶风县齐家村，还发现了居住遗址。在扶风云塘还发现了一处制骨作坊遗址，仅废骨料一项就出土了近 2 万多斤，可见当时规模之大。还出土了一些手工工具，如铜刀、铜锯、铜钻等及磨骨用的砺石。从遗址中出土的半成品看，此处应当是一处以生产骨笄为主的作坊。在制作骨笄时，先将兽类的四肢骨截去两头关节部分，再将骨剖成骨条加以削锉，然后雕琢磨光成器，制作工艺非常精细。可以看出，当时作坊内部已有专门分工了。

文王迁都于丰以后，岐邑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虽然如此，由于它是周族文明的发祥地，不少大贵族在这里保有封地，或死后归葬这里，所以这里的宗庙、宫室一直存在于整个西周一朝而未废。到了西周末年，平王东迁以后，由于戎人入侵，岐邑毁于战火，从地面上消失了。直到 3000 多年后的今天，经过我国考古学家的努力，这座掩埋在地下的古老西周早期都城才得以重见天日，在世界和我国的文化宝库中大放异彩。

（七）西周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

根据古文献记载，周人和商人一样，很早就使用乌龟壳占卜吉

凶了。还早在古公亶父迁居周原的时候，就曾郑重其事地用龟壳进行了一番卜问，所得兆象很吉利，周人才开始在这里定居下来，这就是我们在前一部分“周原宗庙和宫殿遗址的发现”所引用的《诗经·大雅·绵》篇所再现的史事。武王时，为了继续向东方发展，又将都城从文王所建的丰京迁到镐地。为了能使这一重大的行动得到上天的保佑，周武王也照例虔诚地用龟壳进行了一番占卜。《诗经·大雅·文王有声》里这样唱道：

武王占卜问苍穹，　　（考卜维王，）
东进可否迁镐京？　　（宅是镐京？）
灵龟呈兆示吉利，　　（维龟正之，）
一座新城矗沣东。　　（武王成之。）
武王眼光远又明！　　（武王烝哉！）

此外，在武王伐纣出兵之前和周公营建洛邑的时候，都曾举行了占卜。因此，周人和商人一样，凡是有重大政治或军事行动，都免不了用乌龟壳进行一番占卜，或用蓍草进行一番问卦，以期得到老天爷的护佑。

殷人用乌龟壳和牛肩胛骨进行的占卜活动，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遗物。这就是自 1899 年以后，先后出土的 15 万片殷墟甲骨文，真可谓是“其富五车”了！可奇怪的是，几十年来一片西周甲骨文也没有见到。人们不禁要问：是否商朝灭亡以后，“失国霾卜”，甲骨文就不复存在了呢？虽然有的学者依据古书的记载，推测在陕西一带周人活动地区将会有周代甲骨文发现。但是信则信矣，疑则疑矣。推测毕竟是推测，学术界还是形成了一种凡谈甲骨文，则必是殷商之物的传统看法。

直到 1954 年，山西省洪赵县坊堆村才第一次发现了一片周代有字甲骨。此后，在陕西沣镐遗址、北京昌平白浮、陕西周原凤雏遗址和扶风齐家遗址，不断有西周甲骨出土。其中以岐山凤雏村宗庙基址西厢二号房内的两个窖穴出土为最多。窖穴 H_{11} 和窖穴 H_{31} 共

出土甲骨1.7万片以上，有文字的290多片，是建国后出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批，可以说是打开了两座“地下档案库”。以上几处共发现了西周有字甲骨300多片，共有文字1 000多个。西周甲骨被发现以后，吸引了国内外的芸芸学子对它进行研究、探索，逐渐形成了甲骨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西周甲骨学。

西周有字甲骨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和卜辞，另一种是记占筮用的“筮数”，也有人认为这种由数字组成的符号就是“八卦”。卜辞和筮数较少，多为记事文字。

西周甲骨文字较少，最多的一片也只有30多字。虽然它文辞简约，但它与金文、考古材料一起，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为史料不多的周代历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首先，西周甲骨中有一部分是文王时代的，说明周人自文王时起，就已经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这本身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周文王已是一个具有较高文明的周王国君主。其次，西周甲骨再现了不少周初的重大史实，不少可以和古文献的记载相印证。可以说，西周甲骨是周初历史的“大事记”。周文王得姜尚，也是周朝建立前的大事。西周凤雏出土甲骨里有文王“渭渔”的记载，说明古书里所讲文王于渭滨得姜尚当非子虚乌有。文王受命以后，向周围各国用兵，这在西周甲骨里也得到了反映。

此外，西周甲骨中还出现不少官名，如太保、毕公、虫（崇）伯、周方伯等，对研究商末周初的官制很有意义。有的还记有一些方名，如“蜀”、“楚子来告”等，为研究商周关系及周与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关系提供了珍贵资料。

西周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它在甲骨学和西周史研究中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愈益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的注意。关于西周甲骨的内容、价值及学术界对西周甲骨研究的进展，可参阅拙著《西周甲骨探论》一书。今后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西周甲骨出土，我们相信，通过国内外学者们

的努力，西周甲骨学和西周史的研究将会出现一个新局面。

（八）“八卦”与传说中的羑里遗址

我国商周奴隶主统治阶级，不仅用龟壳占卜吉凶，以指导自己的政治军事大事和日常生活，而且还用蓍草问卦卜筮，这就是卜龟、卜筮。两种占卜所使用的材料不同，所用的方法也不一样。占问的时候，有时单用卜龟，也有时单用卜筮。为了重大事情的决疑，往往两种方法交替使用。西周甲骨上数字组成的符号，不论我们管它叫“筮数”，还是叫做“八卦”，都说明它是与卜龟有一定的关系，但又是不同于卜龟的另一种占卜的方法，应与“八卦”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谓“八卦”，就是用阴（—）阳（--）符号排列出来的八个不同卦形。阴、阳符号叫做“爻”。阳爻为奇数，称为“九”（或七），阴爻为偶数，称为“六”（或八），每卦由三爻组成。根据排列组合的道理，三个阴阳爻可以排列八次，这就是八卦的卦象。八卦的卦名叫乾（☰）、巽（☴）、坎（☵）、艮（☶）、坤（☷）、震（☳）、离（☲）、兑（☱）等，也就是八个经卦。八个“经卦”再两两相重，共可组成六十四个别卦。每卦都有自己的卦象、卦名、卦辞。组成每个别卦的六爻从下向上排列，即初、二、三、四、五、上，每爻都有爻辞。这就是2000多年来被人们视做神秘殿堂的《周易》。

这部托名文王所作的《周易》，是我国古代最有名的筮书。巫史们就是根据每卦的卦象、爻象来占卜吉凶，并根据固定的卦辞、爻辞做出随心所欲的解释。但《周易》一书里也保存了不少古代社会经济史料。

《史记·周本纪》说，因为崇侯虎在商纣王面前说周文王的坏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史记·殷本纪》“正义”说：“羑城在相州汤阴县北九里，纣囚西伯城也”。在今天河南省汤阴县以北4公里左右，有一隆起在周围平地之上的台地，就是传说纣囚文王

的地方——羑里。周文王"演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北堂书钞》卷九十九），就是在此地被关押时演成的。

羑里的高台南北长106米，东西宽103米，面积大约10 918平方米，台子的高度有5米左右。虽然商代监狱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或许本来就是子虚乌有），但在台基的断崖上和周围的农田里，却可以经常捡到兰纹、细绳纹陶片，也可以捡到粗绳纹的陶片或口沿面起棱的鬲片，以及蚌器、骨器、石器等等。从这些陶片判断，这里应当是一处从龙山文化时期一直延缓到商末周初的古代文化遗址。遗址的堆积年代确实与商末周初相当。

二、周公东征和穆王西行

周灭商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基本上占据了原商王朝统治的地区。为了控制新征服的广大地区，周武王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仍在殷墟管理殷民，并通过管叔、蔡叔、霍叔监视武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三监"。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继位，周公旦辅佐他治理周国。武庚利用"三监"与周公的矛盾，乘机发动了复国的战争。周王朝经过三年多的东征，终于取得胜利。为了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周公大规模营建洛邑，作为统治东部广大新征服地区的中心。与此同时，继续大规模"封建亲戚"，相传武王、周公、成王等先后建立了71国。这些新的封国，成为周王朝统治新征服地区的大小据点和一座座屏障。康王以后，昭王曾使周王朝的势力达到汉水流域。穆王又对西北的犬戎进行征伐。相传，还与遥远的中亚各族人民发生了友好联系。穆王从西方回来以后，又平定了东夷部落的徐、越等国的叛乱，巩固了周王朝在东南地区的统治。至此，周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幅员辽阔的强盛国家，达到了我国奴隶社会的高峰。

（一）建立"三监"

武王虽然在牧野打败了殷王朝的军队，灭掉了商王朝，但没有

办法消灭人数众多的商族遗民。以少数军队征服远离王都丰、镐的广大殷人统治地区的周武王，曾就如何控制这些新征服地区，与太公望、召公、周公等大臣进行了一番策划。

武王首先召见了姜尚。据说他向这位习惯于疆场上戎马倥偬生活的军事统帅询问道："现在虽然灭了商朝，但我们怎样处理商族的老百姓呢?"姜尚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他不假思索地说："有一句古话叫做'爱屋及乌'。您如果喜欢一个人，就会连这个人屋子上的乌鸦都觉得顺眼。如果您憎恨一个人，一定对他一家老小都看不惯。依我看，既然罪恶深重的商纣王已经死了，对他治下的老百姓也不必客气，干脆来个快刀斩乱麻，全部杀掉!"武王摇了摇头说："这样恐怕不行吧?"接着又询问了召公。召公倒还不像太公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主张大开杀戒，而是建议："依我看哪，把那些曾经跟着商纣王反对过我们的人杀掉，只把那些没有表示过反对我们的人留下来!"召公的办法比太公望缓和得多了，但武王听了还是不敢贸然同意，最后又询问了周公。


西周青铜戈

周公深知人数不多的周族要想稳固地统治具有600多年历史的殷族，就必须充分利用殷人内部原来的矛盾，实行分化瓦解的手段，把商族与周族的民族矛盾转化为殷族内部的斗争。因此，他向武王建议说："依我看，还是让他们各自住在原来的地方，耕种原来的土地，也不必改变他们原来的地位。只要是这些人服从我们周朝，就可以提拔他们当官!"周武王听了周公的话，觉得正中下怀，十分高兴地说："你讲的这个道理太深刻了！用你提出的办法治理殷人，又何愁他们不顺从我们，天下大治呢!"

武王采纳周公的建议，将殷墟一带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让他

继续在这里管理商王朝的遗民。但对他并不放心，周武王还把自己的弟弟管叔鲜封在现郑州一带；蔡叔度封在殷墟以南的上蔡一带；霍叔封在殷墟以北的现山西霍县一带。武王让他们在暗中监视武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监”。

除此以外，周武王还采取了一系列争取商族民心的措施。首先就是给那些商王朝有威望的大臣平反昭雪，以争取商奴隶主与周王朝合作。武王命令召公将那个因不满纣王的倒行逆施，装疯卖傻而被关起来的箕子放出监狱。还命令毕公将其他被纣王关起来的贵族放了出来；为了表示对敢于犯颜直谏比干的尊敬，武王特意命令闳夭到比干墓前去凭吊，并把他的坟墓重修得又高又大；对活着的忠臣商容，周武王更是抚慰有加，把他居住的地方修整一新并立下特殊的标记，表示周王朝对这位贤人的敬重；其次，周武王又采取了一系列争取商族下层民众支持的措施。他命令南宫括将纣王藏在鹿台的财富都散发掉，又把巨桥仓库的粮食分给那些没吃没喝的人，从而使不少破产平民得到了好处。这些措施，使被征服的商族与作为征服者的周族之间的尖锐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和。第三，大力争取居住在新征服地区的古老部族。原来商王朝的土地上，除了生活着商族以外，还分布着神农氏之后、黄帝之后、帝尧之后、帝舜之后、大禹之后等古老部族。这些部族原来在商奴隶主控制之下，与商王朝存在着矛盾。周武王为了取得这些部族的支持，封神农之后于焦（今河南陕县）、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今北京一带）、帝舜之后于陈（河南淮阳）、大禹之后于杞（河南杞县）。这些在周武王扶植下复了国的古老部族，自然对周王朝感激涕零，他们也成为监视和牵制商人活动的重要力量。

周武王虽然一举灭掉了商王朝，但周王朝开始时并没有力量深入到原来受商王朝控制的徐奄、薄姑等大片地区。为了加强周王朝对东方的控制，周武王在从西向东的黄河中、下游分封自己的功臣和亲戚，又建立了一批周人控制下的据点。这些被封的大臣和亲戚，成为加强西周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二）周公东征和“保卣”铭文

武王灭商以后，又回到了西方的镐京。但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清醒地看到，偌大一个商王朝，牧野一战就顷刻瓦解，确实有许多教训值得吸取。虽然周王朝从原来商王朝的附属国一跃而成为征服者，但处理殷王朝的遗民和对广大东部地区的统治确实使武王大伤脑筋。周武王每想到这些问题，心里就很是紧张，经常搅得他夜不能寐，食不甘味。有一天，周公旦发现武王心事重重，不由问道：“尊敬的天子，您大概有什么心事吧，不然怎么睡不好觉呢?”武王的心事被周公猜透了，便索性把自己的想法向周公和盘托出说：“是呀！我总是在想：因为老天爷不保佑商朝了，所以在不到61年的时间里，商朝每况愈下，终于被我们灭掉了。而当初老天爷保佑商朝灭夏建国时，特意降下有能力的人才360多名。虽然这些人并没有为商朝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也使商朝延续了600多年。今后老天爷对我们周朝保佑不保佑呢?每想到这些，我又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接着，武王又对周公谈了自己对巩固周朝统治的一套想法。他说：“我们一方面要把那些敢于反周的人，像对待纣那样无情地杀掉。另一方面还要想方设法争取更多的人服从我们。但是，为了能把周朝的德政传遍天下，最根本的还是要把我们西方的根据地建设得更加巩固。此外，伊、洛之间过去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虽然地势平坦，没有什么险阻可守，但这里是天下之中，形势很是重要。伊、洛一带就像老天爷给我们盖好的房子一样，只要不离这‘天室’太远，老天爷就会永远保佑我们！……”周武王选定了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邑，就是看到了从这里既可以方便地到达西方的镐京，也可以加强对东方新征服地区控制的优越地理条件。

周王朝灭商二年以后，周武王由于日夜劳神焦思，一病不起。周王朝的大臣们深知周朝的统治地位并不十分巩固，而且当时成王年少，武王如果死去，他很难应付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所以一

个个都心急如焚。据说，周公为武王的病曾向上帝、祖先祈祷。他命令太卜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说：“您们的子孙武王积劳成疾，卧病在床。您们若需要他回到天上去侍候的话，还不如让我周公旦去代劳呢！您们这些先王要保佑武王治理好周国，为后世子孙们打好永远统治天下的基础。只有这样，您们的宗庙里才会香火不断，千秋万代受到后世子孙的祭祀！”周公祈祷以后，虽然由于精神作用，武王的病稍微好了几天，但没过多久，武王还是死去了。

武王死后，成王年纪很小，所以暂时由周公代替成王治理周国，历史上称为“周公摄政”。周公权力的增大，引起了管叔、蔡叔等人的不满，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独揽大权，将对成王不利！”一时欺骗了很多人，连与周公共事多年的燕召公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周公向周王朝的重臣师尚父和召公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说：“经过我们的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的几代艰苦创业，周朝才有了今天的规模。一旦在我们这些人手里发生了叛乱，使周朝失地或亡国，又有什么脸面见这些先王于九泉之下呢？而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形势是：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年纪小，天下人心不服。我甘冒篡国的嫌疑，暂时代替年幼的君主管理国政，还不是为了能保住我们周王朝的江山！”姜尚和召公理解了周公的磊落用心，支持他辅佐成王并帮助他安顿了其他的姬氏兄弟。

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不甘心商朝的灭亡，利用了武王新死、成王年幼和管叔、蔡叔、霍叔与周公的矛盾，想乘机摆脱周王朝的控制。他与管叔、蔡叔、霍叔勾结起来，并纠合了东方的徐、奄、熊、盈、薄姑等过去殷王朝的属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周公奉成王之命，与太公望、召公奭等带兵东征，首先打败了武庚和管叔、蔡叔等人，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把蔡叔等人流放。接着又挥师东进，对那些与武庚一起作乱的各国大加挞伐，一举灭掉了参与叛乱的东方各国。这次东征，前后共用去三年多时间。自此，周王朝消灭了东方诸国的反抗势力，开始深入东方，逐步实现了对东方广大地区的控制。

周公东征这一关系到周王朝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在周初铜器的铭文上也多有记载。一些传世铜器，特别是解放以后发现的一件“保卣”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史料。“保卣”铭文是这样的：

乙卯，王令保及
殷东国五侯，征（诞）
兄（荒）六品。蔑曆于
保，易（锡）宾。用乍（作）文
父癸宗宝尊彝，遘
于四方，迨（会）大祀佑
于周。在二月既望。

这段铭文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说：“乙卯这一天，成王命令太保（召公奭）抓住了武庚以及跟随他作乱的东方五国的首领，一举灭掉了这六个国家。成王慰劳并奖赏了太保。太保也很高兴，对其属下也进行了赏赐。太保的下属得到赏赐以后，觉得很是荣耀，为了纪念，在二月既望（即每月的十五六日至二十二三日）的这一段时间，作了个供祭父亲用的铜卣，而且还可以带着这个铜卣参加周天子与四方诸侯举行的盟会和助享天子的大典。”

这件铜器的铭文证明了周公东征时，身为太保的召公奭也立下了不少功劳。召公虽然在周王朝的地位排在太公望和周公旦之下，但他在文王时就已地位显赫。武王死后，召公又协助周公安顿和团结了王室，对粉碎管叔、蔡叔等人的政治谣言起了不小作用。正因为召公是周王朝的几代重臣，所以在武庚纠合东方各国叛乱时，召公才能被成王委以重任，把抓获殷东部叛乱的五国头目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他。这与《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征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是一致的。

商朝灭亡后，殷人和殷人在东方同盟国中反周的势力还很强

大。虽然武王初封了太公、周公、召公在齐、鲁、燕等地，但他们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控制这些地区，所以迟迟不能到达他们的受封地区。周公第二次东征以后，由于打垮了东方的反周势力，才逐渐实现了对徐、奄、薄姑等地的控制。为了加强周王朝对这一广大地区的控制，成王在周公等人的建议下，又进一步“众建亲戚”，把大片的土地连同人民一起赏赐给自己的亲戚和功臣。这种分封行动，一直持续到康王的时候，这一批又一批新建立的诸侯国，实际是周王朝在东方建立的一个个据点。

（三）周初的大规模分封

周公东征以后，又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的大规模分封诸侯。据传周公分封的七十一国之中姬姓子弟就占了 53 人之多。这些被封的大小姬姓诸侯，都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后人。



周初大分封图

如：文王的弟弟被封在东虢（guó）、西虢；文王的儿子们被封在管、蔡、郕（chéng）、霍、鲁、卫、毛、聃（dān）、郜（gào）、雍、曹、滕、毕、原、酆（fēng）、郇（xún）；武王的儿子被封在邘（yú）、晋、应、韩；周公的儿子被封在凡、蒋、邢、茅、胙、祭（zhài）。这些在广大新征服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大、小封国，既是一个个统治种族奴隶的政治中心，又是保卫周王朝的大小据点。

周公杀掉武庚以后，首先把对周人比较驯顺并在殷人中有些影响的微子封于宋地，让他统治一部分殷王朝的遗民。接着就又大规模地分封自己的兄弟和亲戚。

康叔是武王和周公最小的弟弟，被封在黄河、淇水之间的殷墟，建立了卫。康叔分得大批商人奴隶，主要有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殷民七族”。卫地过去是商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带，康叔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实行的是维持殷朝旧有的奴隶制和阶级关系的政策，并继续使用商朝的旧有法律。在经济政策方面，卫康叔改变了原来的所有制关系，把卫国的大片土地都按照周朝的办法重新分配，从而使自己的子弟——大、小贵族都获得了很多土地并由商种族奴隶为之耕种。这就是《左传·定公四年》所记载的康叔实行的“启以商政，疆以戎索”的政策。

周公很担心康叔年纪较轻，没有统治经验而治理不好殷人故地，因此一再告诫康叔说：“你到了卫地以后，一定要向殷朝遗民中有威望的贤人请教，问问他们殷朝是怎样兴起的，又是怎样灭亡的？要经常吸取这些教训，但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爱惜民力！”他还用商纣王沉湎酒色、宠幸妲己以致国破身亡的例子告诫康叔，要他治国小心谨慎。在记载有周公与康叔谈话的著名古代文献《康诰》中，周公为康叔出谋划策，希望他能牢固地统治卫国的殷切心情，跃然纸上。周公让康叔到卫国以后，要大力传布周王朝的德音，以便用周族的道德规范去改造那些被征服的殷民的旧俗陈习。周公还吸取了商纣王严刑峻法失去民心的教训，告诫康叔在卫地执行刑罚时一定要宽、猛结合。对那些虽然罪恶不大，但明知故犯而坚持不改的人，要毫不客气地杀一儆百。而对那些虽犯大罪，但不是出于

故意而又有所悔罪的人，要适当地减轻惩罚。此外，周公给康叔出主意，让他选取殷民中有才能的人当官，通过取得这些人的支持，实现对广大殷遗民的统治。如此等等。

康叔经过周公的一番耳提面命，茅塞顿开。他到了卫国以后，小心按照周公的办法行事，得到了不少殷朝旧贵族的支持。由于康叔治理卫国很出色，成王亲政以后，康叔被提拔为周王朝的司寇，并得到了周王朝车、帛、旗、钟等许多礼、乐器和财宝的赏赐。

唐叔虞是成王的弟弟，被封在黄河、汾水以东方圆百里多地的唐。唐地一带原是夏人活动的中心，虽然夏朝早已被商王朝灭掉，但仍有一部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夏族人民还保持着不少夏朝的旧俗。唐叔不仅占有了夏墟的人民和土地，还获得了周王朝赏赐的大量被征服的殷人奴隶——“怀姓九宗”。唐叔在这里因其旧俗，在政治方面“启以夏政”，实行夏人传统的比商王朝要略为温和的做法，从而使夏民族对新征服者的敌对情绪有所缓和。在经济方面，因为“怀性九宗”本来就是近于戎狄的商族种族奴隶，所以唐叔把土地按照戎狄的制度在怀姓九宗中进行分配，并由他们每年向唐侯交纳一定数额的贡纳物，这就是古书《左传》里所记载的“疆以戎索”的措施。唐叔死后，他的儿子燮父迁居到晋水旁，改国号为晋。

太公望是周王朝的三朝元老，他足智多谋，能征善战，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初封于吕（今河南南阳）。武庚发动叛乱以后，他又与周公、召公等人一起辅佐成王第二次东征，为周王朝统治的巩固又做出了贡献。成王将新征服的薄姑氏土地和人民封给了太公望，太公望建立了齐国，建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以北）。此外，太保召公奭受成王之命授予太公望可以代表周王室征服那些敢于反抗的五侯、九伯的权力。太公望控制了山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其后又经过连年对夷人地区的征战，成为周初实力强大、面积辽阔的一个诸侯国。

太公望在齐国“简其君臣礼”，对齐地原来的工商业奴隶主的奴隶，仍维持其原来的隶属关系。对从殷商以来就以商工为业的齐地居民，太公“从其俗”，继续对他们“劝以女工之业，通渔盐之

利”。据说由于工商业的发展，齐国统治阶级只要从工商业贵族那里收取3/10的税收，就可以应付日常的开销了。太公望在齐国实行的这一套“平易近民”的政策，使齐国的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昔日的泻卤之地，在太公望的治理下，成为各诸侯国人民都向往的富庶地区。

武庚叛乱平定以后，周公继续留在成王身边为相，他的儿子伯禽从河南鲁山受封到奄国故地，在今天的山东曲阜一带建立了鲁国，成为鲁公。鲁公伯禽由于父亲周公与成王的特殊关系和赫赫功勋，所以受到了特别优厚的赏赐。鲁公不仅得到了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等“殷民六族”作为奴隶，还得到了大路之车、旗、夏代传下来的美玉、有名的封父宝弓等仪仗和带有城郭的土地以及大量的礼器。我们从鲁公不仅像卫、唐等国一样得到了大批奴隶的赏赐，还特别被授予使用周天子专用的礼乐和典章制度的优待等方面可以看出，鲁国在周初各封国中占有较为特殊的地位。

鲁公伯禽继续对周围的淮夷、徐戎等少数民族用兵，这在古文献《费誓》里有所记载。伯禽在出兵以前，大誓将士说：“检查一下你们身上的披挂，不准衣甲不整齐！在战斗过程中不准伤害牛马，也不能乘机乱抓逃散的奴隶和走失的牛马大发横财，你们必须把这些战利品都归还原主！战斗胜利以后，更不准私自闯到民人的家里去抢劫财物！如果有谁敢违犯我的命令，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鲁国郊外的人们，你们要准备好干粮和版筑用的木柱、木板，甲戌日要建筑与徐戎对垒用的城墙！谁要是耽误了我的大事，我就把他处以死刑！”淮夷、徐戎被打败以后，鲁国在奄国旧地的统治就更加巩固了。


堇鼎

召公奭始封于河南召陵，武王灭商以后，被改封在远离岐周的北燕，都城设在今天北京西南的琉璃河镇一带。召公的大儿子到燕地主持国政，为第一代燕侯，而召公仍留在镐京身居三公要职。周公摄政时，召公

为太保，负责管理西部地区，周公负责管理东部地区。周公权力的增大，曾引起了召公的怀疑。周公为召公列举商朝太戊时有伊陟、臣扈和巫咸，祖乙时有巫贤，武丁时有甘盘等贤臣良佐的例子以剖明自己的心迹，恳切地为他讲解历史上的这些大臣虽然权力很大，但并没有危害这几位商王的地位，反而使商王朝大治的道理。周公向召公表示："自己也要像这些人一样帮助成王治理好天下"。这一切，消除了召公对周公的疑虑。在第二次东征的过程中，召公与周公、太公一起，对平定武庚的叛乱和徐、奄等国的反抗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燕国与周王朝的首都距离较远，联系较为困难，所以在周王朝的典册里有关燕国早期的历史记载很少。近年来在辽宁、北京等地出土了一批燕国有铭文的铜器，为我们研究燕国早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周王朝通过大规模的分封，将原来商王朝的统治地区分割为卫、唐、宋等大小诸侯国。原来的商族人民，也被成族地赏赐给唐、鲁、卫等诸侯国的统治阶级，沦为周王朝大小新贵的种族奴隶，使反周力量受到了肢解。而难于控制的东部地区，随着徐、奄、薄姑等国反抗的失败，也逐渐被周公、太公望这些拥有强大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大臣所控制。东方的齐、鲁两国和北方的燕，成为保卫西方周王朝中心地区的一道屏障。自此，周王朝改变了在武王灭商后一段时间"天下未集"的不巩固局面，成为一个疆域超过商王朝的巩固奴隶制大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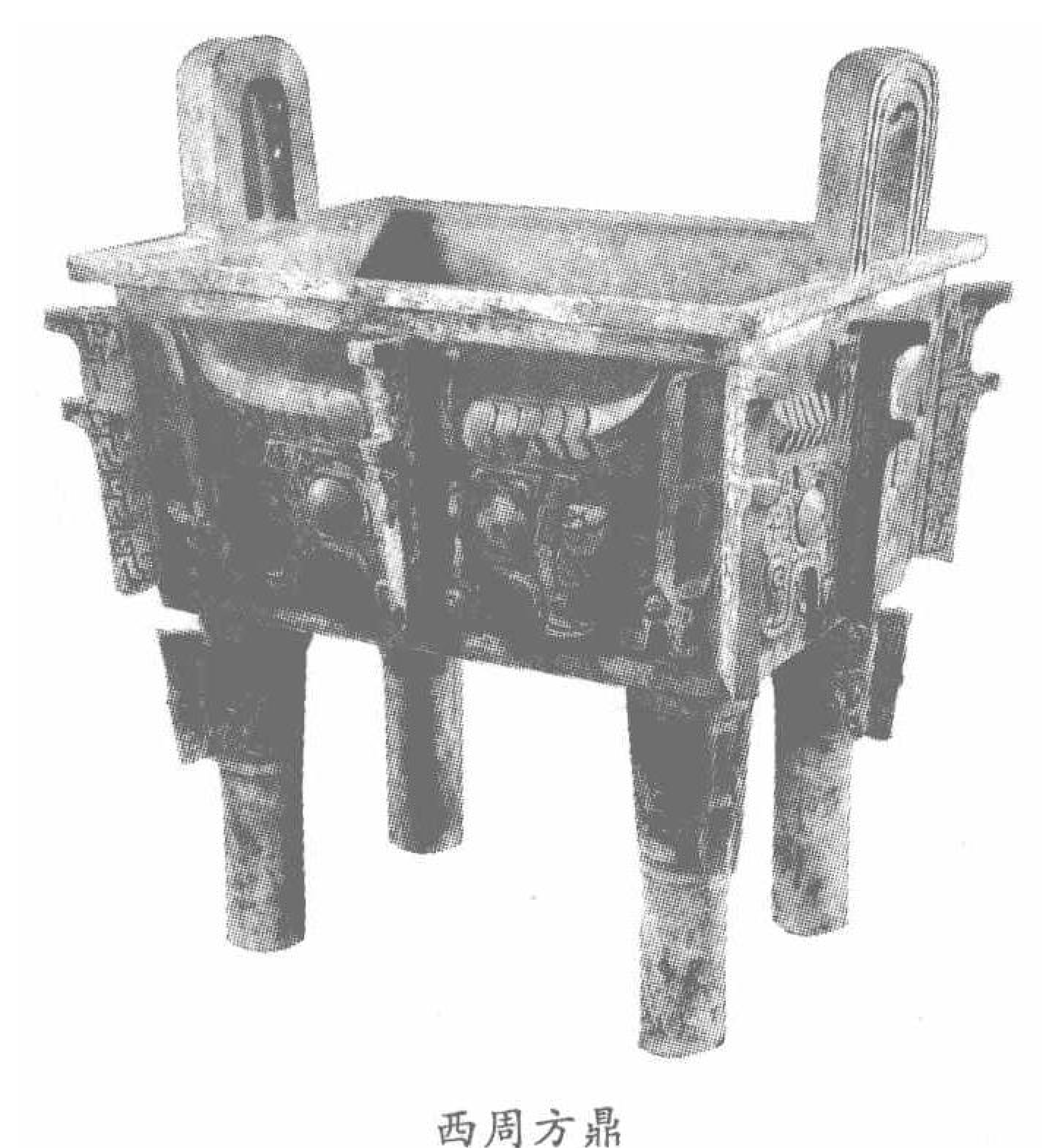
（四）营建成周和"何尊"的发现

武王灭商后，很快就发现了在镐京控制遥远的东部新征服地区，是十分不方便的。他曾假托伊、洛地区是"天室"的名义，想在位于天下之中的这一带大兴土木，建成一个能控制东方的据点，但武王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就死去了。成王即位以后，周公在进行二次大规模东征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在伊、洛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统治据点的重要性。因此，成王、周公按照武王的遗愿继续大规模营建洛邑。

为了能得到祖先对营建洛邑的保佑，召公随从成王先到丰邑文王的宗庙里进行了祷告，然后出发到洛邑去察看地形。召公在武王规划的基础上，在这里进行了一番实地测量，确定了修建宗庙、宫室的位置。召公向老天爷进行了一番占卜，得到的兆象也很吉利，便回到镐京，把实地勘察的结果报告了成王。成王就命令周公去洛邑进一步进行审视并负责监督修建新邑的任务。周公和召公利用商王朝的遗民为劳动力，在洛水旁修起了宗庙、宫殿和市肆，一座与西方镐京遥相呼应的巨大城市修建起来了。周人把镐京称为“宗周”，把在洛邑新落成的城市称为“成周”，又称“东都”。

周公为了削弱殷人的反抗势力，除了将一部分殷人分封给鲁、卫、唐等国以外，还将不少的殷朝遗民迁到了成周。他威胁这些被迁的殷民说：“如果你们不老实，不仅不给你们土地，还要把你们杀死！如果你们听我的命令迁到洛邑，我就继续让你们住在一起，给你们房子和土地，使你们在新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周公还允诺这些迁到洛邑来的殷民，如果他们服从周王朝的统治，就会大加赏赐，并要选取一部分人到王廷中继续当官。

周公一方面对殷人实行分化瓦解的政策，一方面在成周派有重兵“成周八师”驻守，随时准备镇压敢于反抗的殷人和东方各民族。周公的军事镇压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政策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殷朝的遗民逐渐顺从了周王朝的统治。周公死后，成王曾一度把都城迁到成周。因此，成周的兴建对周王朝统治的巩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西周方鼎

有关成王迁都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我国古代文献里记载的很不详备。1963 年陕西省宝鸡市出土了一件“何尊”为成王营建洛邑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宝贵资料。“何尊”是

一件圆唇的方尊，器身布满了饕餮纹，上起四道觚棱。器底内有铭文 12 行，每行 22 个字。铭文的内容是：

>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乌虖！尔有唯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劳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顺我不敏。王咸诰。何锡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宅"字，古代讲"定都"常用这个字。"禀"即遵循的意思。"福"是祭祀用的肉，祭仪举行完毕，分赐臣下吃掉。"克弼"是辅佐的意思。"中国"，是天下中心的意思，这是"中国"二字最早的出现。"乂民"即治理民众。"小子"并不是指年轻人，如自称，则表示谦卑。如称呼别人为"小子"，那他就一定是长辈或上级。"乌虖"是感叹词，就和现在的啊的意思差不多。这段铭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周成王开始迁都成周，并按照武王的礼制，举行了福祭。祭礼是从天室开始的。四月丙戌，成王在京室对宗小子们发布诰命说："当初你们的父亲曾辅佐文王，为文王效劳。因此文王接受了上天之命。武王战胜了大邑商（即指商朝）以后，曾向老天爷卜问说：'我要住在这天下之中的地区，从这里来治理四方的民众！'啊，你们这些小子，那时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呢！现在你们要学父辈公氏的榜样，为上天立功，完成使命就会受到后世的祭祀！"成王是个谨慎、按老天爷意志行事的人，发布了诰命以后，还赏赐给何贝币 30 串。何做了一个祭祀□公的祭器留念。这件事情发生在成王的五年。

据学者们研究，"何尊"在宝鸡出土，这一带曾是周王朝赐给虢公的封地，所以铭文中的"公氏"可能是虢公，而这件铜器的作器者何可能就是虢公的后人。他在成王五年随从周成王迁都成周，在听完诰命后受到赏赐，因而做了这件铜尊作为纪念（也有学者认

为应为夨国贵族，表明了夨国与周人关系的密切)。尊上的铭文对我们研究周初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何尊”的铭文为我们证明了古书里记载的武王灭商以后，曾想在伊、洛这一重要地区建都是可信的。召公“相宅”于洛滨，周公“营筑”洛邑，都是按武王的意愿行事的，这就是铜器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所说“我要住在这天下之中的地区，从这里来治理四方的民众”的一番话，这与古书上的记载是一致的；其次，古书里记载周公前后代成王摄行王政共7年之久，由于成王长大，才还政于成王。过去历史学家们一般都认为周公摄政的7年并不包括在成王的在位年数之内，但也有人表示怀疑。这次“何尊”铭文上清楚地铸有“唯王五祀”的字样，应是周公还政于成王以后的第五年。因此，这就证明了周公摄政的7年不应包括在成王在位的年数之内，而成王亲政应从“元祀”起；其三，“何尊”铭文还记载了另一个重要的史实，就是成王五年时确曾迁都成周，而这在文献里的记载是不太明确的。在洛邑开始营建和刚刚建成的时候，我国古文献《尚书》一书中的《召诰》、《洛诰》、《多士》等篇和一些铜器铭文里都称为“新邑”。只是成王“元祀”以后，成王才在这里亲政，并将“新邑”改名为“成周”——成王的周。而西方的镐京则被称为“宗周”——周王朝的祖籍。“何尊”说成王“初迁宅于成周”，证明了周成王确曾正式将都城由宗周迁到成周。

“何尊”的发现，不仅为我们研究西周初期营建洛邑的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史实，而且这个铜尊的造型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件珍贵的铜器与武王时的“大丰簋”相比，无论在铸造技术和铭文的范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相当提高。这说明周人吸收了迁到成周殷朝遗民熟练的铸铜技术，把青铜冶铸业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五) 内服“卿事寮”与外服“诸侯”

“周因于殷礼”。西周统治阶级承袭了商王朝的各种政治制度并

加以发展，统治机构较商王朝更为庞大和完善。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对周人古公亶父时所设立的“五官有司”（《史记·周本纪》）已不能确知其详。而周代文献《尚书·立政》载有不少周初官名，可以使我们了解武王灭商以后，又经过周公东征，周王朝如何设官分职以巩固王室统治和控制这个版图急剧扩大的国家。此外，历年出土的大量西周铜器铭文中也出现了不少周代官名，可与文献的记载相补充、印证。

周王又称“天子”。《诗经·大雅·假乐》“百辟卿士，媚于天子”，金文里也有“受天子休”（献簋）的词句。“休”就是善美的意思。周天子既是内服百官——卿事寮（liǎo）的最高首领，也是外服诸侯的“共主”。周天子以下，便是由世袭奴隶主贵族组成的庞大职官机构，这就是周初铜器“令彝”记载的“舍三事令，眔（及）卿事寮，眔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

在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由王朝卿士及其属下百官“卿事寮”进行统治。“同官为寮”。卿事寮的最高上司是师、保。“令彝”记周公的儿子伯禽“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管理王朝三事大夫和百官，并管理四方诸侯。他就曾做过王朝的师、保。在他以前，姜尚在武王时曾为“师”，号称“师尚父”。成王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尚书·君奭》）。召公又称“太保”，这在陕西周原凤雏宫殿遗址出土的甲骨文（$H_{11:15}$）中也有记载。召公与周公一起参加过东征，立下了很大功劳。在广大的王畿地区，“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燕召公世家》），可见师、保拥有很大权力。

《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可见师、保之职与商代的阿、保及尹职能相当。又说“周公为太宰”，宰官在商代就已出现，本为王室内廷治事官。太宰就是大宰，为内廷治事官之首。由于太宰和王关系密切，平时处理内事，扩而大之，助王总领外廷百官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周公称“师”或称“太宰”，

实与后世的“相”职相同。

师、保以下，便是王室百官——卿事寮。《尚书·立政》记载的较为详细，这就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等。从其职司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政务官“任人”即“常任”，负责执掌政务。“准夫”即“准人”，“准”意为公平，负责执掌司法。“牧”即“常伯”，负责掌管民事。“作三事”与《诗经·雨无正》中的“三事大夫”、金文中的“参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盠（lǐ）方彝〕的职司相当。司土即司徒，金文中常见，司徒不仅管理藉田等土地之事，即主民事，而且还管军和司理占卜等事宜；“司马”主军，但金文中还记载司马能参加周天子册命典礼并为“右”者；“司工”即司空，管理工事，金文表明“司土”还兼管田、居、刍牧等个官和主刑之官司寇。

王室外廷事务官，为处理王朝外廷日常事务的官吏。《立政》所列“大都”管理诸侯和周王子弟们的采邑。“小伯”管理卿、大夫的采邑。“艺人”是有专门技术的官员，如卜、祝、巫师、工师等。“表臣百司”管理外廷政事，“太史”负责记事和制作册命。“尹伯”是众官的头目。“庶常吉士”是具体办事的士官。金文中的“里君”、“百生”可能与大都、小伯职司相近；金文里的小辅、霝龠（líng yuè，即霝师）、鼓钟（钟师）、百工等都是专门人才，所司当与“艺人”同；金文中有“三左三右”（“小盂鼎”），有学者认为应就是《礼记·曲礼》所说的天官六大，三左即大史、大祝、大卜，三右即大宰、大宗、大士。据《尚书·顾命》记载，周成王生了重病，心情也很不愉快。甲子这一天，他虔诚地洗净了脸，服侍他的近臣为他穿戴得整整齐齐。全副礼服的周成王凭依着玉几，召集了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这几位大臣，强打着精神发布诰命。周成王在弥留之际命他们好生辅佐康

王，保住周朝自文王、武王以来所开创的基业。召公、毕公等大臣“以太子钊（即康王）见于先王庙”；“作《顾命》”。所谓“顾命”，就是先王临终前发布的诰命。因此，后世那些受先王重托，辅佐新王的前朝元老，就被称为“顾命大臣”了。虽然“三左三右”未必就是“天官”六大，但他们在王左右，可见地位的重要。“史”在金文中也常见，称为内史、史、内史尹、大史、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大内史等，史官负责作册和代宣卫命，也管理安民和司征伐等。“大祝”和“卜”，金文中也见到过。“宰”常参加册命典礼。他们基本与“太史”、“尹伯”等官职司相近；金文中还有林、吴（虞）、牧等管理山林、川泽和牧畜之官，也有田人、司田、田甸等田官。还有司射主射事，大亚、师氏等武官，左右戏繁荆管理左、右偏军马政事。以上这些官吏，管理国家农事、畜牧、军事等具体事务，当与“庶常吉士”职司相当。

王室内廷事务官，即负责宫廷保卫和处理宫中杂务的“宫内官”。虎贲保卫王的安全。缀衣掌管王的衣服，后世的“尚衣”就由此而来。趣马管理马匹，小尹统管小臣。左右携仆管理王用器物或御车的仆夫。百司管理内廷诸事务。庶府管理王廷库藏。以上诸官，都是王的侍从或近臣。金文中出现的虎臣、服、走马、小臣、善夫等等，与王关系密切，基本上与上述“宫内官”职司相同。

与此同时，周王朝为了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控制，大肆分封诸侯，这就是金文中所说的“四方”——“诸侯：侯、田、男”。西周王朝把分封制与宗法制结合起来，同姓为伯父、叔父，异姓为伯舅、叔舅，达到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目的。

《孟子·万章》说，西周外服诸侯“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共四等。《礼记·王制》说“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但在金文中还看不出公侯伯子男之间的严格等级关系。这些被分封的诸侯，对周王室来说是“小宗”。但在自己的封地内，对卿、大夫来说，就成了“大宗”。大宗世代相传，“百世不迁”。

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基本上也按照周王朝职官机构，设官分职，以进行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尚书·立政》所列“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zhēng）、三亳、阪尹”，就是诸侯国和封疆官吏。司徒、司马、司空，职司相当王朝的任人、准夫、牧，为诸侯国的“三事”。亚、旅为诸侯国处理军政的卿大夫。夷、微、卢是少数民族，烝是他们的君长。夷微卢烝当是泛指臣服于周王朝的方国首领。“三亳”是商王朝先王旧都之地的长官，“阪尹”是险要之地的守官。

周天子就是通过诸侯——地方官吏来加强对王畿以外地区的统治的。西周时天子享有很大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要定期向周王纳贡，还要定期朝觐天子和率兵从征。诸侯也要对周天子的巡游、婚嫁、死丧尽一定的义务。诸侯如果不履行对周王朝应尽的义务或冒犯了“周礼”的规定，轻者要受到谴责，重者则要被处死，另立诸侯。周天子还派人到各地去监视诸侯，有一件“应侯甗”，其作器者就是周王派往应国的监官。

应该注意的是，西周的内服和外服官吏，都是由与周天子有着一定关系的奴隶主贵族担任的。“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说的是周天子以嫡长子身份为王，众子弟为诸侯。诸侯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弟为大夫。大夫也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弟为士。这些奴隶主贵族，由于和周天子宗法血缘关系的亲疏而形成了“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这样严格的等级。卿、大夫、士都是一族之长，世代相传。因此，等级制和宗法制相结合，是西周奴隶制国家体制的重要特征，保证了奴隶主贵族在国家政权中的垄断地位。

（六）周公制礼作乐

周公姬旦，是我国奴隶社会的著名政治家。为了巩固西周统治阶级的政权和加强统治阶级的内部秩序，他参照了商王朝的礼乐制

度并结合周族的氏族传统，制定了一套区别君臣、上下、父子、亲疏、尊卑的维持周统治阶级关系的礼制和典章制度，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周公“制礼作乐”。

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全国的土地和人民，都是属于周天子所有。首都丰、镐一带的地方由卿、大夫管理，称为“王畿”，这是周天子直接掌握的地区。

王畿以外，分封给周王朝的同姓或异姓诸侯。这些受封的诸侯，又把自己的封地分配给他的同族人作采邑，这些受封的人是卿、大夫。卿、大夫再把自己的采邑分配给自己的同族人“士”做食地。士以下不再分封，食地由庶民——奴隶耕种。士以上的各级土地和奴隶占有者是周王朝的统治阶级，而广大庶民和被征服者是被统治阶级。

由于周王朝对新征服地区大量土地和奴隶的再分配，自上而下地构成了一级又一级的土地占有者，同时也形成了各级土地占有者之间的严格等级隶属关系。《左传》一书，对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就有一段详细的记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士以上的各级贵族和士以下的奴隶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有着天渊之别。“礼”成为奴隶主贵族从事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行动的规范。而“刑”则主要是为镇压广大奴隶和平民的。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奴隶社会“礼”制的基础是宗法制度。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和严格的隶属关系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天子世代相传，每一代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王位，主祭始祖，是周王室的“大宗”。而嫡长子的兄弟受封为诸侯，对天子而言，则成为“小宗”。每一代的诸侯也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侯位奉祭其始祖为“大宗”。他的兄弟受封为卿大夫，是诸侯国的“小宗”。每一代的卿大夫，也

同样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父位为卿大夫，奉祭始祖为“大宗”。卿大夫的诸弟为士，士对卿大夫而言，就成了“小宗”。士的嫡长子仍继承父位为士，但别的儿子就成了平民。因此，“大宗”一定是始祖的嫡系子孙，而“小宗”则为庶子、庶孙；诸侯虽然对天子来说是“小宗”，但在自己的诸侯国则是“大宗”。卿大夫对诸侯来说是“小宗”，但在本族内则是“大宗”。这一套制度，防止了兄弟间夺权而造成内讧，巩固了分封制。

宗法制度又是以贵族大家族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每个大家族都有共同的直系祖先、共同的宗庙、共同的墓地和互相保护的义务，而大家族的嫡长子世代掌握家族的大权，成为居于家族中首要地位的“大宗”，其余的庶弟就成为“小宗”。周天子对各国同姓诸侯而言，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百世不迁”的“大宗”。这样一来，周王朝的大小封国同姓就成为伯父、叔父，而异姓诸侯就成了伯舅、叔舅，都是周王朝的同族或亲戚，成为“股肱（gōng）周室”的重要力量。

据说，西周贵族有五种礼：祭祀时用“吉礼”，小心侍奉鬼神。丧葬、凶荒时用“凶礼”，要哀痛、忧思。朝聘会同时用“宾礼”，要礼貌和节。征伐时用“军礼”，兴师动众要果毅。吉庆活动用“嘉礼”，饮宴婚冠有一整套繁琐的仪式。这些繁文缛礼再配上与他们身份相适应的音乐，就形成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在宗庙里使用的青铜祭器和乐器，成为礼乐制度的象征，因而“唯器与名不可假人”。

西周初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天子对诸侯拥有很大的权力。齐国的始祖太公望曾受到成王令他对不服从周王朝统治，违反周礼的“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专行征伐之权的赏赐；而周公的儿子伯禽，由于周公立有大功，还受到了使用“天子礼乐”的特殊恩赏。

周公制订的一套礼乐制度和典章文物，使西周各级统治阶级获得了国王赋予他们的特权并规定了他们对周王朝履行的一定义务。

这一切，在后世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托名为周公所作，实际上战国时开始成书的《周礼》一书中，不少制度当是春秋时代的东西，但也为我们保存了一些有关周初的礼乐制度和典章文物的珍贵资料，是我们研究周代礼乐制度和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七）成康之治

据说在周公代成王摄行国政的年月里，有一年，年幼的成王得了病，周公十分着急，连忙向老天爷为成王祈祷说："国王年纪轻，还没有做什么事情。如果办错了什么事情惹得上天发了怒，那责任在我，请老天爷惩罚我好了！"真想自己代替成王去死。周公祷告完毕以后，祷词被人悄悄地收藏在王室的档案库里。

周公返政成王以后，有人向成王说周公的坏话，引起了成王对周公的怀疑。周公有口难辩，只得偷偷地离开了成王，跑到南方的楚国去避难。一个偶然的机会，成王打开了档案库，看到了周公在自己生病时向老天爷祈祷的记录，成王为自己误听谗言，无端怀疑周公感到十分懊悔，不觉痛哭流涕，连忙派人把周公请了回来。此后，成王对周公深信不疑，比以前更加尊重了。

成王亲自处理国政以后，对周公的教诫一直不敢忘记。他时常以周公所做的《无逸》、《多士》等文书提醒自己，用商代一些著名的国王如祖乙、武丁、祖甲等人"不敢荒宁"、"保施小民"的事迹为榜样，不敢骄奢淫逸，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再加上周王朝已经经过了周公的几年经营，敌对势力多被消灭，被分封的各国诸侯也已成为周王朝的"藩屏"，所以成王时天下很是安定。

由于周民族在灭商以后吸收了殷人的先进文化并把在连年战争中获得的大批奴隶使用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成王时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周人实行了适应大规模奴隶耕作的"井田制"，再加上生产力的提高，周初农业有了较大发展。《诗经·周颂·丰年》描写周初农业丰收的情景说：

黍稻丰收年景好，	（丰年多黍金稌，）
装满座座大粮仓。	（亦有高廪。）
万担亿担粮食多，	（万亿及秭，）
酿成美酒味醇芳。	（为酒为醴。）
奉献祖先表心意，	（烝畀祖妣，）
祭物齐备不寒怆。	（以洽百礼。）
神明保佑不遗忘。	（降福孔皆。）

成王时，西周王朝不仅实现了对全国的牢固控制，还加强了与远方一些少数民族的联系。据记载，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肃慎族"贡献"了他们的特产楛矢、石砮；居住在西方的氐羌族也"贡献"了"鸾鸟"。此外，还有南方的"越裳献白雉"，东方的"倭人贡鬯（chàng）草"等等传说。这一切，不仅加强了周王朝与一些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扩大了周王朝的声威。在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的不少地方，如吉林省的骚达沟、土城子等许多地点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不少青铜器，其中有铜刀、铜矛、铜斧、铜箭镞等。此外还有陶器、石镰、卜骨等。不少遗物在形制方面都与中原十分接近，这说明了周文化对边远地区的影响。

成王在位 3 多年以后得了重病。他在临死以前，担心太子钊（zhāo）治理不好国家，命令召公奭和毕公等大臣辅佐他。成王在弥留之际，嘱咐这些重臣们说："看来我的病很重，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郑重地给你们留下几句话，希望你们和我的后嗣能够记住！我们的祖先文王、武王功烈卓著，布德行、重教化，威震天下，灭掉了商朝。但到我这一代就没有什么作为了，只不过办一切事情都是按照上天的意志，遵守祖宗的教训，不敢胡来罢了。现在上天给我降下了灾祸，我活不了几天了。可是你们今后要好生辅佐太子钊，遇到艰难困苦时要和衷共济，还要注意处理好与远方民族的关系，安顿好大小诸侯。一定不要使嗣王作出无理的事情来！"

康王继位以后，召公、毕公把成王临终时讲的一番话告诉了

他。康王也遍告天下诸侯，表示要坚决保住文王、武王建立起来的基业。《康诰》记载了他的话说："先君文王、武王当国时，贫富均平，刑罚宽猛得宜。他们实行的这一套善政闻名于天下，吸引了许多勇敢的武士和忠心的臣子为周王朝服务。因此在按上帝的命令办事时，才能不发生什么偏差。老天爷对先君的这一套办法很欣赏，命令分封诸侯，推广到全国，实际上是为了藩屏我这个后世的继位之君。现在您们都表示要像先人服事先王一样效劳周王室，虽然身在王畿之外，但心里都在惦记着拱卫王室。希望你们能说到做到，不要做出对不起我这个后来人的事情来！"

康王在召公、毕公这些顾命大臣的帮助下，生活较为节俭，处理政事也专心。据说当时晋侯修了个漂亮高大的宫殿，受到了康王严厉的斥责。《史记·周本纪》里"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错就是措字，在这里就是放置起来不用的意思。这段话说的是周王朝到了成王和康王时，曾经出现了国家安定，近40多年的时间没有使用过刑罚的"太平"景象。虽然这些话不免有些夸大，但周王朝在成康之际国力比从前强大，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确是事实。因此有人把西周初期的一段繁荣时期称为"成康之治"。

在我国古代文献里，有关康王时对外用兵的记载很少，但青铜器铭文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康王时的"小盂鼎"，记载了康王曾命盂进攻匈奴，并把他们的首领杀死；此外，近年出土于岐山贺家村的铜器"史話簋"也为研究康王时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件铜器鼓腹，两耳做成长耳下垂的兽头形，腹部装饰着狞怖的饕餮纹。在簋的底部铸有铭文23字，记载乙亥这一天，周康王诰命毕公，赏给史話贝币十朋，史話作簋铸铭，用以早晚借鉴而不忘。铭文中出现的毕公，就是《史记·周本纪》和《尚书·序》等古文献所提到的作册毕公，史話簋铭文中所记载的周康王诰命毕公与《尚书·序》所说的"康王命作册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是一致的。

（八）昭王南征而不复

《左传·僖公四年》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春秋初年，齐桓公纠集各国诸侯侵略蔡国。打败了蔡国以后，又挥师南进，攻伐楚国。楚王派人责问齐桓公："您地处北方，我们地处南方，相隔辽远，真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平时并无仇怨，不知您到我们的土地上干什么来了？"


毛公鼎

齐桓公侵略楚国，总得给自己找点理由。他派大臣管仲向楚使宣布说："还是在周初的时候，我们的老太公就得到了成王的命令：为了保卫周王朝，可以代天子征伐五侯九伯。还赏赐给我们太公巡行天下的权力。你们楚国不按时向周王进贡滤酒用的香草，我们大王代表天子向你征收贡品来了！此外，昭王天子曾南征至汉，但是再也没有回到宗周，我们大王问你们：这是什么原因？"楚国的大臣回答说："贡品没有按时送到，是我们国君的不对，我们哪有胆量不进贡呢？至于昭王没有回到镐京，您们还是去问问汉水吧！"

原来，康王死后，他的儿子瑕（xiá）继位为昭王，在一次伐楚的行动中被淹死在汉水里。周王朝觉得这有损声威，因此没有把死因告诉各国诸侯。虽然当时各国诸侯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一个个装聋作哑，也佯做不知道。齐桓公征伐楚国，正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所以把不贡"包茅"和昭王南征淹死等事情作为楚国的罪名，这就是所谓"昭王南征而不复"的故事。

楚国的祖先原是居住在淮水下游的淮夷的一支，曾是商王朝东南部力量强大的一个方国。商朝末年灭淮夷后，他们与商王朝的联系更为加强，在文化方面也受到了商王朝的强烈影响；周朝灭商以

后，淮夷曾与纣王的儿子武庚等串通一气，反抗周朝的统治，周公用了几年的时间才把这场叛乱平息下去。成王时的一件著名铜器“令簋”记载了这次伐楚事件，这就是铭文所说的“唯王于伐楚伯在炎”。淮夷的一支在周王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沿长江向西发展，在长江中游一带定居下来，成为楚地的先民。

楚国新开辟的地区，东部是群舒，西北是群蛮，西南是百濮，东北是邓国，北部过了汉水就是周王朝所封的同姓诸侯“汉阳诸姬”。虽然还是在周文王时期楚民族就与周族发生了联系，但商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楚民族的影响实在太深了。楚国就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不少方面继承了商文化的特点。为了拉拢楚国，周成王曾封楚国贵族熊绎为“子”爵，但实际上周王朝很看不起地处蛮夷之地的楚国。据说有一次成王与各国诸侯会盟在岐山之下，楚国只能为会盟准备滤酒用的香草和祭祀山川时的标志木杆，并与另一少数民族鲜卑人一起看守庭院里烧起祭神用的熊熊火堆，连正式参加会盟的资格也没有。最近在陕西岐山出土的周初甲骨中，有一片记载了“楚子来告”的材料，证明了古书里所说的楚国在周成王时曾接受子爵的封号并与周王朝发生了联系是可信的。

楚国力量的一天天增长，严重地威胁着周王朝封在汉水以北的大小诸侯。昭王依靠成王、康王时建立起来的强大国力，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据记载，昭王十六年，周王朝伐楚的大军渡过汉水以后，遇到了一头大野牛。金文里也有不少昭王伐楚的记载。如“䵼驭簋”记载“䵼驭从王南征，伐荆楚”，“过伯簋”记载“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𧴗簋”记载“𧴗从王伐荆”等等。“荆”就是周王朝对楚国的轻蔑称呼。

周昭王对南方的连年用兵，虽然获得了不少财富和奴隶，但也激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憎恨和反抗。昭王十九年，他又率领浩浩荡荡的六师人马前去伐楚。据传说，在南渡汉水的时候，当地人民把一艘用胶粘起来的大船献给了昭王。昭王得意洋洋地坐在船上，不料船行到汉水中间，粘船的胶被水溶化，坐在船上的周昭王和随行

的祭公一起掉进了水里。恰好有个胳膊长、力气大的侍卫辛游靡，不顾一切地把昭王捞起，但这时昭王早已被活活淹死了。昭王带去的六师人马，也被楚人打得七零八落……

周王朝对这次伐楚的惨败讳莫如深，史书里关于这次军事行动的记载只是“昭王南巡狩不返”寥寥数字。从此以后，楚国的力量日渐强大。到了春秋时代以后，楚国终于发展为雄据于南方的大国。

（九）穆王西行和《穆天子传》

昭王死后，他的儿子满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旅行家周穆王。昭王伐楚全军覆灭，使周王朝军事力量受到了很大削弱。穆王时，立国100多年的西周王朝已是“王道衰弱”，一些少数民族纷纷拒绝向周王朝纳贡，周王朝开始从全盛时期向下坡路走去。

西方一个少数民族犬戎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穆王想以犬戎不按四时供应贡品为理由，对他们进行征伐。但他手下的大臣祭公谋父对此进行劝阻。祭公对穆王说：“大王千万不能随便就去征伐犬戎。我们的先王历来是按以德行劝导人而不是以兵器吓唬人的原则行事的。兵器这东西不用则已，一用就要有威严。由于商纣王民怨太深，武王才接受了商朝老百姓的请求，在牧野与商纣王动了武。但先王使用兵器是万不得已的，只不过是为了为民除害，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已。先王用这一套正确的办法处理与各国诸侯的关系，所以无论远近都听从周王朝的命令。现在您滥用武力，不按祖先留下的这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去做，恐怕对您不利。此外，我听说犬戎族民风淳厚，他们对您的无端征伐，定会全力抵抗的！”

穆王不听祭公的劝告，坚持出兵西征犬戎，侥幸取得了胜利，得到了犬戎“进贡”的四只白狼和四只白鹿，还得到了一把宝刀。据说这把刀锋利无比，用它割玉，如同切泥团一样容易。为了加强对西戎的控制，周穆王把西戎族的五个王也抓回当作俘虏，还把他

们的一部分迁到了太原附近。虽然穆王取得了胜利，但自此以后，“荒服者不至”，周王朝在远方少数民族中的威信大大丧失了。

穆王打败了戎狄，扫除了通往西方道路上的障碍。善于驾车的造父为穆王驾驭着八匹骏马拉着的车子，日行千里，车辙马迹遍天下。在充满神话色彩的穆王西行的故事中，据说穆王向东走过的路程有二亿零二千五百里，向西的路程有一亿零九万里，向南的路程达一亿零七百多里，向北的路程有二亿多里。其中特别富有传奇色彩的是“穆王西行”的故事。

据《穆天子传》一书的记述，穆王带了大批人马和财宝从成周出发，进入河南沿着太行山西侧，渡黄河，越磐石（现山西平度），又沿滹沱河北岸西行，通过现在的雁门关一带，到达了河宗部落（今内蒙古河套以北）居住的地方。河宗部落的一支郿（péi）伯絮派人前来迎接，先用10张珍贵的豹皮和26匹好马做见面礼献给了穆王。周天子在这里住下以后，又是到黄河边上去钓鱼，又是到渗泽去打猎取乐。为了对河宗部落的友好接待表示感谢，穆王把猎到的白狐和黑貈（同“貉”）作为祭品特意去祭祀河宗部落的祖先。

穆王又继续西行，经过乐都、积石等地（甘肃兰州附近），到达了昆仑之阿。穆王登上昆仑之巅，瞻仰了这里的名胜黄帝之宫以后，还举行了隆重的祭山典礼。然后北上到了珠泽。穆王在珠泽得到了当地部落贡献的白玉、酒和供食用的300匹马、3 000只牛羊，穆王也把黄金之环、朱带贝饰、布匹、种牛等许多礼物赠送给当地人民。

从这里继续向前，经过春山之泽时，穆王在一块大石上刻铭为记。再往西走，就到了赤乌部落。据说赤乌部落的人与周人同出自宗周。“他乡遇故知”，赤乌部落的人看到来自远方故乡的客人十分高兴，向穆王进献了上千斛（hú，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一斛）美酒和900匹食用的马、3 000只牛羊和大批粮食。穆王也赠给赤乌族首领一辆相当于周王朝大夫级别才能乘坐的墨车、黄金40镒（20两为镒）、贝带50副等礼品。穆王在一片友好

的气氛中在这里度过了 10 多天以后，就又出发到了曹奴部落所在地。

曹奴部落的首领也很热情好客。他为穆王一行人举行了丰盛的宴会，还把 900 匹马、7 000 只牛羊和百多车粮食赠给穆王作为继续赶路的食物。穆王也把用金、银做成动物形象的特种工艺品、40 副贝带和大批布匹回赠给曹奴人。又从这里出发，经过五天之后到达了黑水。穆王从出发到现在，已将近五个多月了，随从出行的将士一路之上也有不少人由于劳累而死亡。正赶上黑水一带连下七天大雨，穆王索性就把那些死亡的人埋在了这里，建立了一个“留骨之邦”。又沿着黑水前进，到了容成氏所驻守的群玉之山休息了四天，在这里得到了大批珍贵的宝玉。再往西就是剞（jī）闾氏、鹦韩氏等部落，穆王与这些少数民族也互有馈赠。又经过玄池、茂苑、黄鼠之山等地，终于来到了西王母之邦。

穆王受到了西王母的隆重接待。为了表示友好，穆王带去了玉圭、璧和丝织品等珍贵礼物。西王母十分高兴而恭敬地接受了这些礼物。会见后，穆王又约请西王母到他下榻的美丽的瑶池来参加酒会。席间，穆王和西王母交谈得十分融洽，西王母为穆王唱了一首充满深情厚谊的歌谣助兴，希望他以后再来访问。穆王也非常高兴，即席回诗一首说：

我归东方后，　　　（予归东土，）
专力治周邦。　　　（和治诸夏。）
苦乐均平时，　　　（万民平均，）
得暇再探望。　　　（吾顾见女。）
不过两三年，　　　（比及三年，）
一定来你乡。　　　（将复尔野。）

穆王写给西王母的诗句，表达了东方人民对遥远的西方各族人民的友好情谊。穆王还登上了西王母之邦的一座高山——弇（yǎn）

山。穆王在山上豪兴大发，挥笔写下了“西王母之山”等几个大字并刻在石头上留念。还栽下了一棵槐树作为标志，表示周王朝承认了弇山上槐树以东是西王母之邦的领土。穆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西王母，带着西方各族人民赠送的珍贵礼物和友谊，回到了成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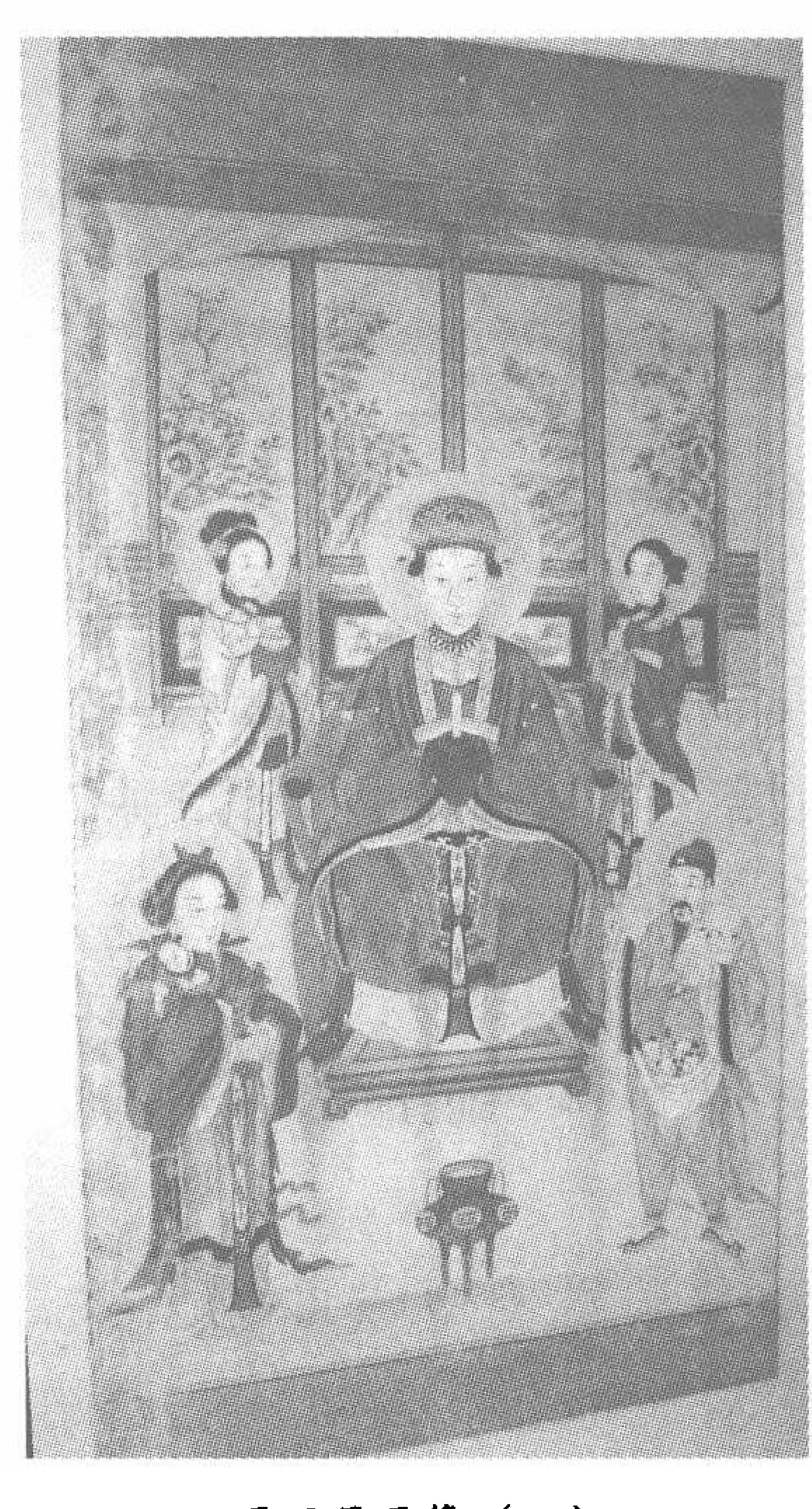
根据《穆天子传》记载，穆王的这次西行，历经了现在河南、山西、内蒙古、甘肃等省、区，直到新疆的田河、叶尔羌河一带。而西王母之邦远离这一带有3 000里之遥。穆王最后又从此到达了西北2 000多里的“飞鸟所解羽”的地方。据学者们研究，这一带应是现在中亚一带。我们可以看出，穆王西行所走过的地方，与后来汉代张骞通西域所经历的地区基本上是一致的。

《穆天子传》是春秋战国时人根据穆王西征犬戎的历史记载和有关西王母的神话故事编写而成的。《穆天子传》对我国西北的一些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介绍得比较详细，特别是书中出现的一些名山、大川、地名，对我们研究古代地理有一定参考价值。虽然有一些地名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确切地点了，但我们还可以根据西北至中亚的一些地理沿革找到它们现在相应的位置。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我国人民对西方各族人民已经开始有所了解，我国古代的地理学知识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因此，《穆天子传》不仅是一部优美的神话故事书，还是一部有价值的古代地理书，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向往着友好往来、互相促进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愿望。

《穆天子传》虽然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但很快就失传了，直到晋朝太康二年（281）才被发现。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有个叫不准的盗墓人，在汲（jí）郡（今河南汲县）悄悄地挖开了600多年前魏襄王的大墓。他在这座又深又黑的古墓里，为了寻找随葬的珍贵物品，便随手从墓内堆放着的成捆竹条中抽出一把点燃，当作照明用的火把，无意中还发现竹条上写着文字。就是这样，墓内的贵重物品都被不准席卷而去，只剩下了被搞得狼藉不堪的一堆竹条。后来，西晋朝廷当局得知了这件事，便派人将留在墓内的竹条全部取出，足足装了

几大车。经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如荀勖等人研究考证后，发现这是一批失传了的先秦古书。经过他们的细心整理，写定成书共有 75 篇，10 多万字。

原来，在我国古代，纸发明以前，文字都是被刻（或写、或铸）在甲骨、铜器、缣帛、竹简等不同材料上的。汲郡魏襄王墓里出土的有字竹条，就是我国古代的"竹简"（或称为"简书"）。汲郡出土的大批先秦古书中，有一部就是有名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也是魏襄王墓里出土竹简的一部分。这批随葬竹简整理成的书，后人称为"汲冢竹书"，是我国古代史料的一次重大发现。




西王母画像（一）



西王母画像（二）

穆王晚年，还对东南和南方的淮夷、群舒发动了连年的战争。周王朝曾动员了九师的兵力，东到安徽的九江一带；徐夷也曾纠合

九夷进攻周王朝，一直打到了黄河边上，引起了穆王的极大恐惧，不得已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命令徐偃王为他管理这些夷人部落。

周穆王的这些活动在传世铜器铭文中也有所反映。有一件铜器名叫“㲋鼎”，记载了穆王时师雒父曾征讨过徐舒。而另一件铜器“遇甗”却记载了周王朝与徐舒相互交往的事情。这些铜器与古书里的记载互相印证，说明了周王朝在穆王以后对东方和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时而攻伐，时而拉拢，已经逐步失去了控制。

（十）“史墙盘”

——西周前期历史的见证

1976 年 12 月，陕西省扶风县庄白乡白家村的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有青铜器露出地面，他们立刻保护好现场，并及时报告了有关文物考古部门。

文物考古部门闻讯赶到现场并进行了科学的发掘，发现这里是一处未经后人扰动的周代铜器窖藏。这个装满各种铜器的长方形窖穴，虽然挖的比较草率，但四壁还是经过了一定的修整。窖穴内的铜器放置都有一定的次序，共出土鼎、鬲、盨（xū）、盘、壶、罍、钟、彝等青铜器 103 件之多。在窖穴的底部、四周和器物的空隙之间，都填有草木灰，这对铜器的保护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次周原出土的青铜器中不少都铸有铭文，据统计，有铭文的青铜器 74 件，其中文字最少的铜器只有一个字，而最多的有 284 字，这就是名闻中外的“史墙盘”。

“史墙盘”盘腹下有圈足，上面装饰着两端上下卷曲的云纹，并以云雷纹衬在底上。这是一件西周中期恭工时盥（guàn）洗用的水器，不仅器物造型精美，艺术价值较高，而且时代明确，为我们研究恭王时的铜器又增加了一件断代标准器。特别是“史墙盘”的腹底共有铭文 18 行 284 字，是建国以来发现周代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件。

“史墙盘”的铭文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歌颂了周初文、武、成、康、昭、穆六个国王的功烈，这在大量周代铜器铭文中还是第一次见到。“史墙盘”铭文的后半段叙述了做盘者墙的光荣家史。“史墙盘”的前一段铭文，对我们研究西周前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大意是：

“古代的文王，初步做到了政事和谐，上帝降给他各种美德，一切大定，使他控制了各个方面，天下万国都服从了他的统治；武王神勇无比，征伐四方，殷朝一些有远见的大臣都与他发生了联系，影响是很深远的。武王不仅大大地巩固了远祖所开创的基业，而且奋起攻伐了纣王（夷童）；聪明而有法度的成王，授予各方诸侯为政纲要，用以治理周国；深沉而明哲的康王，安定了广阔的疆土；伟大淳厚的昭王，大规模地打击荆楚，为了巡狩而亲自到南方；恭敬而显赫的穆王，用自己为例，现身说法，教诫并安顿现在的天子（恭王）。天子（恭王）在各方面都继承了文王、武王以来长时期建立起来的勋业……”

史墙盘铭文

这段铭文所记载的周朝各王的历史活动，与古文献记载基本相合。古书里记述的文王时周人为了灭殷聚集力量，争取与国，与“史墙盘”铭文里所说的“使他控制了各个方面，天下万国都服从了他的统治”是一致的；而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史墙盘”里原话就是“伐夷童”，表示了周人对荒淫无道的殷纣王的蔑视；成王分封诸侯，周公作了《康诰》、《酒诰》等文献，让他们在新占领地区用“义刑义杀”以争取被征服的殷民，并鉴于殷纣王沉湎

酒色的教训，反复告诫他们“勿辩乃司民湎于酒”等等，这与“史墙盘”所记载的成王“授予各方诸侯为政纲要”是一致的；“史墙盘”歌颂康王的功绩时，说他“安定了广阔的疆土”，使周朝空前强大，这说明古书里关于成王定天下，康王息民，出现了安定的局面是有根据的。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史墙盘”里对昭王和穆王的记载。

“史墙盘”对昭王伐楚十分重视，把这件事作为昭王的主要功绩，说他“大规模地打击荆楚，为了巡狩而亲自到南方”。昭王第一次伐楚是在十六年，传世的“安州六器”里的“中方鼎”、“中方甗”曾记载了这次战争的过程和取得的胜利；而第二次伐楚是在昭王十九年，虽然昭王南征不复，丧六师于汉，但我们从“史墙盘”的铭文看，当时周朝人对他的伐楚之功还是肯定的。学者们把“史墙盘”与同坑出土的“作册折尊”、“作册睘尊”等铜器作了综合研究后，发现了昭王第二次伐楚的确切时间应在十九年的下半年。虽然最后昭王死在汉水，但是他打开了南方的金属、特别是铜输入中原的通路，对周王朝的发展有很大意义。因此，“史墙盘”对昭王伐楚的行动是很赞赏的。

与此相反，后世广为流传的穆王周游天下，“史墙盘”却一字未提，说明周朝人当时就可能对这件事是持否定态度的。虽然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从人们要求统一和加强与各族人民联系的心理出发，歌颂了穆王不畏辛劳，长途跋涉，与西方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但实际上穆王连年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给周朝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在《左传》等古书里就可以看到周人对穆王巡行的不满。昭公十二年说祭公谋父为了劝阻穆王“周行天下”，曾“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战国时的屈原也曾在《楚辞·天问》里批评过穆王。因此，“史墙盘”里只说穆王“用自己为例现身说法，教诫并安顿现在的天子（恭王）”，而没有把穆王“周行天下”的行动作为壮举来歌颂，说明穆王本人也可能认识到这些活动引起了国人的不满，因此才教诫恭王不要再干像他自己那样周游

天下的荒唐事了。

这件铜盘的作器者为墙，因此又称为“墙盘”。我们从墙在后段铭文中自叙身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墙的高祖原来居住微国，武王灭商以后，微来投奔武王。烈祖微史曾作过史官。武王命令周公赏赐给他土地，并让他在岐邑住下。饶有兴味的是，这个窖藏出土有铭文的74件铜器中，有55件都与墙有关系。由于墙的家族世代做史官，所以又称之为“微史家族”，“史墙盘”由此得名。“史墙盘”及微氏家族铜器，可以使我们了解微氏家族的变迁，这在历年出土的青铜器群里，还是最丰富、最完整的一批。

“史墙盘”不仅为我们再现了西周前期诸王的历史活动，而且也为我们研究周朝与微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十一）西周初期冶铜业的新发展和青铜器

“周因于殷礼”。周人灭商以后，全面继承了商人在社会生产和文化艺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在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经过武王、成王、康王，直到昭王、穆王时达到了青铜时代的高度繁荣。

近年来在陕西周人活动的旧地发现了不少商代从早期到晚期的青铜器。虽然其中不少可能是武王灭商以后，周人从商奴隶主手里掠夺而来，但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应为周人自己所制作的。许多形制与商朝铜器完全相同的器物在周人活动故地发现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周文化受商文化的影响之深。

武王灭商以后，获得了大批殷人种族奴隶，其中不少人是具有某一种手工业专长的工匠，周王朝对这些人是十分重视的。周公曾在著名的《酒诰》里严厉禁止周人酗酒，他命令说：“如果周人聚众酗酒，坚决不能放纵他们。把这些人抓到首都，我要把他们杀掉！”但对那些有熟练技术的商人工匠，周公却客气得多了，他说：“那些商朝的旧臣和工匠，如果恶习不改，违犯我的命令继续沉湎于酒，不要因此就把他们杀了，而要教育他们改正！”大批工匠奴

隶在周奴隶主阶级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里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周初的灿烂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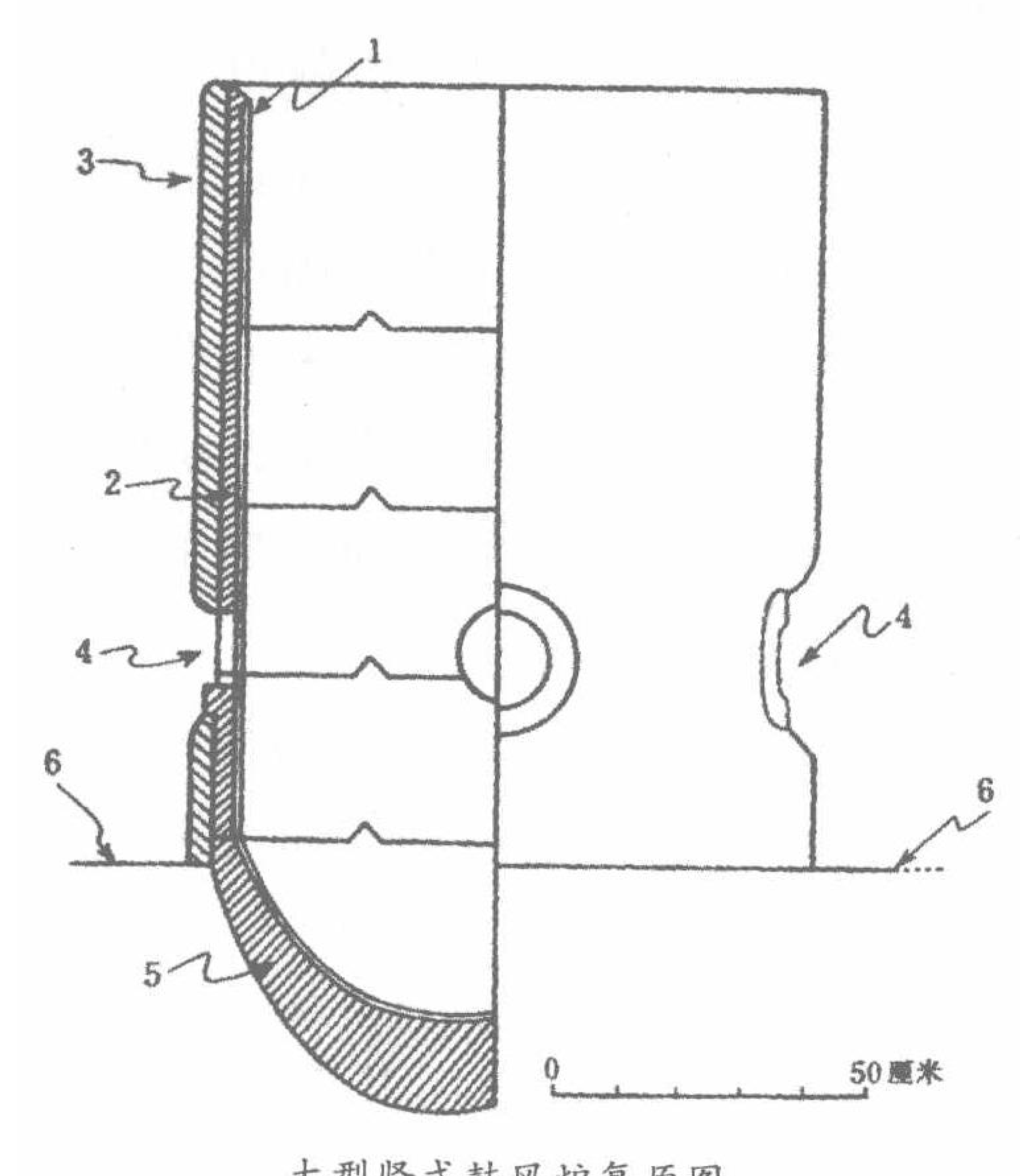
西周辖首陶模

我们从历年在全国各地发现的周初青铜器来看，不仅周王朝都城丰、镐地区和成周等中心地区铸造青铜器，而且分布全国各地的诸侯国也能铸造青铜器。在西周的都城丰、镐地区，虽然发现的铸铜遗址规模不大，但从马王村一个大坑发现的陶范可以看出是铸造礼器的作坊。张家坡居住遗址专门铸造车马器，说明周初的铸铜作坊已有了专门的分工。特别重要的是，近年考古学家们在河南洛阳发现一处这个时期的大规模铸铜遗址，为我们研究西周初期的青铜冶铸业提供了重要资料。

洛阳西周铸铜遗址面积约 28 万平方米，位于现在的洛阳火车站北边瀍河西岸的台地上，这里离周初的王城不远。在这片广大的面积上，发现有烘铸范用的窑三座和炼铜炉的残壁、铜渣以及大量的木炭、红烧土块、陶范泥块等。此外还有数十件铜质和骨质的制范工具。我们从大量的陶范碎块中，可以推知当时这个铸铜遗址生产的主要铜器品种。原来，这里在周初不仅生产鼎、簋、罍、尊、卣、觚等青铜礼器，而且还生产车上的青铜构件如軎（wèi）、軜、辖等以及兵器戈、镞等。从出土的斧范还可以知道，这里还铸造过生产工具铜斧以及马面饰、长方形（或圆形）的铜泡等。从这里发现的熔炉遗迹中，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周初熔炉的构造。熔炉基本上有三种型式：一种是大型熔炉用草拌泥涂抹；一种是用陶大口尊、罐的内外壁和口沿涂草拌泥；第三种是完全由草拌泥堆积而成。从出土的大量熔炉残块中，我们可以将熔炉的大小推算出来。最大径为 1.8 米，最小 0.3 米。炉底残存有较厚的炉渣，呈红绿

色，有的还有非常清晰的铜粒。从以上情况推断，炉内温度可达摄氏 1 200 度以上，炉内壁呈琉璃质烧流状。外部温度较低，呈灰色或红烧土色，说明是铜锭和木炭混合放入炉中熔化的。洛阳发现的这处周初铸铜遗址，是西周王朝一处重要的铸铜作坊区，是建国以来发现的西周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为丰富和保存遗迹最为完好的一处铸铜遗址。

根据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陶范和熔铜炉壁等遗物的观察和研究，西周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主要表现在制范工艺已相当复杂、严密，我们的考古学者复原了制作陶范的整个过程。这就是在制范时，首先要将石英砂和粘土经粉碎、筛选和混料处理，并羼入蚌壳和植物质。石英砂可以增加陶范的耐热、透气性并增加强度，而黏土作为黏合剂使陶范易于成型。羼入的蚌壳和植物质可在烘范时自燃而留下空隙，从而增加陶范的透气性。其次是在同一块外（内）范上配用两种范土。外范的内壁层（或内范的表面层）范土细腻而坚密，使范表面光滑，以增加铸件的光洁度。外范的外壁层（或内范的蕊部）范土砂粒较大、松散，可增加陶范的透气性。再次，选用含砂量均低于外范和内范的范土制出铸件的模型，在上面描绘、雕刻出花纹，然后经烘烤，就成了陶质或近似陶质的模型。据观察，当时在描绘、雕刻花纹时，已经使用某些绘图器械。泥模上划有分型刻线，表明铸型是分型设计的；制作外范时，先根据模



大型竖式鼓风炉复原图

1. 炉衬　2. 炉壁层　3. 保护加固层

4. 鼓风口　5. 炉底　6. 地表

上所划分型线分别制成范片，然后烘烤修整后即可合范成型。制作的步骤是先将细泥附在泥模所划定的范围内并用力挤压，以使模上花纹清晰地翻印在面泥之上。然后再用细泥在此片上四周起框并修整四周立面，做出母口，在邻近相接的分型片上也做出相应的子口。将粗范泥填满面泥背面之凹处，即是背泥。背泥上还修出四个小凹洞，以备合范时用四指抓取而不致有损浇铸面。将外范片取下，使其干燥并加以修饰就可备用。一些需要分铸的部件，则在外范上相应部位留下空隙，在合范时将附件嵌在这里。不需要分铸的附件，如铜器铭文，则采用在外范上镶嵌小陶范的方法；内范有两种制作方法：一种是将原来的泥模表面刮去一层相当铸器厚度的泥土，一种是再重新制作内范；浇铸铜器时，先将分片做好的外范及内范合拢成型，在分型面上涂上一层极细黄土，既可黏合接缝，又可保持范面光洁。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周铸铜遗址的熔铜炉壁上发现了鼓风口，这是迄今为止西周铸铜的遗址第一次发现鼓风口。有一个熔炉壁鼓风口保存较为完整。据研究，西周时期的大型熔铜炉，从具有四个鼓风口计算，有的可能已使用四部鼓风设备，风力可以使炉温大大升高，标志着我国西周前期铸铜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在洛阳铸铜遗址，还发现了四五十座西周时期的无墓圹和墓圹小墓。其中无墓圹的小墓占一半以上，都抛尸或埋尸在地面之上或垃圾坑内，骨架方向不定，葬式也不固定，有的仰身，下肢弯曲作跪状。有的四肢零乱，身首异处。有的仅有三颗头颅，也有的作捆绑状或肢骨不全。而那些有墓圹墓，墓内也一般无随葬品，个别仅有一二件陶器和少量的贝或石饰。有的虽有墓圹，但骨架呈手脚被捆绑状放在二层台上。这就是铸铜工匠们死后的栖身之所。可以看出，其中不少是非正常死亡的，可能是在浇铸铜器开炉前被用于祭器的人牲。

可以想见，西周东都洛邑的铸铜作坊里，一座座大型竖炉和中、小型炼铜炉林立其间，真是炉火熊熊，铜水沸腾。有的奴隶工

匠在推橐鼓风，有的奴隶工匠在运放铜矿石和燃料，也有的奴隶工匠在炙热的炉前操作。而专门负责制作铸铜模和陶范的工匠们，用他们的智慧和灵巧的双手设计出了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铜器模型。……浇铸完毕了，那些花纹富丽、器形雄浑的一件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从采矿到炼铜，从设计到浇铸成品，又凝聚了多少奴隶工匠的汗水和心血、智慧和创造、痛苦和死亡呵！但到头来，这些稀世珍品却或了少数西周奴隶主贵族的庙堂之物或随葬用的礼器，被深深埋入了地下……

西周初年的青铜器，特别是武王时的青铜器，在造型、花纹等方面几乎与商代晚期青铜器没有什么区别。但经过成王，特别是康王以后，周人开始突破了商代晚期青铜器的传统影响，在器类和造型等方面逐渐有了改进和变化，形成了周初的独特作风。

周初常见的铜器种类，在食器方面主要是鼎、鬲、甗、簋等，豆较为少见。酒器方面主要是觚、爵、角、盉、尊、鸟兽尊、觯、卣、觥、罍、壶、方彝、勺等。水器方面主要是盘、壶。此外还有俎、禁等杂器。一般说来，周初的铜器器形与商代晚期的同类器物十分相近，但是像方座簋、四耳簋、曲壁方彝、刀形宽足爵、勾戟、剑、甬钟、车辖、銮铃等都是晚商所没有的铜器器形。有几种铜器的器形在康王、昭王时有了很大变化。如鼎在康王、昭王时下腹向外倾斜，最大腹径在腹的下部，剖面近梯形。与此同时，尊、卣、觯、簋等器物也发生了与鼎大抵相近的变化。商代晚期有明显的颈、腹、圈足所谓“三段式”造型的尊，成王、康王以后由口沿以下向内成一弧线的新型尊所取代。卣的盖与提梁相近的左右两边，出现了直立的“犄角”。盘也由晚商的没有耳变为出现双耳。此时还出现了数量很少的平盖鼎。而商末出现的方尊，虽然在成王、康王时还广为流行，但昭王以后就很少见到了。

不仅在器类方面周初逐渐发生了变化，而且在铜器的纹饰方面，也形成了周人自己青铜时代鼎盛期的独特风格。商末以来的饕餮纹仍然在西周初期的各种纹饰中占主要地位，但比商末更显得富

于变化和生机。成王以后，盛行一种花纹简略的装饰，有的只在器物口沿以下或颈部装饰几道弦纹，有的器物装饰用夔龙、云雷或小鸟组成的带纹，显得十分简洁而明快。同时，也还存有花纹复杂的装饰。这种装饰除主题花纹外，还饰以一二种其他纹饰，并衬以云雷纹地，整个器身显得花纹繁缛，几乎没有什么空白之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此外，西周时花纹种类增多，出现了成条的长鸟纹，特别是康王时出现的大鸟纹，鸟首反顾，尾部上卷一直延伸到冠部下垂，尾羽上还有孔雀尾巴一样的目形纹饰，十分形象生动。这时还出现了在三列展开的饕餮纹上列，饰有一种旗状图案花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周初和商末一样以动物形纹饰为主，但也发生了不少变化。

西周铜器与商末铜器的最大区别是铭文字数的增多。商代铜器从武丁晚期开始出现铭文，商代晚期一般以五六字为多，但铭文较长的如前面所提到的“邲其卣”和“戍嗣子鼎”等为铭文最长的铜器，但一般也不过四五十字。但西周早期的铜器开始出现了长篇的铭文。如武王时的标准器“大丰簋”有76字，而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有291字，“小盂鼎”铭文竟达400字左右。铭文的内容也很丰富，除了记述为亲属或为自己铸器的事由以外，还有的记载了周初的重要祭祀、征伐和赏赐等重大政治活动，为研究西周初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大量资料。在文字结构上，首尾出锋，严谨秀隽，行款书法自如，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三、西周的社会生活

在广泛使用奴隶劳动和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周初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由于金属工具有所增加和在井田上实行大规模的“耦耕”，较商代有了发展。这个时期，栽培了稻、粱、黍、麦、菽（shū）、稷、粟和桑、麻、瓜、果等“百谷”和“百蔬”，基本上具备了后世所有的主要作物品种。与此同时，手工

业也有了发展。此外，畜牧与渔猎也在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商业和交通的发达，则促进了奴隶制经济的繁荣。

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和掠夺周围一些少数民族的土地和财富，周王朝建立了庞大的军队——“西六师”、“成周八师”和“殷八师”。与此同时，还制定了严酷的刑罚，残害那些敢于反抗贵族统治的人。

周朝统治阶级还从商朝贵族手里继承了“天命”这一欺骗麻醉广大被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并把“天命”与“德治”结合起来，这就是周统治者所谓的“敬天保民”，思想统治也比商朝进一步加强了。

（一）匹马束丝与五个奴隶

西周初年，在武王灭商和成王、周公巩固周王朝统治的一系列战争中，获得了大批商人俘虏并从周围各方国也抓到了大批的俘虏。据说周武王时就曾灭掉 99 个方国，斩首 177 779 个，抓获俘虏 310 230 人。此外，还有 652 个方国部落归服了周王朝。

武王灭商以后，周王朝又经过周公直到穆王时的历次对东方、南方和西方各少数民族的征伐，大大地扩充了奴隶的来源。著名的康王时“小盂鼎”记载，周王朝在一次对鬼方的战斗中，抓住了鬼方的三个酋长，杀掉了 3 800 多人，俘虏了 13 801 人。在另一次对鬼方的军事行动中，又抓到了酋长一人，杀死了 137 人，抓获了若干人作为俘虏。如此等等，周初的奴隶数目大大地膨胀了。

大盂鼎铭文

在西周初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奴隶劳动所提供的剩余产品

也有所增多，所以周朝统治阶级对奴隶的大规模屠杀要比商王朝大为减少。这一现象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反映。我们在殷商时期的一些遗址里，特别是殷墟的宫殿区和王陵区，动辄就发现成百上千具用于殉葬和祭祀的奴隶尸骨；而在西周时期的一些遗址和墓葬里，发现的用于祭祀和殉葬的奴隶尸骨就大为减少了。这并不是西周统治阶级比商奴隶主阶级仁慈，而是他们发现了奴隶的使用价值，将大批奴隶驱赶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以榨取奴隶们更多的血汗。归根结底，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周王朝最高统治者，把大批奴隶赏赐给各级贵族，这在我国古文献里有不少记载。如周武王赏赐给鲁公“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绳工氏族）、长勺氏（酒器工氏族）、尾勺氏（酒器工氏族）。赏赐给康叔“殷民七族”——陶氏（陶工氏族）、施氏（旗工氏族）、繁氏（马缨工氏族）、錡氏（釜工氏族）、樊氏（篱笆工氏族）、饥氏、终葵氏（推工氏族）。赏赐给唐叔“怀姓九宗”等，在金文里也有不少关于赏赐奴隶的记载。如成王时的“令簋”记载了成王赏赐给令“臣十家，鬲百人”。康王时的“大盂鼎”记载，康王一次就赏给盂周人原有的奴隶头目“邦司四伯”和“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此外，还赏赐了从殷人手里夺来的奴隶头目“三伯”和“人鬲千又五十夫”；另一件铜器“麦尊”也记载了康王赏赐名叫麦的奴隶主赭衣裸足的奴隶——“者䄷臣”200家。

西周的民、臣、人鬲都是对奴隶的称呼，而作为农业奴隶的庶人在周初处于奴隶的最下等。虽然奴隶在周初不像在商朝那样被大规模地屠杀，但仍然是贵族们的私有财产。在贵族的各种财富中，奴隶是最不值钱的一种“物品”。古书《周礼·地官·质人》说：“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各种货物是按由贱到贵的顺序批列的，而“人民”则在各种财富中属于最贱的一种。在周贵族的眼中，奴隶仍然只不过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可以和牛马一样被任意买卖。有一件孝王时的铜器“曶鼎”，就记载了五个奴隶的价格与一匹马再

加上一束丝的价格相等，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奴隶处在牛马不如的悲惨地位。

（二）千耦其耘

《诗经·周颂》里有一首诗叫《载芟（shān）》，描写了周代田野上大规模从事集体农业劳动的情景。诗人是这样描写的：

你锄草来我砍树[①]，	（载芟载柞，）
干起活来真迅速。	（其耕泽泽。）
两千人用千副耦，	（千耦其耘，）
耕了低处耕高处。	（徂隰徂畛。）
主人大少爷来巡田，	（侯主侯伯，）
后跟着小少爷一长串。	（侯亚侯旅。）
打手、帮闲四处蹓，	（侯疆侯以，）
逛累了在田头吃午餐。	（有嗿其馌。）
送饭的妇女被调戏，	（思媚其妇，）
随来的孩子被耍着玩。	（有依其士。）

这首诗，我们认为说的是2 000名奴隶同时在大片土地上劳动的场面。所谓“耦耕”，就是在翻地时，需要一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推，两个人共同操作一副翻土用的耒。《诗经》里的另一首诗《噫嘻》描写的劳动场面比这首诗里描写的场面还要大，据说在范围30多里的大片土地上，有2万多人同时在进行耦耕。

大批在田野上劳动的奴隶，连一件自己的生产工具也没有。他们耕地用的耒和收割用的镰刀，都是属于奴隶主的。为了防止消极

① 本书所引《诗经》各诗，由于对西周社会性质的不同看法，学者们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主要以郭沫若和范文澜为代表。郭沫若认为《诗经》里不少有关周代的篇章，反映了西周奴隶社会的历史面貌。而范文澜则认为这些诗是周代进入封建社会的证明。本书所引有关《诗经》各篇的解释，主要依据郭沫若的看法。

怠工和破坏农具等反抗行动发生，奴隶们的生产劳动是在奴隶主阶级超经济强制和监督之下进行的。《载芟》这一首诗所描写的场面，就是奴隶主带着他的长子、二儿子等一家老少和打手们到田野里去监督2 000名正在劳动生产的奴隶的事情。

周代的农业奴隶在贵族和农官的监督之下，使用极为简单的生产工具，依靠大规模的原始协作，开垦了许多耕地。他们把大片的荒地经过砍伐树木、放火烧荒，变为可以种植作物的土地。新开垦出来的土地第一年叫做“菑”（zī），经过二年种植的土地叫做“畬”（yú），经过三年改良和耕作的土地叫做“新田”。

周王还要在每年春天举行一次“藉田”典礼。所谓“藉田”，就是在每年耕田的季节到来之前的第五天，管气象的大臣测知风向有了变化，忙向国王报告春耕时节已到，该准备藉田典礼了。周天子得到了报告以后，为了表示对神的虔诚，连忙改换到另一间干净的宫室去住，也不再举行什么活动。周王手下的大臣们也都学着周天子的样子，换到一间干净的房子里住上三天。周天子在这个期间，必须洗澡，饮用的酒也要特别干净，以免不清洁而渎神，这就是所谓的“斋戒沐浴”。到了举行典礼的日子，国王带着各级官吏、大小贵族和农人们一齐来到大片的土地上。在主管农业大臣的主持下，首先在田间祭祀农神，然后国王在太史的引导下，拿起了耕田的耜，推一下就算完事。接着，大臣们按照爵位的高低，依次在田野上翻地。据文献记载说，国王翻一下，公翻三下，卿翻九下，大夫翻二十七下……藉田典礼宣告结束。剩下的土地，还是由奴隶们翻完，这就是“庶民终于千亩”。

在周宣王以前的各代西周国王，每年春天都要例行公事地举行一次“藉田”仪式，以此表示他们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宣王以后，西周王朝开始向下坡路走去，“藉田”典礼就逐渐废弃了。

有一件成王时的铜器“令鼎”记载了周天子参加藉田的活动。我们从铭文中可以知道，周成王名义上是到諆田这个地方举行藉田仪式去了，但实际上他在这个地方与大小官吏举行了一场射箭比

赛。有两个名叫令和奋的贵族，因为他们箭法好，先马疾行，讨得了周天子的欢喜，回来以后就被天子赏赐了臣奴十家。

（三）“公田”与“私田”

周人灭商以后，获得了黄河中、下游大片的肥田沃土。周天子把这些新征服地区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自己的同姓兄弟和异姓亲戚、功臣，在适应耕作的地区建立了一个个新的诸侯国，诸侯们又继续把自己封国的土地分给自己属下的各级贵族。这实际上是周人从西部比较贫瘠地区向东方适于耕作地区的大规模“殖民”活动，这就是铜器铭文中所说的“授民授疆土”。

我国古文献里有不少关于周天子大规模赏赐各级贵族土地的记载，周代铜器铭文里也有不少这方面的材料。成王时的“趞尊”记载“王在厈，锡趞采曰䟒”，即周天子把䟒地赏赐给名叫趞的奴隶主。“中齍”记载“王在寒次，王令大史兄褱土”，成王赏赐给大史褱地的土地。不仅西周初期周天子大批地赏赐给臣下土地，一直到西周中晚期还在继续把大片的土地赏赐给贵族。如懿（yì）王时“卯簋”记载说：“锡汝马十匹、牛十。锡于乍一田，锡于宲一田，锡于队一田，锡于截一田”。贵族卯除了受到周天子马和牛的赏赐以外，还获得了乍、宲、队截等处的土地。有一个贵族克，也曾受到了懿王赏赐给他埜、淠、䣄、康、匽、陮原、寒山等处的土地，这就是“大鼎”“克……锡汝田于埜，锡汝田于淠，锡汝井家𥻊田于䣄，以厥臣妾；锡汝田于康，锡汝田于匽，锡汝田于陮原，锡汝田于寒山”的记载。孝王时的“召卣”也记载了“王自教使赏毕土，方五十里”，这是周天子把毕地方圆50里的土地赏赐给一个名叫召的大贵族的记录。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是说，周王朝的土地都是属于周天子所有，而各级贵族对天子所赏赐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受天子赏赐土地的各级贵族，虽然世代对这些土地享有使用权，但不得买卖，这就是所谓的“田里不鬻（yù）”。周天子对

土地的所有权不仅表现在可以任意赏赐，而且还表现在周天子随时可以把土地收回。懿王时的“大簋”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在十二年三月的一天，周王打算收回�婴的土地，以便再赠送给贵族大。他先叫一个名叫豖的贵族把这件事情通知了趞婴。趞婴听了以后，不仅不敢反对，还乖乖地让豖转告天子说：“我决不敢舍不得这些土地”。最后，大得到了周天子从趞婴处收回的那些土地。

周天子赏赐给各级贵族的土地，都有一定的范围和严格标志。著名的厉王时的铜器“散氏盘”，记载了眉田和井邑田是以河流、树木、道路、山岗等自然物为标志的。这些田地，又用遂、沟、洫、浍、川等宽窄不同的灌溉系统和分布在田间的径、畛、涂、道、路等大小不同的道路划分为比较规则的方块，所以又叫做“井田”。古代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百亩”（约合现在31.2亩），是井田制的最低的单位。有的文献记载，“九夫为井”，以900亩为一井。也有的文献记载，“十夫为井”，以1 000亩为一井。根据“井”的多少，把全国划分为乡、遂、都、鄙等行政单位。

贵族们按照身份和职位不同，分得不同数量的土地。这些土地按“井”为单位划分，很容易计算出他们所得俸禄的多少，也便于考察井田上的劳动者耕作的好坏，有利于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各级贵族还在这些“井田”之外，利用剩余劳动开辟了很多“私田”。与“私田”相对的“井田”，便叫做“公田”了。贵族们不仅希望公田上能得到好收成，更盼望他们那一块不向国家交纳税赋的私田得到丰收。《诗经·小雅·大田》这首诗把奴隶主贵族的这种心理暴露无遗。诗中说：

乌云起，布满天，　　（有渰萋萋，）
瓢泼大雨没个完。　　（兴雨祁祁。）
甘霖降到公田里，　　（雨我公田，）
随后浇透我私田。　　（遂及我私。）

这种贵族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的“公田”——井田，是西周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随着生产的发展，“私田”愈开愈多。西周中期以后，贵族之间就可以在国家监督之下转让或交换“私田”了，从而使西周前期“田里不鬻”的国有土地制度被打开了缺口，产生了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因素。而那些公田，也由于贵族们世代相传，已形成事实上的所有权，便逐渐出现了交换和买卖的现象。

进入春秋时代以后，铁农具的使用使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井田制进一步遭到破坏，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就逐步被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所取代了。

（四）《豳风·七月》和农夫的生活

周代的“农夫”，虽然有“家室”，聚族而居，但身份很低。周王朝对他们的控制十分严格，设置了“乡”、“遂”等各级行政单位。据说在“六乡”（离王都百里以内的地方）的行政组织是：五家组成一“比”，五个“比”组成一“闾”，四个“闾”组成一个“族”，五个“族”组成一个“党”，五个“党”组成一个“州”，五个“州”就构成了一个“乡”；而“六遂”（离王都100里外，200里以内）的行政组织是：五家组成一个“邻”，五个“邻”组成一个“里”，四个“里”组成一个“酂（zàn）”，五个“酂”组成一个“鄙”，五个“鄙”组成一个“县”，五个“县”就构成一个“遂”。每个乡和遂都有1.2万多家。每一级行政单位都有一个头目管理，从最低的下士开始，级别愈来愈高，直到乡一级的行政机构由卿控制。

农夫们居住在邑里。邑的四面都修起高高的围墙或挖下深深的壕沟。春天到来以后，农夫们就被成批地赶到了田野上。他们在田野上耕种、管理，直到庄稼收获以后，总算结束了田野里的劳作。所谓“邑”，实际上是奴隶们的集中营。人们只能从一个小门出入。每天天还没亮，里长就坐在门的右边，邻长坐在门的左边，清点着

应该出去劳动的人数，直到全部劳动力都下地了，他们才离开邑门。晚上收工时，里长和邻长又早就坐在了门的两边，瞪着眼睛一个个地清点回来的人数，生怕有人逃跑。虽然冬天田野里再也没有农活儿可干了，但贵族们不让奴隶得到一点儿休闲。白天让他们干修理房屋一类的劳动，晚上他们还得和妇女一起搓绳。一天要干出一天半的活儿，一年到头不得一点空闲。虽然贵族对广大奴隶控制得十分严密，但也阻止不了奴隶们的逃亡反抗。据《易经》记载，有一次就逃走了“邑人”300户。

《诗经》里有一首民歌，以十分哀伤而凄凉的语调，如怨如诉地叙述了农夫们一年四季的辛酸生活并愤怒地控诉了贵族的残酷剥削，这就是有名的《豳风·七月》。如果今天重读一遍这首著名的民歌，对我们了解周代奴隶们的生活是很有意义的。诗是这样描写农夫们的悲惨境遇的：

一进十一月，北风在号叫着，滴水成冰，冬天来到了。农夫们连一件过冬的棉衣也穿不上，冻得瑟缩发抖，在田野里为老爷打狐狸……妇女们把猎来的狐皮给贵族们缝成厚厚的皮裘，含着眼泪看着在冰天雪地里自己挨冻的亲人，好让人心痛啊！

到了十二月，衣着单薄的农夫又被赶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狩猎活动。贵族们跃马纵犬，神气活现。而农夫们只得跟在后面东跑西颠，也学着舞刀放箭。运气好的人打到了野猪，但稍大一点的早被老爷们拿走了。只有那些小得可怜的野猪崽儿，才归农夫自己享用。其实，打猎只是一种军事训练的形式，贵族们通过打猎，使农夫们略懂一些武艺和能使用枪、箭，为的是将来好让他们为自己去到战场上打仗卖命；也有的农夫被命令去冰场上凿冰，留做老爷们夏天消暑用……

好不容易把年关熬过去了，就是在正月里农夫们也不得休息。有的开始忙着修理农具，为二月给老爷春播作准备；也有的被派到老爷的冰窖，把一块块的冰拖入窖里藏好……

三月播种开始了。田畯在地里蹓来蹓去，监视着干活的人们。

干活的农夫们真是紧张呵！回去吃饭的时间也不给他们。妇女们和男人一样毫不得闲，或是往地里送饭，或是提着篮子，去采桑养蚕。贵族家的恶少们闲得发慌，趁着这大好春光出来散心了。哪个姑娘遇到了他们，那她可就要倒霉了……

庄稼种下以后，农夫们又不知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终于盼到了八月，庄稼开始成熟了。他们先要为老爷修场院，再把庄稼收下、运回，再打好、扬净，全部都缴入了贵族的仓库。辛苦干了一年，又哪有一粒是他们的呢……

收完田野上的庄稼，再结束场院上的活儿，农夫们一直要忙到十月份。但是，还没容得上他们喘上一口气，就又要给老爷修房屋、酿美酒了……农夫自己住的那间小屋，早已摇摇欲坠，但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修理，又怎能挡得住凛冽的寒风呢？……

《豳风·七月》，是一首西周初年的诗歌，就是这样把周代奴隶一年到头的悲惨生活再现在我们眼前。虽然《诗经》是文艺作品，但它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周代生活的一面镜子。因此，《豳风·七月》一直是史学家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五）畜牧与渔猎

西周时期，虽然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但畜牧与渔猎仍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由于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军事的需要，养马业仍和商代一样，在畜牧业中占有较为突出的地位。西周时期不仅把马畜养在“牢闲”之内，还有专门放牧大群马匹的牧场。《诗经·鲁颂·駉（jiōng）》里唱道：

一匹匹公马膘肥体壮，
（駉駉牡马，）
放牧在远处广阔的牧场上。
（在坰之野。）

多么惹人喜爱的一群马呵，
（薄言驷者，）
有的黑身白胯，有的白中透黄，
〔有驈（yù）有皇，〕
有的一色油黑，有的金栗发亮。
〔有骊（lì）有黄。〕
用它们拉车，气派又有力量！
（以车彭彭！）
……　……
有的黑白相间；有的白中杂黄，
〔有骓（zhuī）有駓（pī），〕
有的颜色赤黄，有的青白中布以棋盘格网。
〔有骍（xīn）有骐（qí）。〕
……　……
有的青毛中布黑鳞斑，有的白身与黑鬃黑尾相辉映。
〔有驒（tuó）有骆（luò）。〕
有的红身却黑鬃黑尾，有的黑身却生有白鬃。
〔有骝（liú）有雒（luò）。〕
……　……
有的浅黑杂白，有的红中透白霜，
〔有骃（yīn）有騢（xiá），〕
有的蹄腕上长毛飘垂，有的生一圈白眼眶。
〔有驔（diàn）有鱼。〕
……　……

在广阔的牧场上，马群在安详地吃草。不仅马匹强壮，诗人还用生花的妙笔为我们描绘了16种毛色各异的马匹……这不是留给我们的一幅绝妙的西周“牧马图”吗！

西周时期的马匹是用于驾车的主要畜力，特别是军事上驾驭战

车的需要，养马业非常受到国家的重视，有时周天子还要亲自参加“执驹”典礼呢！陕西郿县出土的懿王时的“盠尊”铭文就记载了周王参加“执驹”的事情。所谓“执驹”，就是春天母马发情，适于交配繁殖，这时便使小马驹离开其母，一则是为了不伤害怀孕母马，二则可以将小马加以调教，以供驾车时使用。西周王朝设有专门养马的机构。校人的责任是“班马政”，为王选择良种马匹。其下还有管理马匹饲养的“趣马”、给马治病的“巫马”、掌管牧场的“牧师”、驯马的“廋人”、日常具体养马的“圉人”和管理圉人的“圉师”等等。正由于中央王朝的重视，所以西周的养马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也培育了一批有名的良马。传说周穆王巡行天下，造父驭车，驾驭的“八骏”，就是“日行千里”的八匹闻名天下的优良品种。

周人祭祀时使用的“牺牲”，因祭仪不同，所需品种和规格也不相同，而且有时需用量很多。《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在宗庙祭祀时，先砍了6头牛、1只羊，接着诸侯们在祭祀时又用掉了504头牛，后又用掉了2 701只羊和猪。一次就用掉这么多牲畜，如没有发达的畜牧业，又怎么能一下子就凑起了这么多！

在西周奴隶主的庖厨中，膳夫们负责用“六牲”为国王、王后、世子们炮制美味佳肴，这当然又要杀掉许多牲畜。周王朝还专门设置了管理畜牧业的官吏，如负责政府养牛的“牛人”，为专门畜养祭祀用牲的“充人”。“闾师”还要经常了解全国畜养六畜的情况并进行督促。此外，还有“鸡人”、“犬人”、“羊人”等专门管理养鸡、养狗、养羊等事宜。“兽医”则专门为牲畜治病。

与此同时，西周渔猎业也很发达。

西周时，几乎一年四季都要举行狩猎活动。春天打猎叫“春搜”，夏天打猎叫“夏苗”，秋天打猎叫“秋狝”，冬天打猎叫“冬狩”。猎取的动物种类很多，鸟类有“六禽”——雁、鹑、鴳、雉、鸠、鸽等，兽类有“六兽”——麋、鹿、熊、麇、野猪、兔等。每逢狩猎活动时，真是戎车飞驰，马嘶人喊，放鹰纵犬，矢石

如雨，野兽应弦而毙……何等壮观的场面呵！

鱼鳖之类的水产，也是贵族们宴飨宾客和祭祀时所必不可少的上品。为了取得这等美味，人们还要到河、川、池、沼中去捕鱼。

不仅各种鱼类，连河中的介壳类水生动物也在捕捞之列。“鳖人”一官，就负责“春献鳖蜃，秋献龟鱼”等事宜。

渔猎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谋生的重要手段。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其重要性才逐步削弱。西周时渔猎虽然比不上农业经济重要，但仍较发达。尽管不一定是“竭泽而渔”，可猎取物也够广泛的了。渔猎所得，大的要献给各级贵族，小的幼兽可留给自己享用。各种动物的肉可食，羽、毛、齿、革、骨、角也能派上用场。正因为渔猎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西周王朝设置了渔人、兽人、鳖人和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角人、羽人、掌蜃、囿人、服不氏、射鸟氏、罗氏、山师、川师、冥氏、穴氏、翨氏等名目繁多、职司各异的官吏，反映了西周王朝对渔猎业也还是相当重视的。

（六）手工业的发展

周人灭商以后，全部接收了商王朝的手工业工匠，继承了殷商王朝手工业较为先进的制作技术并融合了自己民族的特点。成王时期以后，与高度发展的青铜冶铸业一起，其他各种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西周早期的陶器多为轮模合制，中晚期以后，快轮制法日益普及，产品也规格化，陶器生产日益向商品化发展。从沣西张家坡陶窑遗址可以看出，西周的制陶业是在先周时期制陶的基础上，吸收了商代制陶技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制作出一批与先周和殷商种类和器形作风不同的陶器，成为西周文明的重要代表。

制陶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原始瓷器的烧制。在河南、陕西、山东、安徽、江苏、甘肃等地的西周墓葬里，经常发现有随葬的原始瓷器出土。安徽屯溪一号墓共出土原始瓷器 68 件，为目前出土最

多的一批。历年来，各地出土的原始瓷器主要有豆、碗、罐、罍、簋、瓮等，颜色有黄绿釉、青色或青灰釉，有的还饰有方格纹或云雷纹等。这些原始瓷器和釉陶的普遍发现，标志着西周制陶手工业已达到较高水平。

制骨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西周制骨作坊在陕西扶风云塘、沣西曹家寨和张家坡等地都有发现。学者们据此复原出当时的制骨工序是：选料——裁材——制作半成品——磨制加工成成品等表明当时制骨作坊内部已有专门分工，从出土物看，这里是一处专门制作骨镞和骨笄的作坊，说明当时制骨业已向只生产一两种产品的专业化方向发展。这既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精细，又为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可能。

西周的玉器手工业也较发达，这主要是因为奴隶主贵族阶级不仅在举行各种盛典或祭祀时，需要规格和名目不同的玉制礼器和祭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用玉作为显示自己身份的装饰物。《诗经》里就有不少歌颂美玉的诗篇，如《小雅·白驹》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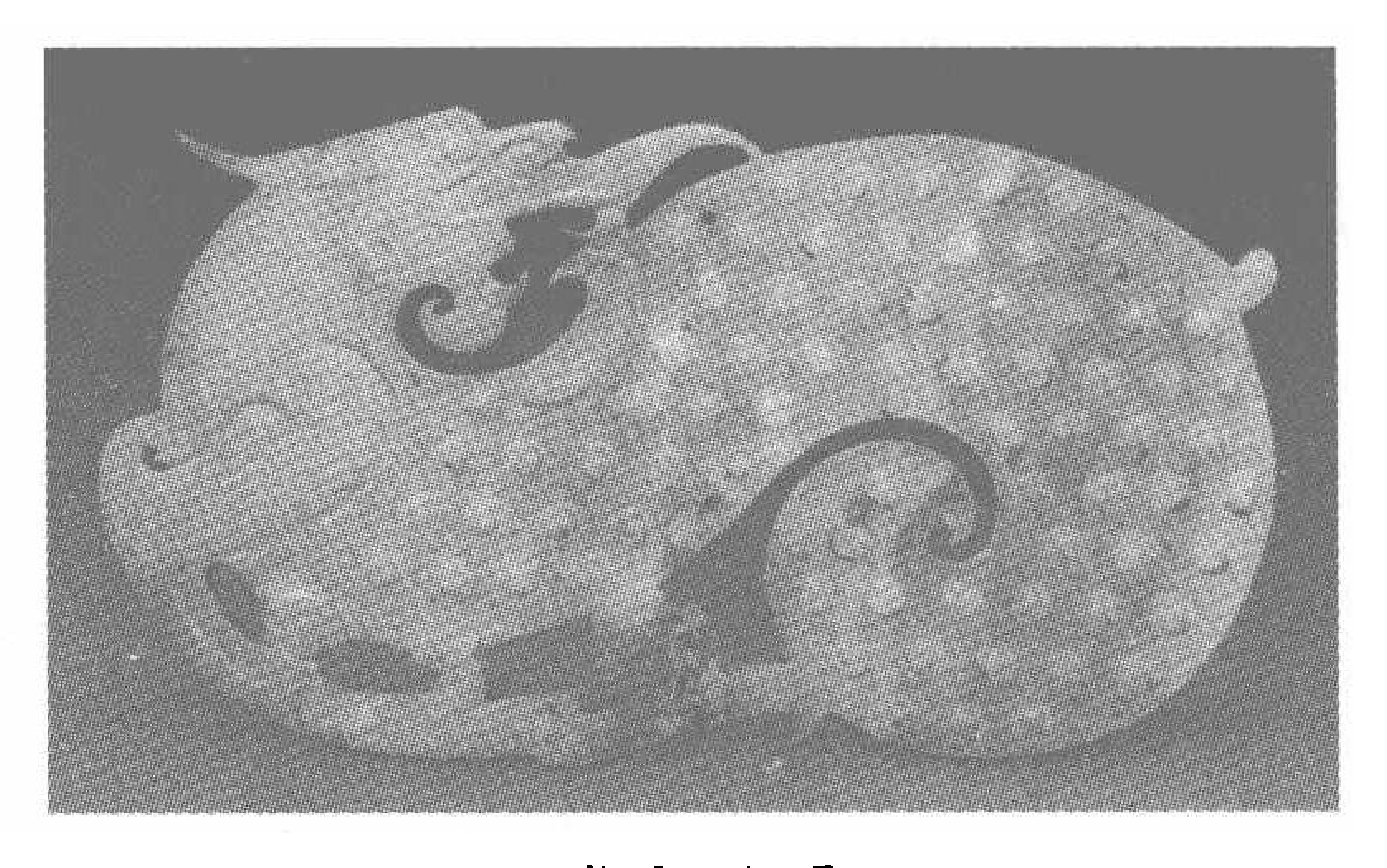
洁白的马驹已备好，　　（皎皎白驹，）
驻足山谷里撒着欢地叫，　　（在彼空谷，）
快给它抱去一捆草！　　（生刍一束！）
贵客的品质如玉洁呵，　　（其人如玉，）
别吝惜金石良言多赐教，　　（毋金玉尔音，）
可不要只想告别，话就说的少！　　（而有遐心！）

这是用玉质的洁白比喻客人品质高尚，又用玉石来比喻客人临别赠言的珍贵。《诗经·卫风·木瓜》里，则唱的是少男少女把玉装饰品作为定情的珍贵信物：

姑娘深情地送我一只香木瓜，
（投我以木瓜，）

我心领神会，忙解下珍爱的佩玉为报。
（报之以琼琚。）
这可不是普通的礼尚往来，
（匪报也，）
为的是我俩一见倾心，永远相好！
（永以为好也！）

作为礼品和祭品用的玉器有璧、环、瑗、璜、圭、璋、琮和仿兵器的仪仗玉戈、玉刀、玉斧、玉戚等。装饰用的玉器多为半立体的小动物形象，如鹿、鱼、蚕、虎、牛、兔、马、蝉等等，而且多穿小孔，便于佩带。这些玉器，制作精细，打磨光亮，形象逼真传神。著名的成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就是反映了制作玉器时，要经过用专门的石头错磨的工艺过程。



龙凤玉佩图

西周的纺织业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少遗址出土了陶纺轮和石、骨质的纺轮和锥、针等遗物，在陕西泾阳高家堡和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中都出土了麻布痕迹。洛阳一座西周墓中发现过用毛笔画成几何图案的布画幔痕，呈黑、白、红等四种颜色；丝织业也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宝鸡茹家庄西周強国墓地出土不少玉蚕，大的长约四厘米，小的不到一厘米，形态逼真、生动。在墓葬出土铜器上或淤泥中还发现了二、三、四层不等的丝织品痕迹，大多为平纹织品，但有一块印痕为斜纹丝织品，上面的刺绣印痕为鲜艳的朱红和石黄两种颜色，还附有发暗的褐色和棕色。据专家研究，这块丝织物印痕应是西周的绮——地帛和花纹都为斜纹的提花丝织品。这块印痕可能是用绣料制成的衣衾，因年代久远已经腐烂，而它的原

材料应就是“黹（fū）屯”。在西周铜器铭文中，经常见到周天子动辄就赏赐给臣下“玄衣黹屯”，可能就是这样的丝织刺绣衣料。

西周的建筑业也很进步。陕西岐山凤皱村宗庙基址以殿堂为中心，四周有庭、房、门、廊、阶、屏等建筑。这座“前朝后寝”或叫“前堂后室”的西周早期宗庙（或宫殿）建筑群，开了我国后世成组宫殿建筑艺术的先河，扶风召陈的“四阿重屋”式宫殿，开始使用瓦，这也是我国建筑史上的重大进步。此前的商代，宫殿是“茅茨土阶”——房屋盖草顶。自西周早、中期以后，开始在屋脊等处用瓦。到了西周晚期以后，房屋上面就大部分覆盖瓦了；与此同时，还有木构建筑。1958 年湖北圻春毛家咀西周遗址，发现了一组大型木构建筑遗址。在遗址里发现 230 多根木柱纵横分布，排列成行，分布在大、中、小三个水塘底部破坏的地方。其中以中型水塘发现的木构建筑形制最为清楚，共发现木柱 109 根，直径 0.2 米左右，排列整齐。有的水柱上凿有榫眼，可以插放横柱架扶板墙，木柱周围还残留木板痕迹。根据墙角和木柱的排列情况，我们可以将它们复原成长形房子两间。房内木柱分布也疏密不同，为房内小隔间。在一个房子附近发现了大块平铺木板，另一处房子附近还发现了木质楼梯形残痕。在大型水塘内也发现了木板及架支地板用的木柱。据研究，这些建筑物很可能是木构楼房。

（七）“周道”、“周行”与西周的交通

西周的交通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形成了以镐京和洛邑为中心，通向各诸侯国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这就是《诗经》一书里反复吟诵的“周道”与“周行”。“道”和“行”就是道路的意思。西周时有各种不同的道路，如鲁国就有“鲁道”。而周道、周行是由西周王朝修建的一种通往各诸侯国的大道。

这些大道的修建，主要目的是为巩固和加强西周王朝对各诸侯国的控制。首先，这些道路为周天子巡视天下诸侯和地方诸侯到周京朝觐周天子提供了便利，加强了周王朝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其次，各

国诸侯定期向周王朝贡纳服物，源源不断地通过周道输往周京。而周王朝对各国诸侯的赏赐，也通过条条大道输送到各诸侯国。这加强了中央王朝与地方诸侯经济上的联系。再次，这些道路有利于西周王朝的军事调动，如有某方诸侯叛乱或他敌入侵，就可迅速调兵遣将，派兵前往。

西周王朝对交通问题很是重视，设立了专门的机构野庐氏和下属司险、遗人、候人等官负责守护和管理道路，有时还派员检查道路的情况。周人还把保持道路的通畅作为巩固统治的一条重要经验。为了使后世子孙永不忘记，写进了在庙堂祭祀祖先所唱的颂诗中。《诗经·周颂·天作》唱道：

高高岐山造化生，	(天作高山，)
古公辟居善经营。	(大王荒之。)
芟除草莱建郭室。	(被作矣，)
老祖遗业文王承。	(文王康之。)
慕义诸侯往来便，	(彼徂矣，)
只缘通岐大道平，	(岐有夷之行，)
子孙莫忘修路功。	(子孙保之。)

不仅在庄严的颂歌里反映了周人对交通事业的重视，而在贵族的诗歌《雅》和民间诗歌《风》里，也常有以“周道”或“周行”为题材的诗句。《诗经·小雅·大东》里，一个谭国（现山东历城东南）的贵族唱道：

无论镐京以东较近还是更远的地方，
(小东大东，)
都被西方新来的征服者搜刮干净。
(杼轴其空。)
老百姓只剩下了一双葛麻薄草鞋，

（纠纠葛履，）
又怎能抗得住冬天遍地的霜冰？
（可以履霜？）
看那些新贵们趾高气扬，
（佻佻公子，）
在宽阔的周道上招摇撞骗，往来匆匆。
（行彼周行。）
他们车来车往都掠走大批民财，
（既往既来，）
我无比痛恨他们这些无耻行径！
（使我心疚！）

这是诗人在发泄他对周王朝大肆掠夺镐京以东的小东、大东地区（现河南、山东一带）的不满。这些地区，原来居住的殷人和同盟者徐、奄、薄姑等族的财富，被周王朝从周道上运走了。

条条周道，凝聚着胜利与失败，欢乐与痛苦，壮别与情思……周道不仅与西周王朝的安危，而且还与社会各阶层的人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西周统治的中心地区，西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有一条大道相连。这条大道西起陕西丰镐地区东行，经过郑国（现陕西华县），进入伊洛平原达东都洛邑。西周就是以镐京和洛邑为中心，向西及西南方、东方、南方、东南方和北方修筑了几条通向全国各地的放射形大道。学者们考证这些大道的走向是这样的：

向西及西南方的大道，一直达到在今天宝鸡、凤翔一带立国的夨、散境内，并达大散关以东。从大散关向南经“周道谷”直通巴蜀。

向东方直达齐国的大道，从东都洛邑开始，经过桧国（现河南郑州以南）、谭国（现山东济南历城一带），就到达齐国（现山东临淄以北）。西周时称齐鲁之地为“大东”，周道把它们与王畿地区紧

密联结起来。

向南方达到江汉地区的周道。一条是从镐京出发，经现陕西蓝田入骁关，再进入商洛地区，经过商县境内的武关，就进入了河南淅川境内，直达申国（现河南南阳）。申国姜姓，是西周王朝控制南方荆蛮的军事重镇。从申国向东，就是曾国之地（现湖北随县）。据学者考证，古书中记载的随国，就是曾国；另一条大道是从洛邑出发，从轘辕关（现河南缑氏县东南）南行，循颍水河谷南下并过汝水，经城父（现河南宝丰县境）和鲁阳关、西鄂（现河南南召县东南，南阳北），就到达申地。这条大道直到春秋时还在沿用，是南北用兵的重要军事要道。

向东南通往淮夷方向的大道，从东都洛邑出发，途经伾（现河南巩县汜水镇西北）向东南下，经过桧、蔡（现河南上蔡），可至安徽境内的㝬（胡，现河南东、安徽西北）、巢（现安徽巢湖附近），直到淮夷地区（今江苏、安徽境内的淮河流域）。《史记·秦本纪》记载说，周穆王时，生活在这一带的淮夷首领徐偃王造反，善于驭车的秦人祖先造父赶紧把在外巡行、乐以忘归的周穆王拉回周京。周王朝挥师东南，沿着周道一日驰驱千里，及时把徐偃王的叛乱平定下去。


西周晚期青铜方壶

向北的大道有两条。一条是从镐京出发，经今山西永济浦津渡过黄河，到达韩国（现山西河津、万泉一带），再沿汾水北上到晋中地区，把周王朝和封在陕西东部、山西西部的诸侯国联结为一体；另一条大道是从洛邑出发，经过伾，东北行过卫（现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邢（现河北邢台），直达燕国（现北京一带）。这一条大道把周王朝和封在北部现河南、河北的诸侯国联结起来。

这一条条从周王畿伸向全国四面八方的大道，平坦、笔直、宽

阔。《诗经·小雅·大东》描写说："周道平坦如磨石，笔直犹如弓发矢"（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在这样的大道上，"四匹公马拉大车，迢迢周道真宽阔"〔四牡騑騑，周道倭迟。（《诗经·小雅·四牡》）〕。在大路两旁，还种上树木做标志或植有防护道路的树墙。此外，道路上还设有专供食宿用的亭、舍等设施，便利了行旅的往来。

（八）商业与货币的发达

手工业和交通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西周商业和货币交换的繁荣。不少下层人民参与了商业交换活动，《诗经·国风·卫风·氓》里记述说：

乡下汉子笑满面，	（氓之蚩蚩，）
抱着布钱换丝线，	（抱布贸丝。）
他哪有心做买卖？	（匪来贸丝？）
约我市场来相见。	（来即我谋。）
…… ……	…… ……

说的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夫，笑嘻嘻地来到市场上，用布（有学者认为"布"就是一种铲形金属钱币）来交换丝织品。其实，他来市场上买丝织品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原来为的是找个理由跟自己的心上人商量终身大事。可以想见，西周社会下层的人们，有的带着自己的手工业制品或农产品，有的带着布币。云集在市场上，贩夫贩妇们你买我卖，再加上杂侧其间的白发老叟和借机来赴约会的男女，真是一片繁华景象呢！不仅如此，西周王朝"工贾食官"，社会上层的奴隶主统治阶级也参加到商业交换的行列。

1981 年陕西岐山流龙嘴村出土的"齐生鲁方彝"盖上，有铭文 50 字，记述说：

惟八年十又二月初
吉丁亥，齐生鲁肇贾
休多赢，惟朕文考乙
公永启余。鲁用作朕
文考乙公宝尊彝，鲁
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文中的“齐生”即齐国人，鲁为作器者的名字。据研究，这个方彝盖应为西周中期恭王时物，铭文记述的是一名齐国名鲁的贵族经商赚钱发了财，这是因为得到他先父乙公在天之灵的启发和帮助，因此铸造了这个纪念父亲乙公的宝器。

西周王朝也有官办商业。“颂鼎”铭文说：“王曰：颂，命汝官司成周贾廿家，监司新造贾，用宫御”，是周天子命令大贵族颂管理官办商业，即成周的官商廿家和“新造”这个职官属下的商业。在边远地区与少数民族开展的商业贸易活动，也是在周王朝的控制和监督下进行的。周宣王时代的“兮甲盘”铭文记述说：

……王令甲司成周四方责，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晦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𠂤即市，敢不用令，则即刑扑伐。其惟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入蛮宄贾，则亦刑……

“司”是管理的意思。“责”是贮积，“四方责”就是四方的贡纳品。“帛”即帛，“帛晦人”就是入贡布帛的人。“𠂤”即次，为管理市场的机构。而“市”就是市场。“刑”是以法律惩罚，对贾人（即商人）而言。“扑伐”即征伐，是对方国说的。“入蛮”即乱入市场。“宄贾”是搞非法交易。这段铭文，说的是周宣王五年，命令大贵族兮甲管理成周四方的贡物，范围一直到南淮夷。淮夷早就臣服周朝并缴纳贡献，从来也不敢拒缴布帛、粮草和人众。因此，

现在淮夷的商人也必须服从命令，到规定的市场上去做买卖。如有人不遵交易规则，就要严加惩办；而周王朝的诸侯贵族在做买卖时，乱入市场或与淮夷人搞非法交易，也要受到惩处……很显然，淮夷人与西周王朝的贸易活动，或是周王朝的贵族们与淮夷人的贸易活动，都是在西周王朝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

无论是周王王畿，还是四方诸侯；无论是在都城，还是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都设有专门进行交换活动的市场。市场上的物品很是丰富，《周礼·地官·司徒》记载说，“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偾质剂焉”。这是说，市场上从最贱的奴隶人丁，到供人役使的牛马牲畜；从武士们使用的各种杀人兵器，到供贵族们赏玩的奇珍异宝……真是琳琅满目，样样齐备，种类很是繁多。而遍布各地的市场，周王朝设有专门的官吏进行管理。

管理市场的最高官员是“司市”。司市全面负责市场的惩罚、度量衡的核准、制定市场法规和划定商品的销售区、取消违禁物品、保护市场秩序等。为了保证上述任务的完成，司市以下又设立许多职司不同的小官。如质人负责检查市场物资和颁发商业契约，廛人负责税收，胥师负责惩治奸商和解决贸易争执，贾师负责规定商品价格，司虣（bào）负责维护市场秩序，司稽负责巡逻。此外，还设有一些地位更低的市场管理官。

西周商业的发展，促使货币需求量的增加。和商代一样，贝币仍是西周的货币。成王时的“遽伯睘簋”铭文记载说：“遽伯睘作宝尊彝，用贝十朋又四朋”，就是说这个铜簋价值十四朋贝。“裘卫盉”、“格伯簋”、“曶鼎”的铭文有关买卖的记载，可以使我们计算出玉璋、土地、马、奴隶与贝币的比价。因此，贝币成了西周商品流通的价值尺度和财富的象征。西周王朝常用贝币赏赐臣下，这在武王至夷王时的铜器铭文中是屡见不鲜的。一次赏赐，有时多至50朋的，如“小臣静彝”、“效卣”、“敔簋”等都有记载。最多有赐贝100朋的，如成王时的“墬方鼎”有“公赏墬百朋”。在贵族

们之间，也以得到百朋贝币的馈赠为荣耀。

在历年发掘的西周墓葬中，也经常见到以贝殉葬的。沣西张家坡和客省庄发掘的182座西周墓中，共出贝1 000枚以上，殉贝的墓达一半左右。而张家坡463号墓内还出土玉、石磨成的贝11枚。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出土3 472枚贝，而一号墓就出贝2 915枚。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贝作为一种货币，不仅在周人的现实生活中，而且在冥世仍然是财富的象征。

与此同时，西周时代还使用龟币、玉币和金属货币。学者们认为西周的金属货币有的以金属秤量为单位，有的为铸币。周天子经常用以重量为单位的金属货币进行赏赐，这在铜器铭文中是常见的。金文中出现的金属货币重量单位有“寽”、“钧”等。“寽”即锊，每锊重量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六两三分之二两、六两等三种说法。“钧”的重量也有30斤和大半两这两种不同看法；虽然根据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西周青铜铸币当已经存在，但还没有得到出土实物的证明。

如此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西周的商业和货币交换是相当发达的，这对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九）“西六师”、“成周八师”和“殷八师”

周武王伐纣时，由于充分利用了商王朝的内部矛盾和选择了有利的时机，因而只用了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就一举灭掉了有600多年历史的商王朝，取得了胜利。

为了有效地镇压商王朝遗民和一些少数民族的反抗，加强周贵族阶级的统治，周王朝的军事力量在灭商以后极大地加强了。不仅周王朝建立了强大的常备军“西六师”、“成周八师”和“殷八师”，而且一些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所谓“西六师”，是驻扎在首都丰、镐一带的军队。在金文里常有关于“西六师”的记载。如“禹鼎”说：“王乃命西六师”，“盠尊”说：“王令盠曰：‘摄司六师……’”，孝王时的“䜌贮簋”

说："王令东宫追以六师之年"，"南宫柳鼎"说："王呼作册尹册令柳……司六师"等等。这里的"六师"，也就是"西六师"，是周天子直接统帅的一支宿卫军，由于常驻西方，所以才称为"西六师"。西六师不离周王身边并在他直接指挥之下，因此天子一离京城，马上就有"六师及之"，前呼后拥，场面十分威严。"盠尊"又记载六师之中还有"王行参有司"的特种部队，是周天子的御林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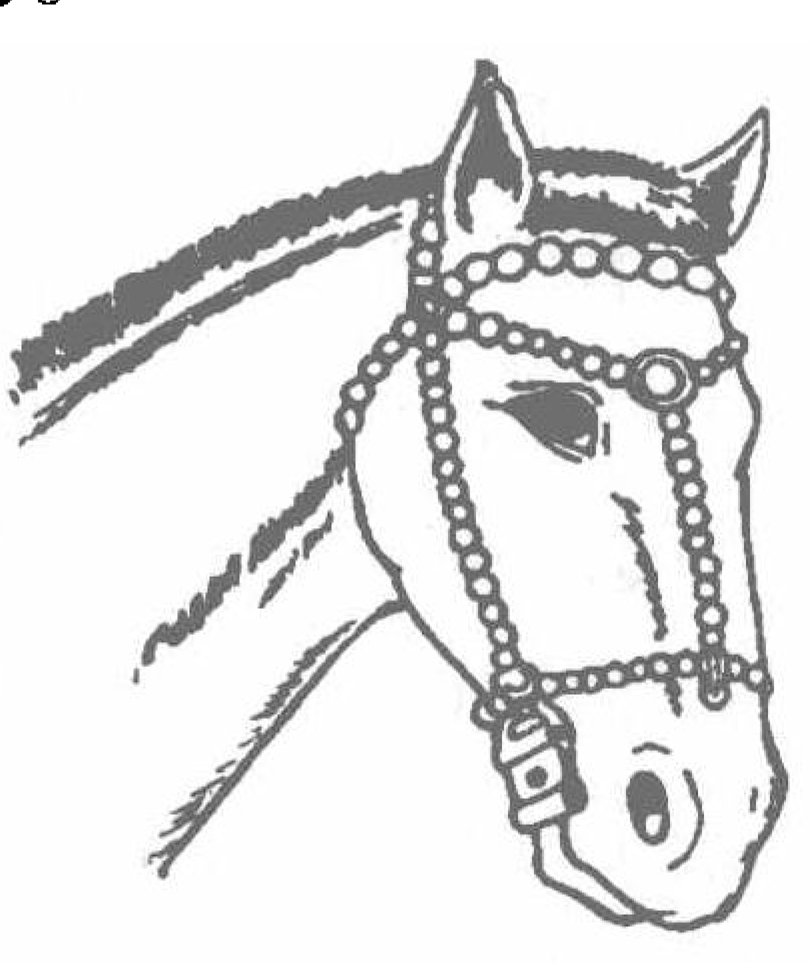
"成周八师"是驻扎在周王朝新建的重镇——成周的军队，又简称"成师"。金文里也常有关于"成周八师"的记载。厉王时的"小克鼎"说："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昌壶"说："王乎尹氏册令昌曰：'更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师'（"更"有延续、继承的意思。"乃"即你。"更乃祖考"是"继承你的先人"）"。此外，穆王时的"竞卣"等铜器也有关于成周八师的记载。根据铜器铭文研究，成周八师除了担负镇压被迁到洛邑的殷顽民的任务以外，主要的任务是镇压南夷等少数民族部落的反抗。"竞卣"说："惟白犀父以成师即东，命伐南夷"，就是记载穆王伐南夷时，曾命令名叫白犀父的大将带领成周八师到东方，参加征伐南夷的战争。另一件穆王时的铜器"录伯㦰卣"也记载说："叡！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叶自"。所谓成周师氏，就是成周八师的将领。淮夷侵犯中原，周王曾命令他统帅成周八师屯驻于叶地。

至于"殷八师"，则是驻扎在殷墟故地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用以镇压敢于反抗的殷人和东夷的叛乱。西周初年成王时的"小臣謰簋"铭文记载说："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可能在周公东征的过程中这支部队就已编成，对巩固周王朝在东方的统治起了重大作用。后来，随着王室力量的逐渐衰微，殷八师退驻西土。根据"盠尊"周天子命令盠"摄司六师眔（及）八师"的铭文判断，可能从穆王时代殷八师就离开了殷墟故地，"殷八师"的设置是与周初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的。康叔封于卫，但实际上还在

周王朝的控制之下。但到了夷王时，周王朝正式封卫国为侯以后，王室的力量实际上已经退出了东部殷墟地区，但在西方还保存着“殷八师”的建制。厉王时“禹鼎”记载，在一次伐噩的战争中，周天子同时调动“西六师”、“殷八师”出战，说明早已与“西六师”一同驻扎在西土了，而“殷八师”的“殷”，只不过是个名义而已。

“六师”、“八师”的编制虽不见文献记载，但古代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这样的编制是以 100 人为卒，500 人为旅，2 500 人为师，12 500 人为军。学者们认为师氏为最高军事长官，因此西周时代的军队最大建制也应到师级为止，尚没有军一级的编制。“六师”为 1.5 万人，“八师”即 2 万人。到了西周后期，宣王“料民于太原”以后，军队人数才大为增加。但军一级编制是春秋时代为适应大国争霸的加剧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才建立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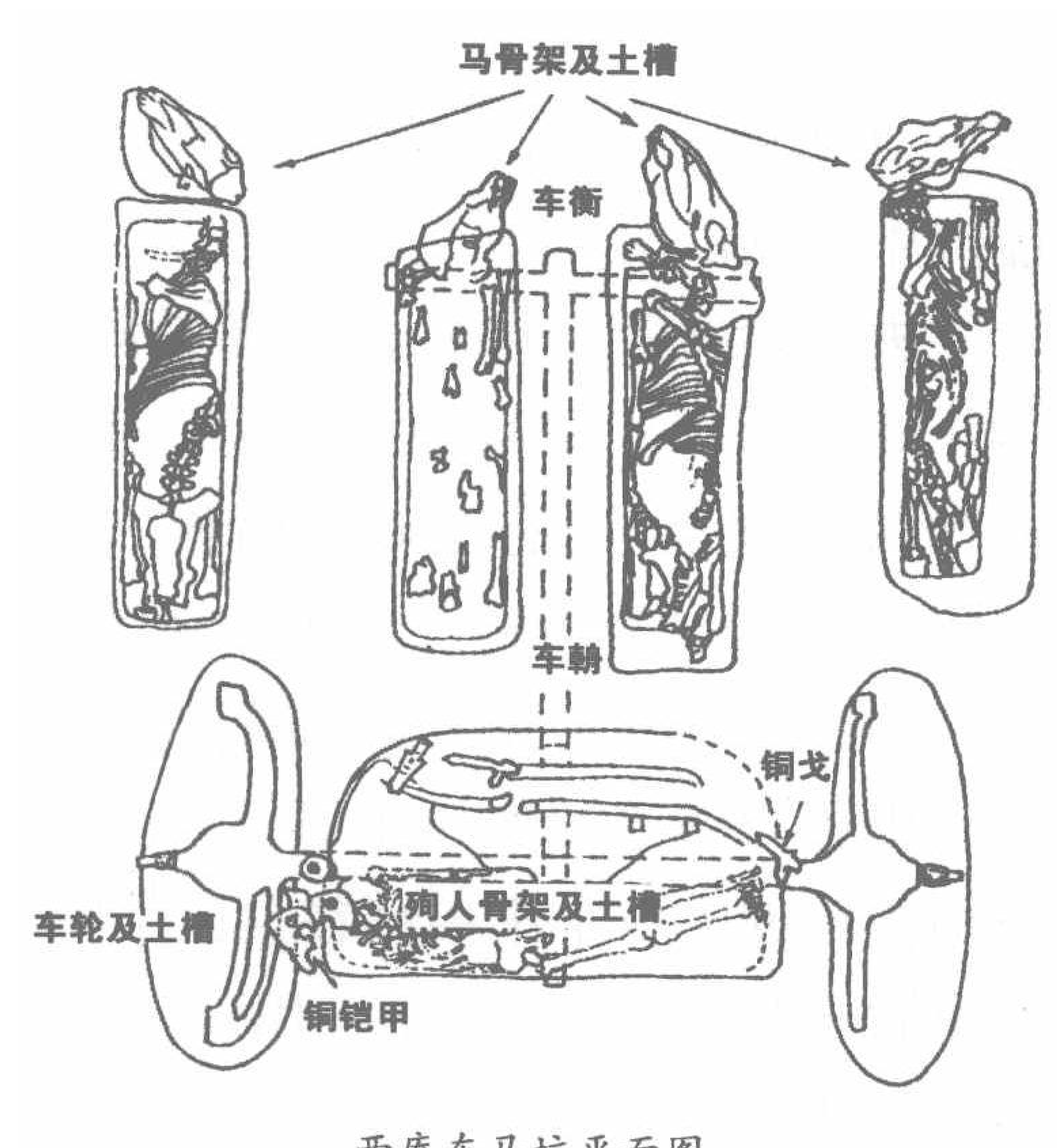
周代的军队与商代一样主要由车兵和徒兵组成。车兵是甲士，他们作战时乘车，称为“御”。徒兵就是跟在战车之后的步卒。一般说来，周代每辆战车除配备甲士外，还有御者一二人，各随步卒 10 人。“禹鼎”把周代军队的成分记载得很具体，说：“车百乘，斯御二百，徒千”。车上的甲士由贵族组成，而徒兵则由装备简陋的奴隶组成。


马辔复原图

有关周代战车的结构，我国古代文献《考工记》里曾有详细记载。但由于离我们时代较远，很难据此准确地将周代车子的形状复原出来。建国以来发现了许多保存较好的殷周直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车马坑，使我们对古代战车的构造和装备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1976 年，我国文物考古学者们在山东胶县西庵发现了一座西周车马坑。把周代战车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座车马坑内埋葬四匹战马和一部车子，此外还有车马器、武器和一名驭马的奴隶。马

在车子之前，四匹马分别埋在四个长方形土槽内，每侧二槽，二匹服马向内侧身，二匹骖（cān）马向外侧身，身上有人字纹席形痕迹，应是用席子覆盖的遗留；车轴长 304 厘米，两端装铜軎和铜辖；车舆为长方形，前后长 97 厘米，左右宽 164 厘米。前部有竖立木条组成的栏杆，车门应在车后部；车辀（zhōu，即车辕）放在车轴之上，辀长 284 厘米，直径 8 厘米，辀尾端装铜辀尾；车衡横于车辀前端，长 138 厘米，直径 7 厘米，车轭仅在南侧服马土槽内存一段残痕。此外，还发现很多车器，如铜軎、铜辖、铜轭箍、铜銮、铜軎尾等；马具主要以马辔饰为主。辔以皮条穿各种铜泡，结构大致与现代马辔相同。额部饰中型铜泡，两耳下与额部横条连接处为宽边中型铜泡，马面眉宇部分为大铜泡。鼻下部饰镞形铜泡，马唇两侧为二马镳（biāo，即马嚼子），其他都穿小铜泡。在车舆及其附近，还发现铜戈二件、铜钩戟一件、铜镞 20 件。还有胸甲、背甲各一套。胸甲由左、中、右三片组成，拼成半立面的兽面形。西庵发现的车马坑有一车 4 马，并配有弓箭、戈、戟等武器和甲胄，应是一辆西周贵族使用的战车。



西庵车马坑平面图

车兵是周代军队的主力。战斗时，交战双方的战车一字排开，互相对峙。然后双方战车在以横列互相接近的过程中，首先用弓、矢等“远程”武器互射；在两车交错时，双方用“长武器”戈、矛等互相砍、刺；在战马死伤或战车毁坏以后，车上的甲士才不得已用刀、剑等护身用的“短兵器”进行拼死搏斗……

周代的武器比商代有了很大的改进，戈一般比商代的胡加长了，既装柲牢固，还增加了杀伤力。又出现了合铸的“卜”字形戟（即钩戟），在浚县辛村、胶县西庵、北京琉璃河等遗址都有出土。战车结构的改进和武器的进步，使周代军队的战斗力有了加强。

（十）《吕刑》和“训匜”

相传，在夏代以前，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和阶级分化，就产生了原始的“五刑”。《尚书·尧典》说：“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流”即流放，“宥”为减刑，再加上官刑、教刑、赎刑就是所谓“五刑”。据说皋陶在舜时为士“以理民”，“皋陶作刑”，这部法典可能产生在夏以前。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我国古书《左传·昭公六年》记载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夏、商、周各代统治阶级把镇压奴隶和平民反抗的法律进一步完整和系统化了。

周王朝继承了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刑罚并加以发展，成为贵族阶级手里更为完整的镇压工具。灭商不久，周公就曾谆谆告诫康叔，要他把用刑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在著名的《康诰》里，周公要康叔“敬明乃罚”，小心用刑。并要他把那些敢于反抗周王朝统治、破坏奴隶制秩序的人，即“寇攘奸宄”的人杀掉。而对那些破坏奴隶制君臣、父子、兄弟关系的不孝不友和不慈不恭的人以及那些敢于收买人心、危害君长的人，也都要坚决杀掉。

成王时，周王朝国力空前强大，社会安定。但到了穆王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起来。穆王集夏、商、周三朝，特别是西周前期刑罚之大成，制定了《吕刑》，这就是《国语·周语》里所说的“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的措施，加强了对民众的恐怖统治。

《吕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这部法典十分繁琐，据说

墨刑有 1 000 条，劓刑有 1 000 条，剕刑有 500 条，宫刑有 300 条，大辟有 200 条。墨刑就是在人的额头上刺字；劓刑就是把人的鼻子割下来；剕刑就是刖刑，是把人的脚（或膝以下）砍掉。刖刑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常见，安阳殷墟、藁城台西也发现多具被施以刖刑的遗骨。在我国古代，被施行刖刑后的人常被当作守门的阍者使用。在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馆，就陈列着一件周代的“刖足守门人铜鬲”。铜鬲上被刖的看门人形象，正是这种酷刑的受害者；宫刑就是毁掉男子的生殖器，女性则幽闭深宫；大辟就是把人的头颅砍下。周代刑罚不仅有墨、劓、宫、剕、大辟等，还有“五罚”、“五过”等各种名目的刑罚。根据《尚书·吕刑》记载，犯罪的人可以缴纳罚金免刑，这就是“赎刑”。五刑从轻到重，需要分别缴纳百锾（huán。古代衡名，或谓为 6 两，或谓为 6 两大半两，或谓百锾为 3 斤）、200 锾、500 锾、600 锾、1 000 锾的不同数目罚金。对贵族来说，“赎刑”即通过缴纳一定数量的金（古代的金即铜）或丝，就随时可以逃脱在“法网”之外而不受惩处。

1975 年底，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窖藏，共埋藏西周青铜礼器 37 件。其中有一件铜器“训匜”，器身饰西周晚期偏早的窃曲纹，有盖。在“训匜”的盖与器上铸有相联的铭文，共 157 字，内容涉及到周代的刑罚，是研究周代刑制和我国法律史的十分重要的资料。“训匜”的铭文大意是说：

某年的三月底，周天子的重臣伯扬父处理了一个案子，经过是这样的：

一个名叫牧牛的小官违背了忠于上司的誓言，诬告了他的上司训。对此，伯扬父进行了严肃的判决，处理的结果是：一是责成牧牛必须履行前誓，并要他立即去啬地归还训 5 名奴隶；二是牧牛的诬告行为已构成犯罪，应予惩处。

伯扬父向牧牛宣布判决词说：

“查牧牛违誓诬主，按律应处以千鞭之笞，脸上刺字并蒙黑布羞辱之重刑。念其初犯，姑从轻惩处，可减刑为鞭打 1 000、黥面、

免职；但据我朝赎刑有关条款规定，可按罚金（铜）300 锾、鞭打 500 之最轻处罚条执行。此判决下达后，犯罪人应立誓不再上诉纠缠。如怙恶不悛，继续伤害训，告到本官，定严惩不贷！”

牧牛听罢判决，连忙发誓表示悔悟自新，今后决不上诉纠缠。当场签字画押，表示认罪。

训虽受诬陷之害，但案子查清，并得到金（铜）的赔偿损失费。他铸造了一件铜器留作纪念，并将此案经过也铭在了铜盉上。

这件铜器自铭为盉，实际上是匜，为西周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种常见水器。从铭文讲的王廷大臣伯扬父对牧牛和训之间的一场官司处理情况看，“训匜”铭文实际上是一篇周代中后期的判决词。我们从铭文中还可以看到，伯扬父对这场官司的判决，是依照一定的刑典处理的，处罚也是与牧牛的身份和地位的有关规定相适应的。而这场官司的判决词，也有一定的格式。此外，从诉讼程序方面来说，也是比较完备的。最后还有结案书，具备了相当完整的法律手续。

“训匜”虽然讲的是西周晚期偏早的事情，但与穆王时代相距不远，对我们研究西周前期的刑罚制度有重要参考价值；不仅如此，“训匜”里所记载的牧牛违誓，应鞭 1 000 并施墨刑，与《周礼·条狼氏》记载的制度大体相合，为我们证明了古文献《周礼》一书保存了不少古代的典章制度，是一部比较重要的先秦典籍。决不能因为这部成书在战国或有人怀疑它是汉代刘歆等人伪作篡改等等，就忽视了它在古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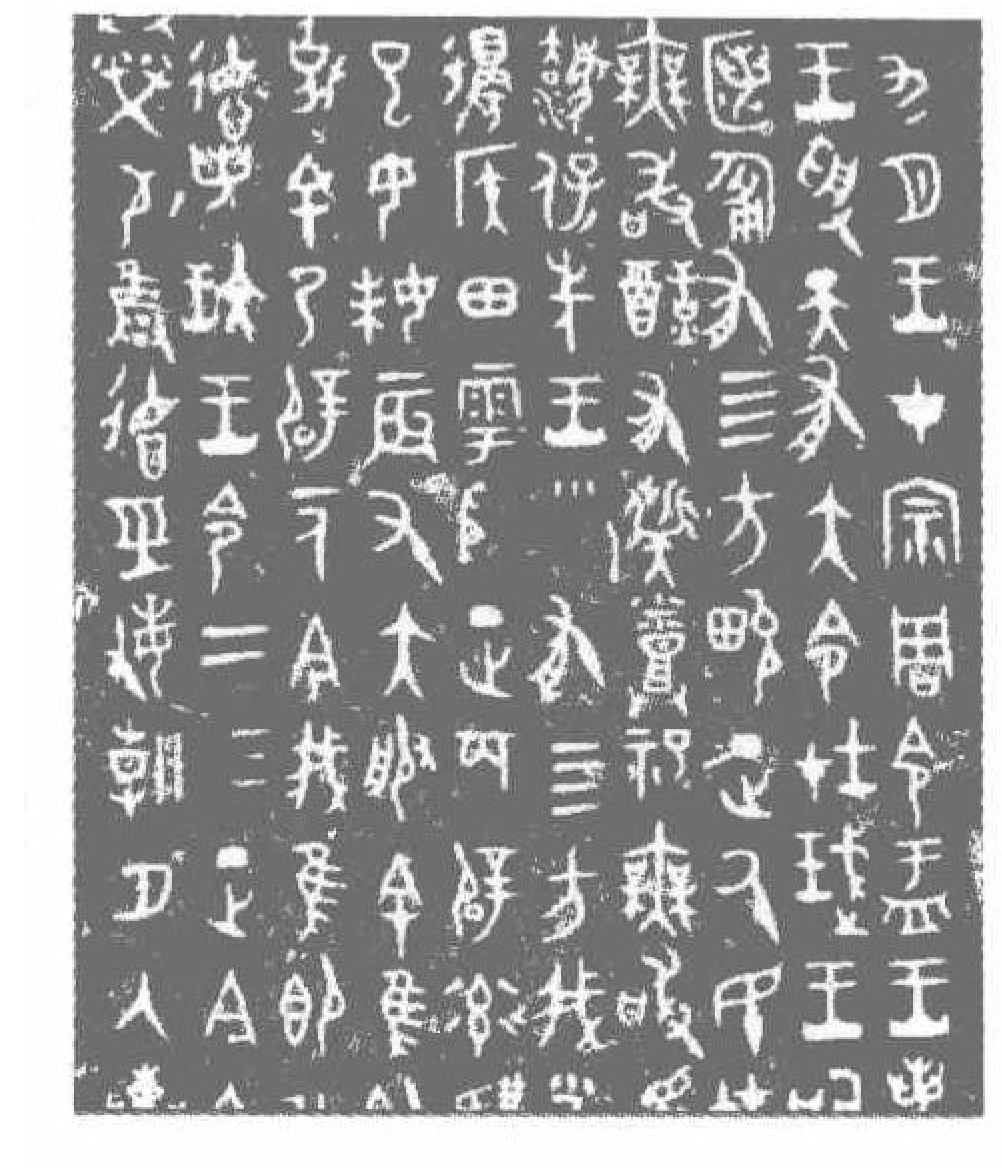
（十一）天命与敬德

周人和商人一样也很迷信，相信有一个全能的至上神“帝”或“上帝”主宰着天上和人间的一切。不过，周王朝比商王朝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创造出一个具有人格化的“天”来代替了“帝”的职能。

周王自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周武王把自己灭商说成是“惟恭行天之罚”，即执行老天爷意志。在一些记载周初历史的文献

里，也可以看出周人竭力把自己灭商的行为加以神化。《尚书·大诰》说："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地处西方的小国所以迅速兴起，被说成是上天保佑文王的结果。而《康诰》的"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与）厥邦厥民"，就是说老天爷授命文王灭掉了商朝，周人才得以占有了商王朝的土地和人民。《酒诰》里"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说的是老天爷降给我们取代殷朝统治的使命，才得以建立周王朝。至于殷朝灭亡，是因为老天爷"讨厌"了他们。如此等等。曾一度作为商王朝属国的"小邦周"，用执行上天的意志为自己伐商寻找理论根据，这在铜器铭文上也有不少记载。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说："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畯正厥民……"，是说文王接受了老天爷让他建立周王朝的使命，武王又继承了文王的事业，终于灭掉了商王朝，安定了四方，建立了周王朝。

周统给阶级大力提倡"天命"思想，是为了达到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但是，鉴于夏、商灭亡的教训，周人也看到了殷人虽然对上帝、鬼神和祖先十分虔诚，但也无济于事，还是在周人的打击之下遭到了灭亡。因此他们对"天命"、"天威"也产生了某些怀疑。《尚书·大诰》中有"天棐（非）忱"，就是说老天爷也不一定可信。《康诰》里的"天畏（威）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惟命不于常"，是说老天爷的威风也不可靠，民情倒是可以观察到的，而那些小人是不好治理的……所谓老天爷授命的君王，也不一定能永远保持住君位。《君奭》的"天不可信"，则明白地表示了对老天爷的不相信。这一切，说明周人对天的怀疑产生了，比商王朝对上帝的毫无怀疑前进了一大步。


大盂鼎铭文

看起来周统治阶级一面在大力宣扬"天"和"天命"，一面又表示了对天的怀疑，表面上似乎是很矛盾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发

现，周统治阶级极端推崇“天”和“天命”的话，一般都是对殷人和殷王朝旧时的属国说的。而所有对天怀疑的话，却是在另一种场合，即对周人自己说的。这说明，周人虽然继承了殷人对天的信仰，但开始认识到光靠“天”和“天命”是难于巩固自己统治的，因此又提出了“敬德”思想作为补充。

商代的甲骨文里，“德”字还没有出现。在周代的金文和一些周初文献中却出现了“德”字，说明“德”是周人所特有的思想。《尚书·君奭》“天不可信，我道惟文王德延”，是说老天爷并不可信，我们只有遵从文王的德性才能延长统治。《康诰》里“文王克明德慎罚……用肇造我区夏”，是说文王能够光大德性和谨慎刑罚……所以才有今天辽阔的国土。《召诰》也提到了“敬德”；在铜器铭文中，“大盂鼎”里谈到了“正（政）德”，“班簋”里提到了“敬德”。“德”字在金文里的写法是从直从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而“敬”字，当作小心谨慎和警惕讲。“敬德”就是要经常努力端正自己的心思，这既包括要统治阶级专心治理国家，不使发生丧乱；还包括因“敬德”，用“敬德”补充“天命”，而使乱子无隙可乘，从而可以永远保住“天命”。即统治阶级在主观上加强自身的修养，以维持“永受天命”，延续自己统治的目的。因此，“敬德”与“天命”相互表里，对周王朝统治的巩固和加强起了不小的作用。

四、西周的遗迹和青铜器

建国以来，周代考古的重要收获就是对丰、镐二京位置的确定和发掘。此外，还对著名的东都洛邑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工作，特别是周初铸铜等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周初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周人灭商以前的都城岐邑，也在陕西岐山、扶风一带被发掘出来。这里不仅发现了周初的宫殿遗址，而且还发现了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周代甲骨文。

一些周初方国的遗迹、遗物也被发掘出来。除了解放前发掘的浚县辛村卫国墓地以外，还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发现了燕国墓地，在山东曲阜勘查和发掘了鲁国故城，在江苏丹徒发现了古宜国墓地，在陕西宝鸡地区发掘了古夨国和強国的遗迹……这些方国遗迹和铜器的发现，为研究西周初年的分封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不仅如此，建国以来还发现了大量的周代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精美，花纹富丽多变，是研究西周艺术和铸造业所达到的水平的绝好材料。特别重要的是，不少铜器上铸有长篇铭文，是我们研究西周历史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一）丰、镐二京位置的确定和重要发现

根据古书的记载，周文王晚年在灭掉崇侯虎以后，曾“作丰邑”，把都城从岐邑迁到丰。武王时又进一步营建镐京，此地直到平王东迁以前，都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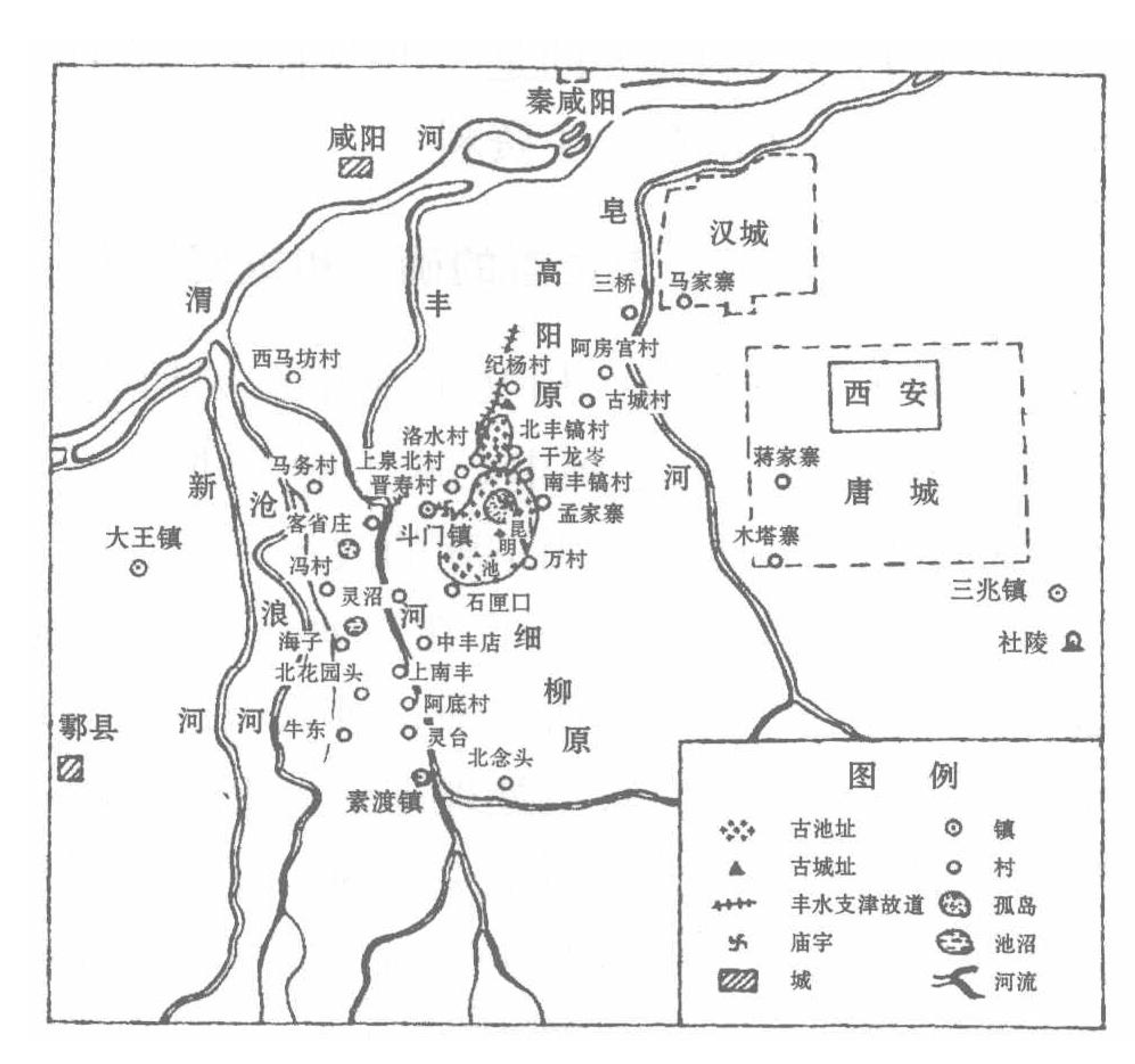
丰邑在沣水以西，镐京在沣水以东，二城隔河相望，相距不远。丰京是周王朝宗庙所在地，所以周迁都镐京以后，周天子还经常在丰邑的宗庙和宫殿里处理国家大事，兴建东都洛邑这一重大决策就是成王在丰邑的宗庙里决定的。周代铜器铭文里也经常出现周天子在“莽京”赏赐功臣的记载。“莽京”就是丰京，和镐京一样在整个西周王朝都是西部的政治中心，因此历史上一般都将丰、镐二京并称。

平王东迁，西周灭亡，丰、镐二京失去了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地位。由于戎人的烧杀抢掠，丰、镐二京的宗庙、宫室大部分毁于战火。到了秦朝的时候，曾在这一带大兴土木，兴建了宫殿、苑囿，使遗址遭到进一步的破坏。此后又经过100多年的沧桑变化，到汉代这两座古城早已湮没地下，人们只能从文献记载或传说中知道丰、镐二京的相对位置，而确切位置和范围早已无人知晓了。

解放后，经过大规模发掘和研究，现已得到解决。原来，丰京在沣水西岸，就是今天的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马王村、西王村、张

家坡一带。这一带是一个面积大，包含遗迹、遗物非常丰富的周代遗址，总面积达6平方公里。在这片面积广大的遗址里，发现了许多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制骨、制陶、制瓦等手工工具和作坊遗址。此外，还发现了不少贵族的墓葬，其中有的殉有奴隶。在张家坡一带，还发现了10多座为贵族殉葬用的车马坑。1961年，又在马王村西发现了一个堆满青铜器的窖藏，出土了53件青铜器。从这一带出土遗物年代看来，也与丰邑的存在年代是一致的。

镐京在现在的沣水东岸洛上村、上泉北村、普渡村、花园村和斗门镇一带。这一带也是一处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的西周遗址。遗址面积约4平方公里。在这里，也发现了许多石制、骨制的生产工具和用具，还发现了西周的陶窑、瓦和房子的遗迹。瓦与涂有白灰面的草泥土共存，应该是属于当年镐京雄伟宫殿和宗庙建筑的遗留。



丰镐地区位置图

因此，西周都城丰、镐二京位置的确定和发掘，对研究西周历史和考古学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二）洛阳与东都洛邑

河南西部的洛阳市，地处“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洛阳名园记》）的伊

洛平原上。洛阳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再加上伊水、洛水、涧水、瀍水浇灌着这一片丰饶的土地，物产丰富、气候温和等优越条件，自古以来就是历代统治者建都的好地方。从周平王东迁，东周王朝正式定都洛阳王城以来，这里就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九个朝代以这里为都城，所以洛阳又以“九朝故都”闻名于世。

我们的考古学者，经过二三十年对成周洛邑位置的探索，并对洛阳出土的西周遗物、遗迹进行分析，逐渐把目光集中在瀍河之滨。

（三）浚县辛村的卫国墓地

周武王之弟康叔姬封，在成王、周公平定武庚与“三监”叛乱之后，被封于黄河、淇水之间的殷墟故地——卫，历史上称他为卫康叔。

到了西周末年，卫武公即位。他继续实行康叔治卫时的政策，统治比较稳定。犬戎入侵宗周，周幽王被戎人杀死。卫武公就在这时候应周平王的请求，前往宗周打退了戎人，并与秦襄公等人一起护送平王东迁洛邑，这就是东周王朝的开始。卫武公护驾有功，被周平王封为“公”。卫国的统治在历史上延续的时间很长，从西周初期起，经历了春秋时期，直到战国时代才被秦国吞并。

现在的河南省北部和河北省南部一带，就是历史上卫国的统治地区。这一片广大地区内，发现的特别重要的遗址，就是 1932 年至 1934 年的淇水北岸浚县辛村发现的卫侯墓地。

辛村墓地离朝歌不过 20 多公里，是历史上卫国旧地，而且墓中出的“卫自（师）易”盾锡，也清楚地说明了这批墓葬应是卫人墓地。这座墓地的 8 座大墓，从墓葬的规模宏伟、墓道长大、随葬物丰富和附葬的车马坑等现象判断，墓主应为卫国的贵族。在第二号墓中又有“侯”字铭文的戟出土，8 号墓中有“白（伯）矢”戟出土，42 号墓有“成周”铭文戈出土，60 号侍从墓出土的尊上

铭文又说他曾随从卫公到过宗周等等，都说明了这里的大墓应就是卫国贵族统治阶级——卫侯的墓葬地。

辛村的卫国贵族墓地延续的时间很长，大体从穆王前后，最晚可到幽王、平王时期。因此，浚县辛村卫侯墓地和大量遗物的发现，不仅为我们研究卫国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对我们研究整个西周一代的历史也是很有意义的。

（四）燕国铜器和燕都北京

召公奭被封于燕。燕地远离西周本土，不仅居住着许多力量强大的少数民族，而且商王朝的旧势力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逸周书·作雒》记载周公东征时，“王子禄父（纣王之子武庚）北奔”，妄想在这一地区纠合反周力量，继续与周王朝对抗。燕召公被封在这样遥远的地区，可见他是很得周武王信任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王室贵族。

1949 年以后，燕国的铜器在北京和辽宁一带不断发现。1955 年，辽宁马厂沟发现了一批铜器，主要有鼎、甗、簋、盂（yú）、卣、壶、罍、鸭形尊、盘等。特别重要的是一件燕侯盂，上有铭文“匽（燕）侯作餴盂”字样。腹部饰有回首龙纹，并有下垂的角，角端作虺首形，时代约相当于康王前后。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与西周其他地区基本相同，说明了燕国铜器与周初各地的铜器有着共同的特点。

在北京附近，除了 1897 年据传在卢沟桥一带出土一件带有“匽侯”铭文的“亚盉”以外，近年又不断有成批燕国铜器出土。自 1973 年以来，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发现一处面积很大的周初遗址，发掘出一批西周贵族墓葬和车马坑。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 6 座墓葬，共用 8 个奴隶殉葬，其中除一个是 17 岁左右的女性青年外，其余都是尚未成年的少年。与此同时，还发现了几座车马坑。其中一号车马坑保存十分完好，坑内埋一车 4 马。马是将腿捆绑后埋入坑内的，4 匹马都有当卢等铜辔饰和铜銮。两匹服马额头又各有一

个特大的圆形铜泡，这是与两匹骖马的不同之处。最近琉璃河又有重大发现，在一个大坑里，埋有车子多辆和马匹若干，这对研究周代的车制很有意义。

在琉璃河的墓葬里，还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其中的“复尊”、“伯矩鬲”、“堇鼎”等都有“匽（燕）侯”字样的铭文。“复尊”上的铭文说：“匽侯赏复冂衣、臣妾、贝，用作父乙宝尊彝”，是说有一次燕侯赏赐给名叫复的贵族衣物、奴隶和贝币，复作了这件铜器作为纪念。另一件“堇鼎”上的铭文说：匽侯命堇馔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作大子癸宝尊鬻，记载了燕侯命臣下堇去镐京拜谒召公，召公赏赐了堇，作了这件铜器留作纪念。燕国铜器的不断出土，说明这里应是燕国贵族的墓地。此外，就在这片墓地西北的董家林村，发现了周初的城墙遗迹。董家林古城址因为受到大石河多年的冲刷，城墙的南北长度现已不可得知，但东西城墙相距约 850 米，东、西、北三面都有护城河。城墙的结构是主城墙、内附墙和外平台。虽然城墙内外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发掘，但部分试掘情况表明，北城墙东端和东城墙北端的两处夯土，被西周墓葬打破。有一座墓中出土两件陶簋和一件铜镞，为商末周初物。根据种种迹象判断，很可能燕国的都城就在这里。

由于古文献里有关周初燕国的史料记载很少，这就给我们了解燕国早期历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辽宁、北京等地青铜器的不断出土，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燕国的历史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线索。在古书里关于燕国都城的所在地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是在现北京一带，一种认为是在今天的河北蓟县，一种认为是在今天河北涞水境内。但琉璃河燕国墓地、城墙和青铜器的出土，使这个多年来聚讼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周初燕国的都城在现今北京附近的可能性要比另外二种说法可靠得多。

召公受封以后，他的长子赴燕就封，而他自己仍留在武王身边。周公为师，召公为保。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召公奭一直活到康王二十四年才死去。召公的儿子为第一代燕侯。据历史学家

研究，他就是传世铜器“燕侯旨鼎”上所说的燕侯旨，在位时间较长，直到昭王时代还活着。北京、辽宁等地出土的“复尊”、“复鼎”、“攸簋”、“亚盉”、“燕侯盂”铭文上的“匽侯”，就是指的第一代燕侯名旨者。大贵族复的两件铜器出土于琉璃河，“亚盉”出土于卢沟桥，可见第一代燕侯就已在北京附近活动。再结合琉璃河大批贵族墓葬和离此不远的西周城址考察，说明这里应是西周初年周人活动的重要据点，可能燕国都城就在这一带，为燕国封于现北京附近的说法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

周初分封诸侯时，“授民授疆土”，不少周天子的亲戚都得到了大片土地和奴隶的赏赐。虽然文献里没有燕侯得到殷王朝遗民赏赐的记载，但从琉璃河分布在铁路以西的殉人墓与铁路以东的墓葬有所不同可以看出，燕侯也应得到了不少殷民作为种族奴隶的赏赐。

琉璃河52号殉葬墓所出“复尊”铭文末尾有“㠱”字，54号殉葬墓所出“复鼎”铭文末尾有“亚矣”等，这些都是我们常见于殷代晚期铜器中的殷人族徽。因此，这些奴隶殉葬墓的墓主应为殷人。很可能这些人是周初分封给燕侯的殷遗民的首领，虽然他们对燕侯来讲，身份应是奴隶，但他们作为种族奴隶的首领来说，实际上的地位应是奴隶主。因此他们死后，还保留着殷朝用人殉葬的习俗，有的还用车马殉葬。琉璃河发现墓葬中的6座殉葬墓，是目前发掘西周初期墓葬中殉人较多的一批，为我们研究西周初期奴隶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因此，近年来燕国铜器的不断出土和琉璃河遗址的发掘，为我们确定燕国都城就在北京附近提供了证据。而燕国铜器不断在辽宁等地发现，也为周初燕国开发我国北部广大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五）曲阜鲁国故城

坐落在山东南部泗河和小沂河之间的曲阜县城，以春秋时代诞

生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闻名中外。

曲阜一带很早就是一些古代东方民族活动的中心，相传6000多年前的东夷族少昊就曾居住于此。商朝中期稍晚的南庚、阳甲曾迁于此地，商人西迁后，这一带商末成为东夷族奄国所有。武王灭商以后，成为周公的封地——鲁国。周公需要留在朝廷辅佐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史记·鲁周公世家》）。鲁伯禽在这里修建了宫殿、宗庙和城郭，这就是曲阜城的由来。

鲁公伯禽所建的曲阜城，一直延续使用到春秋、战国时期。为与后世的汉城相区别，我们称之为“鲁国故城”。而“曲阜”这个地名，《史记·周本纪》引应劭说，因“鲁城中有阜，逶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周时兴建的鲁城规模很大，城内围进了一座曲曲折折长达七八里的土山。“阜”就是土山，因此这座城被命名曲阜。

自1971年至1978年，考古学者为恢复鲁城的面貌在曲阜进行了大量的勘查与试掘工作，为探索曲阜鲁国故城的始建年代、形制和基本布局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曲阜鲁城的平面呈不规则的横长方形，面积达10平方公里左右。四面修有城垣。经探查，城垣总长11 771米，现探出城门11座。城周围有护城壕，西面和北面以古洙水为城壕。城墙夯土内的遗物表明，此城自西周经历东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都在使用。后期只是在前期的基础上有所增高加宽，而城墙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变化。

在鲁城的城垣之内，建有规模宏大的宗庙、宫殿，周围并有宫墙围绕。有宫墙与城垣之间的广大地区，在东、北、西各处分布冶铜、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和居住遗址、墓葬区等等。此外，十多条平道把城内各居民区连接起来并通向城外，交通也很是方便。这就是考古学者经过七八个春华秋实，用手中的探铲和锄头，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为我们描绘出来的西周鲁国故城。

（六）“宜侯夨簋”和周初的吴国

1954年6月的某一天，骄阳似火。江苏省丹徒县下聂村烟墩山南麓的一块土地上，有一个青年农民在离地表深约一尺的地方，掘出了一个长满青绿色铜锈的碗状铜容器。这个青年觉得很奇怪，就又一面向四周扩大挖掘范围，一面又向更深地方掘下去。在2尺深左右的地方，他挖出了12件长满铜锈的古物。这个青年小心地收拾好这些东西，和他父亲一起把这批“古物”交给了当地政府。


宜侯夨簋

经考古学家鉴定，这批“古物”里有一件鼎、一件鬲、二件簋（一件是有铭文的“宜侯夨簋”）、一件大盘、一件小盘、一对盉、一对牺觥、一对角状器。这是一批西周前期的珍贵文物。特别是其中的“宜侯夨簋”，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

“宜侯夨簋”四耳，腹外装饰有兽面大漩涡纹。簋的腹内底上有铭文12行，约120多个字，有10多个字残损得很是严重，识读十分困难。铭文是这样的：

佳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
成王伐商图，出省东国图。
王卜于宜入土，南〔向〕。王令
虞侯夨曰：“□侯于宜”。易邑
鬯一卣，商鬲一□，彤弓一，彤矢百，
旅弓一，旅矢千。易土：厥川
三百□，〔厥〕□百又□，厥宅邑卅
又五，〔厥〕□百又四十。易在宜
王人〔十〕又七姓。易奠七伯，

氏卢〔千〕又五十夫。易宜庶人
六百又☐六夫。宜侯饵扬
王休，作虞公文丁尊彝

铭文中的“图”字即图画的图，图画的画面为历史故事，画在宗庙的墙壁上。“鬯”是香酒。“鬲”可假借为圭瓒之瓒字。“旅”假借为黸，即黑颜色。“王人”即原居宜地的殷朝贵族。用今天的话把整段铭文翻译出来，就是说：在某年四月丁未日这一天，周康王看了描绘有武王、成王伐商和巡省东国事迹的图画以后，卜问于南方的宜地。正是在会合南方诸国的时候，改封虞侯夨于宜地（现江苏丹徒附近）为侯。周天子还赏赐给夨香酒和从商代传下来的玉瓒以及红色和黑色的弓、矢（表示夨可以代周天子专行征伐），赐礼很是隆重。此外，康王又赏给夨山下肥沃的土地300〔田〕……居住的地方35个邑，140〔井〕；康王还赏赐给夨大批奴隶，主要有：居住在宜地的殷王朝之人17姓、郑地的“七伯”以及由他们所率领的旅寄在宜地的农业劳动者1 050多人、宜地原有的农业劳动者600多人。宜侯夨受到周康王的各种赏赐后，非常感激，把这件大事记载在为纪念他父亲虞公父丁而作的铜器上。

我们从“宜侯夨簋”的铭文上可以发现，夨在受封为宜侯之前，曾是虞侯。“虞”字与“吴”字同音相假，学者们认为簋铭所见的虞侯夨，就是吴侯夨。《史记·吴世家》记载“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仲雍在我国古代文献里又称虞仲、虞公，“宜侯夨簋”的虞侯，应就是仲雍的后人。他的父辈继仲雍为虞公，他本人称虞侯。周康王时之所以改封他为宜侯，是为了与北方的另一个姬姓虞国相区别。

原来，周初在“周之北故夏墟”也封了一个虞国。这个虞国是周章弟弟中的封地，他属于畿内诸侯。根据周制，畿内受封的诸侯只能称“公”，所以这个虞仲的后世也只能称“虞公”。《春秋·僖公五年》说“晋人执虞公”，说明直到春秋时期还是这样。而四方

的诸侯就与此不同，例如周公的儿子伯禽是鲁公，但他的子孙就可以称为鲁侯。据学者们考证，“夨”与周章古音很相近，虞侯夨就应是虞侯周章。周章是在武王、成王时被封为虞侯的，为了不与北方的虞相混，30多年后的康王时期改封为宜侯。他的年龄与鲁公伯禽相当，是仲雍的曾孙，而伯禽是王季的曾孙，他们之间正是堂兄弟的关系。

“宜侯夨簋”的发现有重大学术意义。首先，消除了人们对吴国不是周王朝同姓的怀疑。而且在长江以南的丹徒发现了周初吴国铜器，也说明周人势力早已到达了长江以南。周初的分封活动，经过武王、成王，直到康王时还在进行着。

其次，“宜侯夨簋”为研究周代社会性质提供了珍贵史料。古代的吴国常被说成是“断发文身”，文化经济十分落后的“蛮夷之地”。但铭文中记载的周天子把大量土地和人民赏赐给宜侯，与“大盂鼎”有关“授民授疆土”的记载是十分相近的。说明东南方远离西周本土的吴国，在周初奴隶制经济就有了较大发展。

第三，“宜侯夨簋”铭文中“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四十”这段话非常重要。虽然“百又四十”前面字已残，但有的学者根据古书“四邑为井”的记载推断所残的字应为“井”。“宅邑卅又五”的4倍，正好是140井，这为研究周初井田制提供了重要佐证。

因此，“宜侯夨簋”的发现不仅给我们研究周初吴国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且还给我们研究周初奴隶制的发展和“井田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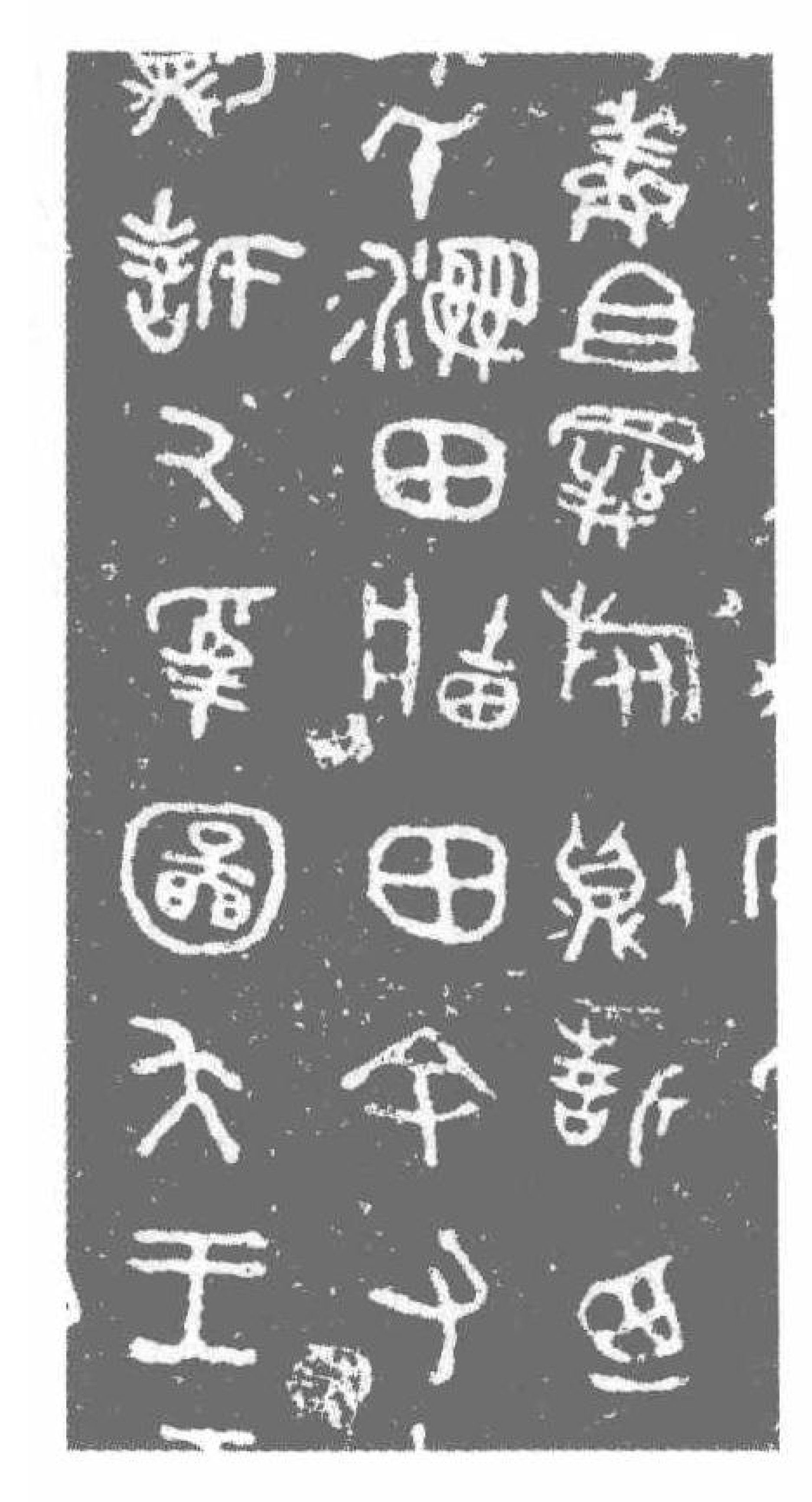
（七）两个从地下挖出来的古国

——夨国与强国

在周族发祥地岐邑以西，即现在的宝鸡市境内渭水的两岸，生活着两个古老的国家。一个是建立在渭水以北的千河流域的夨国，自殷商末期立国以来，一直与西周王朝相始终。另一个是建立在渭

水以南的清姜河流域的弶国，历史虽与夨国一样古老，但到西周中期先于夨国灭亡。有关这两个古国的史迹在文献中早已失载，似乎成了已从“历史”上消失了的国家。

清朝乾隆年间，陕西凤翔出土了著名的西周晚期铜器夨人盘（即今通称的“散氏盘”）以后，人们才知道西周时还有个夨国。



散氏盘铭文

考古学者根据陕西宝鸡市的斗鸡台墓葬出土的陶器形制演变的分析，将夨国贵族墓地分为不同的几个时期。第一期时代相当武王克商以前，即太王、王季、文王时期。第二期相当于西周早期，第三期相当西周中期，第四期相当西周晚期。历年各地所出大量夨国青铜器，时代基本与斗鸡台墓地所经历的时间相同。而早已不为世人所知的夨国史迹，就跃然于这些青铜器的铭文之上。

基本以渭水与夨国为界的南邻是弶国。弶国也不见经传记载，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1974 年以来，考古学者在宝鸡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地，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发掘工作，经过分析和研究，才认识了渭水以南、秦岭以北的清姜、益门一带发现的相当于西周时期的遗迹、遗物，原来是古弶国的文化。

通过对弶国墓地出土铜器和陶器的研究，可以看到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弶国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如马鞍形口双耳罐，与甘、青一带的寺洼文化相近。也有的遗物带有早期蜀文化特点，如柳叶形青铜短剑与巴蜀式剑几乎完全相同。这说明了弶国与氐羌和蜀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可能是原居于甘南的氐羌族北上建立起来的。弶国与北部隔渭水相望的夨国关系也很密切，周初弶国势力可能发展到渭水以北。纸坊头弶伯墓地“夨伯鬲”与“弶伯簋”同出，说明两国曾交好或互相联姻。但随夨国势力的增强，弶国势力被赶回渭河以南。到了西周中期，弶国国势

渐衰，终于在穆王以后再也不见踪迹了。

考古学者通过对夨国和強国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为我们恢复了夨、強两国国君的世系和宗法制度。

就是这样，两个早已从地面上消失，而且连文献中也找不到记载的夨国与強国，3000多年以后，如此这般地被考古学者从地下挖出来了。作为两个古老的少数民族，他们曾参加创造灿烂的华夏文明的“当然”资格被恢复了。

第三章　西周的灭亡和东周的建立

自穆王以后，经过恭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中间经过“共和”行政直到宣王、幽王，是西周王朝的中、晚期阶段。在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奴隶制的母体内部逐渐产生了新的封建主义因素，西周王朝逐渐由它前期的奴隶制鼎盛时期向下坡路走去。

经济基础发生的深刻变化，必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这就是在西周中期以后，周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愈来愈暴露出来。特别是奴隶主贵族与奴隶、平民的矛盾，周王朝与国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在国人和奴隶暴动的打击下，赶跑了暴虐、“专利”的周厉王，沉重地打击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基础。虽然经过了“宣王中兴”，一度曾使周王朝对猃狁等少数民族的控制有所加强。但并不能挽救西周王朝的腐朽统治，在戎人的打击下，周幽王被杀，繁华的丰、镐二京成了一片废墟。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晋、郑、秦等国诸侯的帮助下，东迁洛邑，建立了东周王朝。自此，具有250多年历史的西周王朝灭亡了。

西周中、晚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发生的变化，也在历年出土的大量西周青铜器上有所反映。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与贵族追求享乐的欲望相适应，出现了商品化的倾向。铜器的铸造技术、造型、花纹等方面都较西周早期大为草率，形成了“开放期”的作风。虽然如此，大量铜器上的长篇铭文，为我们研究西周中、晚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珍贵史料。

一、从厉王流彘到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一）恭王、懿王、孝王、夷王时期的周王朝与“虢季子白盘”

穆王西游南征，在位55年死去以后，他的儿子繄（yī）扈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周恭王。

恭王以后，他的儿子莑（jiān）继位为懿王。懿王时，周王朝国力比以前更加衰弱。懿王死，他的叔父辟方自立为天子，这就是周孝王。

孝王时，为了对外战争的需要，对养马业十分重视。据说秦国的祖先非子特别善于养马，被人举荐给周孝王。周孝王把非子请来，让他在汧水和渭水之间的平原上主管养马之类的事宜。由于他对马匹调教有方，马群繁殖很快。周孝王对非子十分赏识，把秦（现甘肃一带）地封给了他，并让他继承了舜时赐给他的祖先伯翳（yì）的嬴姓，号称秦嬴。非子成为秦的始祖，为周王朝争取西戎各部落做了很多的工作。

孝王死后，各国诸侯又拥立懿王的儿子燮为天子，这就是周夷王。此时的周王朝已是强弩之末，在王朝内外一片告急声中疲于奔命了。

古文献里有关恭王、懿王、孝王、夷王时期的历史记载较少，但铜器铭文为我们保存了不少史料。有一件著名的铜器“虢季子白盘”，把夷王命令虢公统帅六师征伐太原之戎的战事记录得很为详细。

“虢季子白盘”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是一件夷王时期制作的盛水用器。盘身长达130.2厘米，显得十分庞大、厚重。盘壁布满了西周晚期的典型花纹——波浪纹。盘的内底铸有长篇铭文。铭文内容是这样的：

佳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趄趄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于白义，王格周庙宣廟爰飨。王曰：“伯父，孔覭有光。王赐乘马，是用佐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虢季子白盘

这篇铭文的意思是说：“夷王十二年正月初吉（即相当月初的第一个星期）丁亥那一天，虢季子白作了这件铜盘。声名显赫的虢季子白，大显武功于伐戎之役，是周王朝安定天下四方的重臣。他曾在洛水北岸把戎人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一战共斩杀了猃狁500颗人头，还抓到了50名俘虏。虽然虢季子白在这场战争中大获全胜，但他只不过是征伐猃狁的先行官，随他之后还有大军前往讨伐。在战争结束后，英武的虢季子白在献俘典礼上，用斩获敌人的左耳计数向周王献功请赏。周天子对虢季子白大加赞赏，并赐宴犒赏。席间，周天子对虢季子白说：‘伯父，您英姿勃发，光彩照人，使戎人闻风丧胆。现在我赐给您一匹好马，希望您骑上它在疆场上驰骋，保卫周王朝。再赐给您宝弓、红色的箭头和一把大钺，您有了这些王朝专行征伐之权的仪仗物，


虢季子白盘铭文

就可以随时调兵遣将征讨那些敢于叛乱的蛮方了！’虢季子白为了纪念周天子的赏赐，就作了这件宝盘，并把事情的经过铸在盘上，以让后世子孙永远不忘。”

据学者们研究，“虢季子白盘”铭文中的虢季子白，就是夷王时率六师伐太原之戎的虢公。虢公作盘是在夷王十二年正月，伐戎的战争应当进行在夷王十一年的夏、秋之间。在这次战争中，虢公战绩辉煌。但“虢季子白盘”记载虢公在此次战役中，只不过是个“先行”，其后还应有大军相随，可见战争的规模不小。这些文字是当时遗留下来的珍贵史料，对我们研究夷王时期周王朝与戎人的关系有很高参考价值。

西周中期自恭王以后直到夷王时，由于四周围戎狄和淮夷等少数民族的交相侵扰，周王朝陷入了与这些少数民族的长期战争中。连年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使周王朝元气大伤。为了维持生存，周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从而使国内的各种矛盾也进一步激化起来。

（二）召公谏“弥谤”

夷王死后，他的儿子胡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虐君主之一——周厉王。

周厉王不仅生活腐化，终日沉湎于酒色，而且生性贪婪，成天盘算着如何聚敛更多的财富以供挥霍。有一个名叫荣夷公的大臣，特别有横征暴敛的本事，得到了厉王的赏识。

早在恭王时代起，贵族的“私田”就愈来愈多，土地国有被打开了缺口，不少的山林薮泽，早已事实上成为贵族的私有财产。还有一些平民也常到河流湖泊里去打鱼捉蟹，或到山林里去砍树采果，从而使他们的收入有些增加。顽固地维护土地国有的荣夷公看到这些非常眼红，便建议周厉王禁止民众到山林河湖里去另谋生路，并重申山林河湖里的各种产品都归国王所有，为周王所“专利”。

周厉王限制民众到山林湖泽里去另辟财源，公开与民争利的措

施，引起了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些王朝大臣也对这一作法表示反对。一个名叫芮良夫的大夫，知道这是荣夷公为了迎合厉王，在背后捣的鬼，意识到这对周王朝的统治是很不利的。因此他不顾个人安危，劝谏厉王远离奸佞小人荣夷公，废除有关“专利”的各项规定。

芮良夫恳切地说：“荣夷公这样的人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小利，而不知道这点点小利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恶果。大王您如继续听他的话，国家可就要危险了！”

又说：“好利，这是人的天性。财利是百物所生，百物是大自然所赐予的。自然界生成的各种东西，人人都可以利用，怎么能只许天子您独自受用呢？您的这种做法，将会激怒天下的老百姓！荣夷公只教您看到眼前的小利，而不考虑将来会引起什么样的危险后果。这样下去，您的统治能长久么？”

厉王对他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毫不在意，但芮良夫还是十分耐心地往下说：“俗话说得好，要想很好地君临万民，就要给老百姓广开财路，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戴。您应该成天总是想着要使全国上上下下均平饱暖，唯恐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招来老百姓的怨恨才是！我们的祖先文王立下了要多施利布泽于老百姓的规矩，所以周朝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才能一直延续到今天。可是您现在把祖宗留下的成法忘得一干二净，反而去学什么‘专利’，这样做是不行的！”

芮良夫说得口干舌燥，周厉王还是无动于衷。可芮良夫并没有灰心，还是继续说下去。不过，这回话说得更重了：“要是老百姓净想专利发财的话，别人还会说他是个无厌的贪贼呢！而是您身为国王，也实行自己发大财的‘专利’做法，那普天之下就会没有人归附您了！如果您不赶快罢免臭名昭著的荣夷公，周王朝的江山就会危在旦夕了！”

周厉王对芮良夫这一番披肝沥胆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不仅没有疏远荣夷公，反而提拔他当了周王朝的卿士。

本来，西周的初期地广人稀，贵族们所重视的是可耕种的土

地。而山林川泽之类不可耕的地方，虽然名义上也归国王所有，但实际上管理不严，民众可以随便使用，“以时入而无禁”。但厉王“专利”以后，老百姓失去了这个重要的谋生之路，真是搞得民怨沸腾，谤言四起。

古代的所谓“谤”，是批评、议论的意思。周王朝举国上下对厉王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纷纷“谤王”。大臣召公听到老百姓在街头巷尾对厉王的各种议论，赶快跑到王宫向厉王报告。厉王听了报告以后，真是火冒三丈。他马上找了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监视敢于批评厉王、发表“谤言”的老百姓。并且下命令说：“如果你发现有谁敢议论朝政，就报告给我，我一定把他杀掉！”

在厉王的严厉镇压下，老百姓不敢公开地批评厉王了，只好在路上碰见熟人时，互相使使眼色，表示对厉王的不满，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道路以目”。

厉王觉得自己很有办法，非常高兴地把召公找来，得意地向他夸耀说：“怎么样？我能弥‘谤’，老百姓再也没人批评我了吧？”

召公听了不以为然。他对厉王说：“不是把‘谤言’止住了，而是您堵住了老百姓的嘴。但是，堵住了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了奔流不息的河流一样。堵住的水流一旦冲垮了堤防，就会势不可挡。因此善于治理河流的人，一定要疏导障塞。而善于治理老百姓的人，一定要让他们讲出心里的话。为君王的一定要随时了解下情，然后根据民情决定自己的取舍，才能把事情办好。老百姓人人都生有一张嘴，就像大地上的山川一样。大地上的山川能不断地生出财物器用，而人的嘴巴能表达出心里所想的事情并评论政事做的好坏。老百姓说好的，就要去做。老百姓说坏的，就要想办法及时改正。您应该让他们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出来，怎么能把他们的嘴堵上呢？其实，堵住老百姓的嘴，使他们敢怒不敢言，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厉王拒绝了召公要他广开言路和放弃“专利”等切中时弊的劝谏，继续一意孤行。虽然表面上看来很平静，但三年以后，火山爆

发了。愤怒的国人前呼后应，袭击了厉王的宫殿并赶跑了周厉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召公谏“弥谤”的故事。

（三）厉王流彘与“盟诅”

厉王不顾大臣们的劝阻，一心实行“专利”，虽然增加了一些财政收入，但大大地失去了民心。一些贵族由于国王征收贡赋的加重，土地被兼并。也有一些人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沦为平民，壮大了“国人”的队伍。

贵族们为了转嫁自己的负担，也想方设法加紧了对奴隶和平民的压榨，从而使奴隶、平民与贵族间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偏偏这时又遇上了严重的虫害。厉王的地位岌岌可危，再也统治不下去了。

怎么办呢？庄稼都被蝗虫吃掉了，赤地千里，看来是颗粒不收了。老百姓想到山林川泽里去谋生，可又被厉王的“专利”政策把这条路堵死了。现在，这些国人对厉王的暴虐统治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愤怒的“国人”——包括平民和一部分贵族在宗周一哄而起，手持棍棒、斧头，包围了厉王居住的宫殿。厉王一看大势已去，在国人还没冲进王宫的时候偷偷从后门溜走，渡过黄河，一直跑到了彘地（今山西霍县一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厉王流彘”的历史事件。

西周有“国”、“野”之分。所谓“国人”，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平民和手工业者、商人。此外，还有一部分小贵族。国人中绝大多数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群众。他们在宗周起来暴动并把周厉王赶跑，这对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次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周王朝的统治，从此周王朝的统治地位一落千丈，各地诸侯和一些少数民族再也不听周天子的指挥了。不仅如此，国人暴动还摧毁了厉王“专利”的反动措施，使得山林薮泽“出入无禁”，老百姓增加了重要的经济来源，而更重要的是废除了这一部分土地的国有。新开垦出来的土地愈益增多，成了贵族的“私田”。西周社会的经济基

础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国人暴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铜器铭文中也有记载。有一件周宣王时的“埶（zài）盨”追述说：……有进退，雩邦人、正人、师氏人有驪有辜，廼（乃）藉倗即汝，廼繇宕，俾复虐逐氒（厥）君（厥）师，廼作余一人咎……

铭文中，“邦人”就是国人。“正人”即是“政人”，应是工正、陶正、车正、马正等官吏及下属手工业劳动者。“师氏人”是卒伍，指宿卫王宫的军队。而“倗”是僚属，“藉倗即汝”就是说不亲临，只听僚属的报告。“繇宕”即淫怠、放荡的意思。“俾”有使得、以致的意思。这段铭文是说，“上级官吏平时怠惰政事，对于他们下属的行为不闻不问，也不加以检束。直到必须对这些僚属进行惩处时，或下层民众（国人、胥徒、士兵）有‘罪’有‘辜’时，才派人去告诉埶，而他自己却依然故我，照样淫怠。正因平日的放纵，所以才使那些不法的僚属和民众有恃而无恐，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驱逐国君和他们上司的这场大乱子……”

我们从“埶盨”铭文中可以看出：这次暴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不仅国人，就连一些下级官吏和军队都对厉王十分不满了。但厉王仍不改弦更张，终于被他们赶下了国王的宝座并沉重地打击了周王朝庞大的官僚机构，这就是“埶盨”铭文中所说的“虐逐氒（厥）君氒（厥）师”。

厉王时国人暴动使西周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动摇，揭开了由奴隶制社会逐渐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序幕，是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四）“共和行政”

国人恨透了周厉王，恨不得马上把他抓住。他们冲进王宫以后，四处搜查，早已没有了厉王的影子。厉王逃走时十分狼狈，连他的儿子太子静也没有来得及带上。在一片混乱中，太子静自己跑出了王宫，躲进了召公的家里。

当国人们发现厉王逃跑了，正为没处发泄他们的满腔仇恨而有些沮丧的时候，忽然有人报告："我看见太子跑进召公家去了！"

人群立刻沸腾起来："走哇！到召公家抓太子去！"

"对！"人们异口同声地喊着。大队人马迅速地把召公的家围个水泄不通。要不是召公平日在民众中有些威望，人们早就破门而入了。

"快交出太子！""快把昏王的儿子交给我们！"暴怒的人们在召公院墙外大声喊着。

召公看到这种情况，连忙让太子脱下衣服给自己的儿子换上，把太子藏到了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然后把聚集在院外的人们放了进来。

人们一拥而上，对着这个"太子"就是一阵棍棒、斧劈和刀砍。召公这个可怜而无辜的儿子早已成了一堆肉泥，当了真太子的替死鬼。而真太子却逃脱了这场灾难，从此就在召公家里住了下来。

国不可一日无君。就在厉王逃亡在外，"太子"又被杀死的情况下，由周王朝的贵族们举行了会议，公推德高望重的周公和召公共同代行国政，号称"共和"；也有的记载说，有一个贵族名和，被封在"共"地为"共伯"。共伯和因为平时的行为和道德都很高尚，很得各国诸侯的敬佩。所以在厉王出奔以后，诸侯们就推举共伯和代行天子政事，称为"共和行政"。不管是周、召二公共同执政的说法也好，还是共伯和代行国政的说法也好，西周王朝在厉王逃走以后，曾有一段时间由贵族们共行国政确是事实。共和行政期间，革除了厉王时的一些弊政，老百姓的生活也有所改善。据推算，"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自此以后我国历史上才有了确切年代的纪年。

共和行政十四年，遇到了一场旱灾。恰好这一年厉王也在彘地老死。周、召二公便利用老百姓的迷信心理大造舆论说："老天爷降下的旱灾是惩罚厉王的征兆，现在他死了，我们就应把太子请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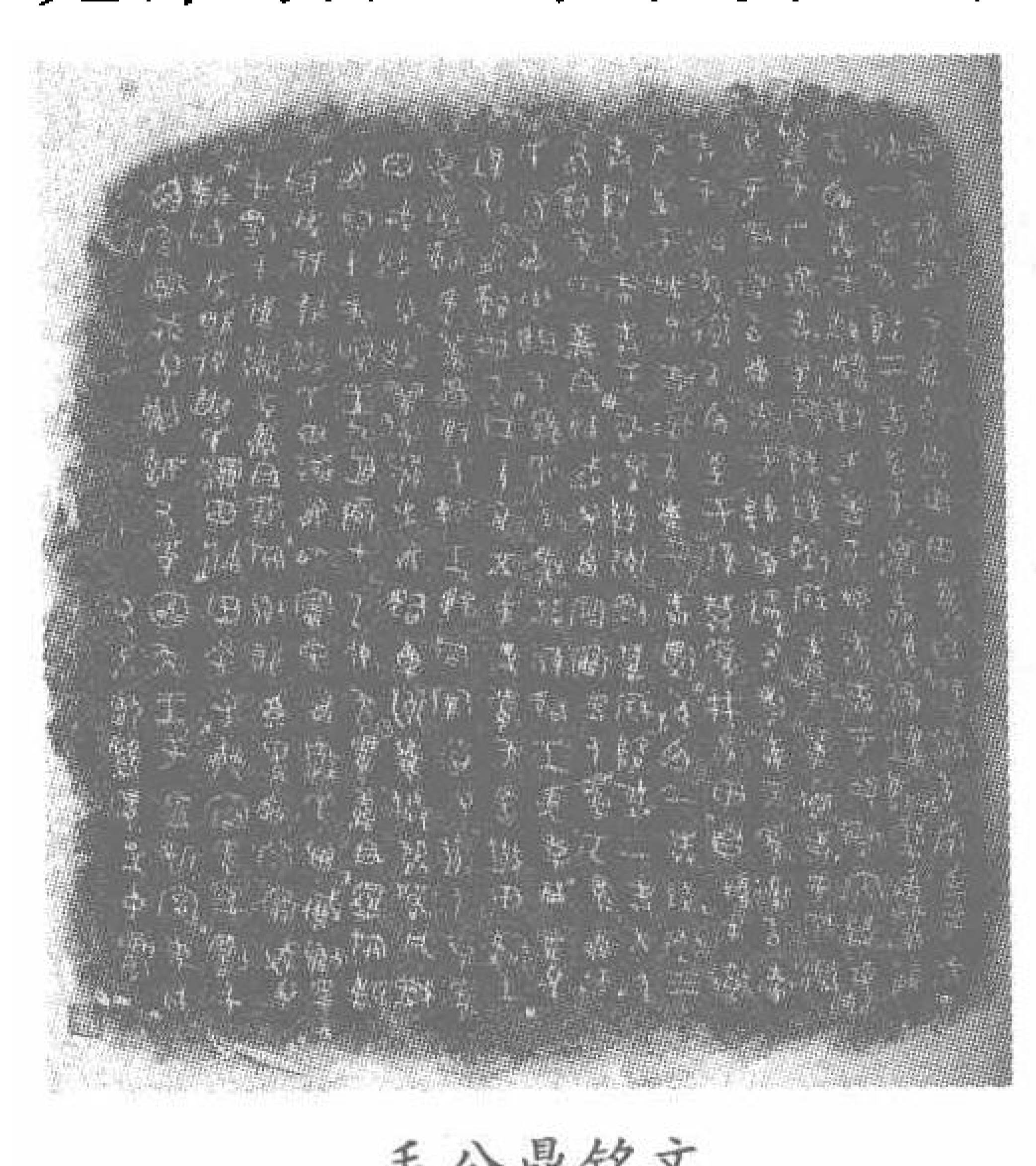
立为国王。不然的话，老天爷又要惩罚我们了！”

光阴荏苒，日月蹉跎。这时厉王的儿子静已经长大成人，公元前 827 年，被周公、召公请出来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宣王。

（五）“宣王中兴”

宣王即位以后，在召公和周公的辅佐之下，一方面努力恢复周王朝自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以来建立起来的好传统，一方面继续革除厉王时的各种弊政，使周王朝在政治上有了一番新气象。

有一件宣王时的铜器“毛公鼎”，把周宣王汲取厉王实行“专利”引起国人暴动的教训记载得十分详细。“毛公鼎”是我国直到目前所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铜器，共有 497 个字，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早已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熟知。铭文记载说，宣王要求臣下处理政事时，要广开言路，不得壅累庶民，必须使下情上达；同时，宣王还警告他们在征收赋税时，不得贪污中饱，从中鱼肉百姓；还要求他们对其僚属平时要严加管束，不准那些人沉醉于酒。等等。很显然，“毛公鼎”铭文记载的宣王所发布的各项禁令，都是针对厉王时的苛政和官纪败坏等往事而发的。



毛公鼎铭文

由于周宣王的励精图治，使国内的各种矛盾有所缓和，一些诸侯也纷纷来到宗周朝见宣王，周王朝的威望逐渐又有所提高。宣王在努力整饬国政的同时，还不断对西北和南方一些不服从统治的少数民族部落大举用兵。

西北一带的猃狁和西戎，是对西周王朝威胁最大的戎狄部落。他们以游牧为生，战斗力相当强，经常对周王朝进扰。特别是自懿王以后，随着西周王朝国力的衰弱，他们的骚扰活动也愈益频繁，直接威胁着首都镐京的安全。公元前 825 年，宣王

首先任命了召穆公为相，秦仲为大夫，进行大规模反击戎人的战争。这年大旱不雨，宣王迷信地认为是战争不利的预兆，急得他连忙向群神祈祷。也真是凑巧，就在宣王祈祷后不久，果然下起了大雨。虽然如此，在与戎人战斗过程中，秦仲还是兵败被杀。但宣王并不甘心失败，继续选用了秦仲的儿子庄公为将，又给他 7 000 人马，让他征伐西戎，终于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宣王还发动了对猃狁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猃狁族被赶到了北部很远的地方，减轻了对北部边境的威胁。在与猃狁交战中最出名的英雄是南仲和尹吉甫。南仲曾受宣王之命驻守朔方，使这一带成为周王朝北部的重要屏障。《诗经·小雅·出车》是这样赞美他的战功的：

宣王命南仲，	（王命南仲，）
驻守朔方城。	（往城于方。）
战车真是多，	（出车彭彭，）
战旗色鲜明。	（旂旐央央。）
天子命南仲，	（天子命我，）
坚守朔方城。	（城彼朔方。）
赫赫英名震，	（赫赫南仲，）
猃狁被战胜。	（猃狁于襄。）

另一名大将是尹吉甫，他率领大军攻伐猃狁，一直打到他们的根据地太原。《诗经·小雅·六月》赞扬他说：

英勇杀敌逐猃狁，	（薄伐猃狁，）
直取敌巢捣太原。	（至于太原。）
文武全才尹吉甫，	（文武吉甫，）
天下万国好则宪。	（万邦为宪。）

宣王还从公元前823年开始，对南方的荆蛮和东南的淮夷发动了战争。他曾命令方叔带兵攻打荆蛮、召虎带兵攻伐淮夷、尹吉甫征伐徐戎。直到公元前810年，经过了多年艰苦激烈的战斗，把这些部落征服，江汉徐淮一带从此才正式纳入了西周王朝的版图。周宣王把这些新征服的地区赏赐给召虎、申伯、仲山甫等有功之臣，申伯也被加封。仲山甫被封往东方。

宣王时期，经过连年的对外征战，不仅“复先王之境土”，夺回了在周王朝中期以后因国力衰弱而被一些少数民族占去的土地，而且还使周王朝的版图比以前有所扩大。边疆一些少数民族又像从前一样，恢复了同周王朝的联系。这与周王朝自恭王以来的那种门庭冷落的局面恰成明显的对照。因此，历史上把宣王对外战争的胜利称为“宣王中兴”。

周宣王时期与北方、西方、南方、东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在铜器铭文中也有记载。宣王五年的“兮（xī）甲盘”，就记载了兮甲曾随从周宣王出战北方的猃狁，砍得不少人头和捉了许多俘虏。此后又受宣王之命去征伐南淮夷，向他们征收布帛、冠服和奴隶。这个兮甲，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尹吉甫。尹是他的官名，兮是他的氏，甲为他的名，吉甫是他的字；另一件宣王六年时的铜器“召伯虎簋”，记载了召伯虎伐淮夷取得胜利后回到丰京，宣王为他举行献俘报捷的“告庆”曲礼。这个召伯虎，就是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诗经·江汉》里出现的名将召虎；此外，还有一件宣王时期的铜器“师寰簋”，记载了师寰也曾受宣王之命征伐淮夷，他在战争过程中老成持重，指挥得当，斩获了不少敌人和抓到了一批俘虏，立下了战功。据学者研究，这个与召伯虎同时出征的大将师寰，就是《诗经·小雅·采芑》中提到的老将方叔。师是他的官职，寰是他的名，而方是他的字。如此等等。

虽然周王朝在与周围一些少数民族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周王朝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都早已十分虚弱，“宣王中兴”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没过几年，周宣王在与外族的继续斗争中连吃败仗，

周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很快就处在灭亡的前夜了。

（六）“驹父盨”的发现与宣王征淮夷的长期性

周宣王时的大将南仲，在成就“宣王中兴”的大业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在征伐猃狁时战功赫赫，曾驻守朔方，成为西周王朝坐镇北方的要员；而且还曾挥师南征，在与淮夷的长期战争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关于宣王征伐淮夷的重大历史事件，史书里记载很少，只是《诗经》里的《江汉》和《常武》有关战事情况的描述，周宣王与淮夷战争的激烈场面才得以再现出来。《常武》描述说：

王师作战真勇武，	（王奋厥武，）
雷霆之威夷慑服。	（如震如怒。）
开路先锋锐无当，	（进厥虎臣，）
震天杀声似啸虎。	〔阚（hǎn）如虓滰（xiāo）虎。〕
荡平徐淮设防处，	（铺敦淮濆，）
斩将搴旗捉俘虏。	（仍执丑虏。）
解民倒悬沐王化，	（截彼淮浦，）
大军所至无不服。	（王师之所。）
…………	…………

可见徐淮对周宣王大军的抵抗是十分激烈的。学者们根据最近出土的“驹父盨”铭文研究，西周王朝与淮夷的战争应至迟延续到宣王十七八年左右。

“驹父盨”1974年出土于陕西武功，现仅存盨盖。盖口沿饰有一周重环纹，腹部饰瓦纹，盖顶饰蟠夔纹。器盖内有铭文9行，每行9字，再加上重文，共82字，铭文是：

唯王十又八年正月，南

中（仲）邦父命（令）驹父毁（鸠）南诸
侯，率高父，见南淮夷，厥
取厥服。堇夷俗（欲）遂不敢
不敬畏王命，逆见我厥
献厥服。我乃至于淮，小大
邦无不敉具王命。
四月，还至于蔡。作旅盨，
驹父其万年永用多休。

这段铭文里的王，指周宣王。而南仲邦父，就是《诗经·大雅·常武》里提到的南仲。而驹父，是南仲属下的一个臣僚。“毁”有学者读为“鸠”，认为是安顿的意思。“高父”是人名，为周臣属。“服”为服物，即布帛类贡品。“堇”是严禁的意思。而“俗”与“欲”字意同。“敉具”学者读为“储具”，是积蓄准备的意思。铭文是说，在周宣王十八年（前 810）正月的一天，南仲命令驹父去安顿才被征服的南方徐淮诸侯，并率领臣下高父同往，视察南淮夷各国并征收贡纳布帛。南仲命令他们一路上要严禁蛮夷邪欲，宣布王化，使其服从王朝统治。这些淮上诸侯个个都来迎接驹父，并献上布帛等贡纳物。驹父等一行人直达淮上，沿途淮徐小邦大邦的首领都准备好了贡物，恭恭敬敬地迎接王使的到来。直到四月完成使命，返回蔡地。

我们从铭文所记“堇（禁）夷俗（欲），遂不敢不敬畏王命，逆见我厥献厥服”看，驹父受南仲之命去巡视南国，当为南淮夷征服不久后而采取的善后措施。而淮上的大小方国首领，畏于周宣王、南仲、皇父、休父大军的余威，无不小心翼翼地迎接王朝命使的到来。

“驹父盨”的发现，不仅使我们认识到南仲是征伐淮夷的重要将领，而且还是在战争胜利后负责经营南方诸侯国的重要人物。此外，使我们对宣王征淮夷战争的长期性有了新的认识。周宣王与淮

夷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进行得十分激烈，而且时间也持续较长。虽然取得了南方和东南方少数民族的暂时臣服，但消耗了周宣王近前半生的精力。“驹父盨”的出土，为我们研究西周晚期与东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

（七）“不藉千亩”和“料民于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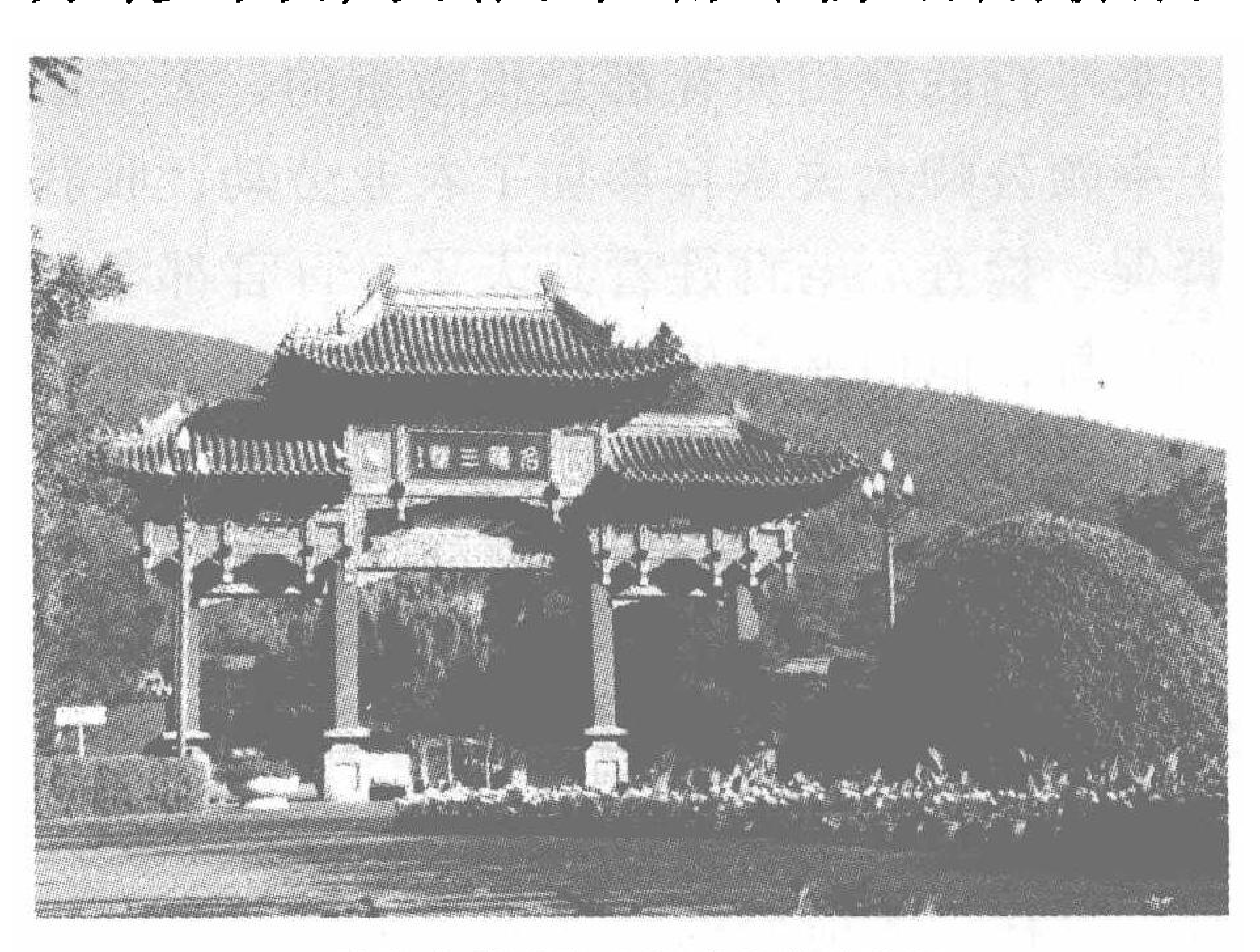
宣王即位不久，就废除了每年春天必须举行的藉田典礼。周王朝的大臣们对宣王这一违反祖训的做法十分不满，有一位大臣虢文公劝谏宣王说：

“您把一年一度举行的藉田典礼取消了怎么行呢？先王立下这个规矩，是为了向万民表示对农事的重视啊！祭祀上天所用的物品、老百姓所吃的东西以及国家的财物器用，全是仰仗农事而取得的。正因为农业这样重要，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管理农事的稷官就地位较高。历来举行的藉田典礼都是很隆重的，天子诸臣都要参加，表示国王率领公卿大夫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收获时也是这样到田野里督促、检查。老百姓看到天子、百官都参加了劳动，一个个都受到鼓舞，他们就会更安心农业生产了。在藉田典礼举行过后，他们就会按时整治好田界、疏松好土地、锄净杂草，再也不敢有人懈怠。年年获得好收成，财物器用也就不会缺乏，万民就能安居乐业。在从前，天子一心关心着农业生产，不敢随心所欲地改换万民的工作，主要怕妨碍了农时。按照惯例，每年集中春、夏、秋三个季节让老百姓干农活，只留下冬天一个季节进行军事训练。这样，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真是出征则兵强马壮，守备则粮草充足。不仅能使上帝鬼神高兴，而且老百姓也会衣食充足。祭祀鬼神的祭物既不会缺乏，而留作施舍赏赐用的东西也会敷敷有余。您不是立意要继承和发扬先王的传统么？怎么能够‘不藉千亩’，放弃了重视农业的政策呢？您这样做下去，将来是不堪设想的！到那时，祭祀鬼神用的供物将会十分短缺，老百姓的生路也会被堵死，又怎么能求得上天的福佑和

让老百姓为您卖命呢?”

周宣王拒绝了虢文公的劝谏，因此“不藉千亩”就成了他为政“失德”而受到猛烈攻击的罪状之一。据说，因为他不听劝谏，三十九年（前789）与姜戎交战，受到老天爷的惩罚，在千亩这个地方被姜戎打得大败。为什么宣王“不藉千亩”引起了虢文公等人激烈的反对，并把30多年后大败于姜氏之戎的原因也归罪于此呢?

原来，西周初期，土地为周王朝国有并划分为井田。奴隶们在国王和他的大小爪牙监督下集体耕种，每年春天举行的“藉田”典礼，不过是向全国进行一年耕作的总动员而已。到了宣王时期，井田制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不仅大小贵族利用奴隶的剩余劳动所开垦出来的一块块“私田”，就是原来的大片“公田”，也不少被贵族化公为私，可以随意进行交换或转让。贵族开始把这些田地划分为许多小块，交给原来的奴隶们去自行耕种。每年春天，农师之类的农官再也没有必要到田野里去监督生产，一些贵族也早就习惯了不去田里，而通过收取地租的办法过着坐享其成的生活。宣王“不藉千亩”，实际上是对自恭王以来就已出现的土地国有制逐渐瓦解的承认。周宣王面对现实、顺应历史潮流的做法，受到顽固维护土地国有制的贵族的强烈反对和攻击。他们把“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的原因一股脑儿归咎于“不藉千亩”，以发泄对宣王实行的这一新措施的不满。



为纪念晋国先王叔虞而建的晋祠

正由于宣王承认了土地关系发生变化的事实，从而使阶级矛盾

有所缓和。宣王凭借暂时得到恢复的国力，开始了对外的战争，北伐猃狁、西戎，南征荆蛮、淮夷，才取得了“中兴”的局面。

宣王实行改革以后，部分得到了人身解放的奴隶，不但对原来的贵族，而且对于周王朝也应负担兵役和各项杂役了。但是，一贯拼命利用奴隶的剩余劳动为自己开辟私田的贵族，想方设法向周王朝隐瞒人口的数目，这就引起了他们和周王朝的矛盾。

宣王晚年，不断的对外战争，使国力消耗很大。人力和物力的严重缺乏，使得宣王开始对各级贵族手下不在国家控制数字之内的隶农打主意，让贵族们按照实际的人数带领他们参加战争或从事各项劳役。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料民于太原”。

宣王“料民”——统计人口的措施，激起了贵族们的强烈不满。有一个大臣名叫仲山甫，危言耸听地对宣王说：“老百姓的数目是不能进行统计的！自古以来从不进行人口统计，但都能知道人口的多少，这是因为设有各种官职管理这方面的事情：老百姓的生死，有‘司民’的官儿管。赐族受姓，有‘司商’的官儿管。征兵服役，有‘司徒’的官儿管。杀死罪犯的数目，有‘司寇’的官儿管。国库收入的情况，有‘场人’的官儿管。每年支出粮草的数目，有‘廪人’的官儿管。……因此，每年国家的收入、人口的生死数目都是可以知道的。国王的责任就是让万民在田里好生劳动，在农闲的时候去打猎。通过藉田或狩猎就可以进一步检查人口数字了，又何必亲自大张旗鼓地统计人口呢？您这样做，就向天下暴露了周王朝人口减少、兵源枯竭，而您又没有办法处理好政事的弱点。这样，各国诸侯就会远远地离开您，不再亲附王室了。所以我认为，您无端地进行人口统计，连老天爷都会被激怒的！这不仅妨碍您今后对天下的治理，还会对您后世子孙也产生不利影响！”

周宣王不顾仲山甫等人的反对，坚持“料民”，使周王朝所能控制的人口数目有所增加，兵源的问题也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由于西周奴隶制王朝已病入膏肓，宣王实行“不藉千亩”和“料民于太原”的改革也无济于事。到了他的儿子幽王即位以后，

西周王朝便在天灾、人祸和外族入侵的交相打击下灭亡了。

（八）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周宣王在位49年死去，他的儿子宫涅即位，这就是西周有名的腐朽昏聩的末代天子——周幽王。幽王一继位，周王朝就相继遇到了严重自然灾害的沉重打击。

首先是宣王末年和幽王初年发生的旱灾，使得全国的河流、泉池都干得见了底，草木庄稼也全都枯死，国内赤地千里。民众只得离开家园，逃到别处去谋生，真是哀鸿遍野，路有饿莩。

大旱给周王朝带来的严重困难还没有得到恢复，幽王二年首都镐京和泾水、渭水、洛水流域又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记述了这次地震的严重破坏程度时说：

十月电闪伴雷鸣，　　（爗爗震电，）
为政不善灾异生。　　（不宁不令。）
大小河流水四溢，　　（百川沸腾，）
山峦崩倒声隆隆。　　（山冢崒崩。）
高岸陷裂为峡谷，　　（高岸为谷，）
深渊隆起变丘陵。　　（深谷为陵。）

周王朝的一个史官伯阳甫对地震的原因曾作过探讨研究，他分析发生地震的原因说："天地有阴阳二气，平时各得其位，大地平静。但如果阳气在下面，阴气压着它，使它不能升起，就会发生地震。现在泾水、渭水、洛水流域都发生了地震，是阳气为阴气压挤所引起的。"这种从地下存在的矛盾运动中，去探求地震原因的想法，是十分可贵的。但他认为这是老天爷"讨厌"了周王朝，降下了地震的灾异对周幽王进行警告。他劝谏幽王说："周王朝恐怕要灭亡了。历史上伊水、洛水曾干枯过，是夏王朝灭亡前的征兆。黄河的水也曾干枯过，是商王朝灭亡的征兆。现在周王朝发生的事情

和夏、商二代灭亡前的情况很相似。一个国家山川牢固，立国才能有所依托。山崩川竭，就是亡国的征兆。河流枯竭了，山峰也一定会跟着倒塌。老天爷要抛弃我们了，我看周王朝存在不过十多年就要完了！”果然，当年三川（泾水、渭水、洛水）干枯，而周人发祥地周原上的岐山也轰然一声倒塌了……

交相产生的旱灾和地震使周王朝的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也陷入了一团混乱和动荡之中。昏庸的周幽王对此不闻不问，反而整天沉醉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之中。

幽王三年，得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子名叫褒姒，周幽王对她十分宠爱。褒姒生了儿子伯服以后，幽王对她更是另眼相看，废掉了原来的皇后申后和她生的儿子太子宜臼。又正式册封褒姒为皇后，册立伯服为太子。

周幽王自得到褒姒以后，终日与她饮酒作乐，早把朝政忘在脑后。虽然褒姒衣必罗绮，食必珍馐，但脸上从来没有露出过一次笑容。周幽王用尽了一切办法，想使她发出笑声，都没有达到目的。有一天，幽王心血来潮，终于想出了个能逗得褒姒大笑不止的办法，这就是上演了一场“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原来，古代交通不便，为了及时报警，在山顶上修建了许多高大的烽火台，上面准备了许多狼粪、火把之类，并派兵在台上驻守。一有敌情，看守烽火台的士兵白天就燃起狼粪，一缕白烟便直冲云天，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所以古代把外敌侵略就叫做“狼烟四起”；夜里，则点起火把，远处见到了火光冲天，便也能知道这里发生了军事情况，这就是所谓的“烽火报警”。周幽王这一天陪伴褒姒来到了烽火台上，点起了狼烟火把，并把大鼓也擂得震天价响。周王朝曾与各国诸侯有约：必须“藩屏周室”。诸侯们一看到烽烟大起，以为有外敌来犯周京，连忙率领兵马赶到镐京。但是到这里一看，只见周幽王陪伴着褒姒在台子上悠然饮酒作乐，并没有什么特殊军情发生，才知道受了愚弄，一个个懊恼地带兵回国……

褒姒在台上看到各国诸侯受骗的狼狈相，觉得十分开心，禁不

住哈哈大笑起来。周幽王一看这个办法终于逗得褒姒发了笑，心里也非常高兴。为了能使褒姒继续发笑，他又依法炮制了几次，结果来"勤王"的各国诸侯一次比一次减少了。后来，当幽王再点起烽火时，就根本再也没人理睬了。

幽王为了剥削更多的财富供他享乐，还提拔了"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王朝卿士，进一步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这就更激起了国内民众对他的不满。被幽王废掉的申后是姜姓的申侯的女儿。申侯对此十分恼火，公元前 771 年，他联合了缯国对周王朝大兴问罪之师。申侯怕自己的力量单薄，还勾结了犬戎族一起进攻周幽王。周幽王慌了手脚，连忙燃起烽火向各国诸侯报警。但是，各国诸侯平时被幽王欺弄惯了，这次又以为是在戏弄他们，因此没有一国诸侯派兵前来"勤王"。镐京很容易的就被申、缯和西戎联军攻破，周幽王带着褒姒出逃，在骊山脚下（今陕西临潼）被戎人追上杀死，褒姒也成为戎人的掳获品。繁华的镐京经过戎人的烧杀抢掠，变得残破不堪。周王朝聚敛的大批财宝、珠玉也被戎人席卷而去了。

从周武王灭商到周幽王被杀，西周一共经历了 11 代，12 王，统治了约 257 年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九）平王东迁和秦《石鼓文》

各国诸侯得到幽王确实被戎人杀死的消息以后，才知道这次可不比往常。卫国、晋国、郑国和秦国都派来了人马前来援救周王朝。各路大军星夜赶到镐京以后，戎人仓皇逃走，留下的只是一座被焚烧殆尽、洗劫一空的空城。各国诸侯看到幽王已死，便与申侯、缯侯商量，把原来的太子宜臼从申国请回来，共同拥立他为周王朝的天子，这就是周平王。

平王即位以后，看到戎人已散布王畿各地，随时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再加上镐京残破不堪，自己兵力又很有限，因此公元前 770 年，在郑武公、晋文侯等各国诸侯的帮助下，放弃了宗周，东迁洛邑。因为洛邑地处镐京以东，号称"东都"，所以历史上把东

迁以后的周王朝称为"东周"。

平王东迁以后，周王朝还控制着600多平方里的土地。后来，这些土地就愈来愈少了。其中有一部分土地赏给了护国有功的诸侯。如郑国被赏赐在虎牢以东（今河南城皋一带)。郑国统治者与商人立有盟约，商人不得叛郑，而郑国的统治者不得强买商人的东西。他们互相合作，"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使经济得到了发展；晋国也得到了一部分土地，使昔日"狐狸之所居，豺狼所嗥"的荒凉土地逐渐开发出来；此外，还有一部分土地被诸侯侵夺，一部分被戎人占领，一部分分封给王族或公卿大夫。如此等等，周天子自己所有的土地和民众，就所剩无几了。

东周王朝建立以后，各国诸侯逐渐强大起来，再也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周王朝失去了诸侯定期的朝聘贡纳，财政上十分窘迫。据说周平王死后，周王室穷得连办丧的钱都拿不出来，只得派人到鲁国"求赙（fù，旧时拿钱助人办理丧事叫赙)"——请求救济。这时候的周王朝"王室式微"，周天子成了名义上的"天下宗主"，再也没有力量对天下进行控制了。而各国诸侯之间，强并弱、大凌小，齐、楚、秦、晋开始强大起来。自此，我国历史进入了"政由方伯"的大动乱时期——春秋时期。

在建立东周王朝的过程中，秦襄公起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在驱逐犬戎时战绩卓著，而且护送周平王"东徙洛邑"也出了很大力。周平王对秦襄公感激涕零，把他从"大夫"的爵位一下子就擢封为"诸侯"，并把岐西的大片土地封给秦国。周平王还与秦襄公有盟约说："戎人太猖獗了，无端地夺走了我岐、丰一带大片土地。今后秦国如能把戎人赶跑，收复的土地就归秦国所有！"从此，秦襄公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在汧渭一带建立了国家，与各国诸侯正式发生了联系，秦襄公护送平王到洛邑以后，凯旋归国，真是踌躇满志，志骄气满，在西畤（zhì）刻石纪功，这就是流传至今有名的《石鼓文》。

所谓《石鼓文》，就是在10块圆柱形的大石上，刻满了秦国的


石鼓文

大篆文字。因为石形像鼓，所以被人们称为石鼓文。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和风化剥蚀，石鼓上的文字残损得很厉害，但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的历史事件，在《石鼓文》中还是有迹可寻的。石鼓到今天还保存着（包括合文、重文）321 字，是研究周秦历史的重要史料。

《石鼓文》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而且上面的文字是我国保存的最古的篆文。《石鼓文》用笔劲遒、隽永，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是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史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秦自襄公建国以后，在西陲（chuí）经过世代经营，终于加入了春秋时的“五霸”和战国时“七雄”的行列。到了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混一六合，结束了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因此，《石鼓文》是西周奴隶制王朝灭亡的历史见证，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秦王朝的奠基石。

二、“一叶惊秋”

——旧制度母体中孕育的新因素

自西周中期恭王时代起，在国有土地关系内部就开始产生了新的封建主义因素。虽然土地租让在这时还是零星的、偶然的出现，但“一叶惊秋”，经过夷王、厉王时期的继续发展，终于导致了旧有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全面走向崩溃。

伴随着土地国有制逐渐遭到破坏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青铜器开始出现，从而使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一反

往日富丽、神秘的特色，从器物的种类、型制、纹饰到铭文都形成了新的特点。

（一）裘卫四器与土地租让

1975年2月，陕西岐山南麓古周原遗址范围内的董家村，发现了一处周代的青铜器窖藏。窖内出土了从穆王到宣王时不同时期的青铜器37件，其中大部分铜器上铸有铭文，对我们研究从穆王以后到宣王这一段西周中、晚期的政治、经济、法律、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等方面的历史非常重要。特别是恭王时裘卫制作的二件鼎、一件盉、一件簋，被称为“裘卫四器”，是研究恭王时代铜器不可多得的标准器。“裘卫四器”中的“卫鼎甲”、“卫鼎乙”和“卫盉”记述了恭王时贵族们进行土地出租和转让的重要史实，是目前我们研究西周中期土地制度发生变化的最早、最珍贵的文字资料。

从铜器铭文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卫盉”和“卫鼎甲”是记载田地租让的事情，而“卫鼎乙”记载的是林地转让的事情。我们从有关田地租让的铭文中可以发现，当时的土地租让还是在周王朝大臣的参与和监督下进行的。说明了西周奴隶制土地国有向封建制的土地私有转化，首先是从荒山野林开始的。

“卫盉”还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有关土地价格的珍贵资料。我们把“卫盉”的有关记载参照传世的几件铜器如“曶鼎”、“格伯簋”等铜器铭文的有关记载，就可以把西周时期的土地和奴隶价格计算出来。它们的比价是：

卫盉：1件玉璋=80朋=10田。

格伯簋：4匹良马=30田。

曶鼎：1匹马+1束丝=5名奴隶。

根据上列的比价进行换算的结果，西周时一田值贝币8朋，一匹良马值贝币60朋，而一名奴隶还远远不值贝币12朋，说明周代奴隶处在牛马不如的悲惨地位。还应该提到的是，“卫盉”铭文里明确记载着玉璋值贝币80朋，两件赤琥加上两个鹿皮披肩和杂色

椭圆围裙共值贝币 20 朋。这种把贝币作为价值尺度的材料，在周代铜器铭文里是第一次发现，对周代社会经济和商品交换的研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二）匡与曶的一场官司

自恭王以后，“田里不鬻”的禁令逐渐遭到了破坏，这在西周中、晚期的铜器铭文里间有反映。奴隶主贵族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或用实物换取田地、山林，或用某块田地与另一块田地交换。除了我们上面所介绍的 1975 年新发现的几件裘卫铜器以外，还有几件传世的铜器铭文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著名的孝王时“曶鼎”，为我们追述了懿王时发生的一场官司，反映了懿王时土地转让还在继续进行。

“曶鼎”追述了懿王某年，发生了严重灾荒。有一个名字叫匡季的贵族趁着荒乱之机，带领他手下的 20 个奴隶抢走了另一个贵族曶的庄稼 10 秭。曶知道了这件事，把匡季的不法行为报告了他们的上司东宫。

东宫听后大怒，把匡季找来当面训斥说：“必须把你手下那几个抢庄稼的人给我抓来，如果你抓不来的话，我就要重重地惩罚你！”

匡季支吾其辞，推说不知。但他手下的人抢了曶的庄稼一事，却是掩盖不了的。只得向曶承认了错误。匡季表示用 5 田和 4 个奴隶来赔偿曶的损失。

曶认为匡的赔偿条件太低，又去找他们的上司东宫。曶向东宫明确地提出了要求说：“必须让匡季全部偿还我的庄稼！”

东宫听了曶的条件，提出了自己的判决意见：“匡季赔偿曶庄稼，必须偿还 10 秭①，馈送 10 秭。如果到明年不全部还清，就要加倍，付庄稼 40 秭！”

① 秭为 200 秉庄稼。收获时，每割一把庄稼即为一秉。

在东宫进行了第二次判决以后，匡季与曶两个当事人经过下面协商，终于达成了双方都可接受的条件，结束了这场官司。匡季在原来提出的5田、4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田一人，共用7田和5个奴隶满足了曶的要求，而曶则减免了匡被罚偿还的30秭庄稼，只收取了10秭庄稼就算完事……

就是这个“曶鼎”，把5名奴隶的价格与匹马束丝相等记载的很是清楚。匡季宁肯出七田五夫而不愿多出30秭庄稼，可见30秭庄稼要比五夫七田为贵。这也说明七田每年所生产出的庄稼，一定要低于30秭的数量。我们可以看出，周代的土地、劳力都没有土地上的生产品贵重。这是因为奴隶价格低，而当时荒地到处都有，只要驱使奴隶劳动，就可获得许多新垦田地。农业贵族为了获得奢侈品供自己享受，就用土地与工商贵族进行租让或交换。

厉王时期，也有两件铜器“鬲从盨”和“鬲从鼎”记述了当时发生的土地租让的事实。因这两件铜器都是贵族鬲从所做，故此得名。“鬲从盨”记述了厉王二十五年七月，一个名叫章的贵族用8个邑去换鬲从的田地。另一个贵族良氏也用5个邑与鬲从交换田地；“鬲从鼎”记述了厉王三十二年二月，鬲从向周天子告另一个贵族攸卫牧的状。因攸卫牧自鬲从那里得到土地后，没有交付地租。周天子命令调查这件事，并责成虢叔旅对事情进行处理。虢叔旅命令攸卫牧发誓说：今后如果再不缴纳应付鬲从的地租，愿受流放的处罚！“地租”的出现得到周天子的干预，说明了厉王时土地租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土地制度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动摇了周王朝的统治基础。因此，一些顽固维护土地国有制的大臣们劝导厉王实行“专利”，以限制贵族们任意把山林、河湖旁无主的荒地化为私人所有。宣王时，土地国有趋于名存实亡，他承认了土地私有的事实。“不藉千亩”正是周王朝自中期起，一百几十年间土地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的反映。

（三）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

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也比前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由于西周中晚期的铜器中可供作为分期断代的标准器不多，所以一般笼统地把这一时期称为“开放期”。建国以后，大批商周青铜器不断出土，特别是陕西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从铭文的内容上看，不少铜器可以准确地确定为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和宣王时期的东西。正因为不少铜器铭文上记载着周王的名号和十分可靠的纪年，可以把大量铜器中出现的重要人物联系起来，使西周中晚期供断代分期的标准铜器数量大为增多。这样，不仅可以把西周前期的青铜器区别清楚，就是西周中晚期之间的界线也可以划分出来，从而把对西周历史的研究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

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既保留了西周前期的某些作风，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因素，表现了新旧交替过渡时期的特点。

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变化，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反映。西周王朝“工贾食官”，青铜铸造业和其他各种手工业一样，都是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西周前期，正是奴隶制的鼎盛期，“百工”管理之下的青铜铸造业主要是为王室和各级贵族服务的。“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因此作为权力和周礼象征的青铜彝器显得十分庄严厚重、诡秘含蓄；西周中期以后，王室衰微，奴隶制内部逐渐产生了新的封建主义因素，一些管理工奴的工官一面偷工减料对上司敷衍塞责，一面用工奴的剩余劳动做成低级物品，以换取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或粮食。例如，这个时期的鼎足虽然看起来显得敦实厚重，但往往里面填加泥土作蕊。此外，这时也出现了供玩赏用的“弄器”和青铜“明器”。不少铜器的形制、大小都完全一样，很明显是出自一范，说明这时青铜器生产的效率有了很大提高。

（四）周原的铜器窖藏

陕西省岐山县和扶风县交界之处的周原遗址，是历年周代青铜器大批出土的重要地点之一。

说来话长，西汉时期这里就曾出土过一件铜鼎，上面的古怪文字谁也不能认读。西汉皇帝请来了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张敞，才弄明白了这是西周时代的“尸臣鼎”。可以说，张敞是我国最早对青铜器进行研究的学者，其事见于《汉书·郊祀志》的记载。清代中叶以来，这里又不断发现周代青铜重器，其中如著名的武王时的标准器“大丰簋”（又名“天亡簋”，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康王时代的“大盂鼎”和“小盂鼎”（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宣王时代的“毛公鼎”（原器现藏台湾省）等，早已蜚声中外，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特别有意义的是，在周原遗址范围内多次发现铜器窖藏。所谓窖藏，就是把成十上百件的铜器有意识地埋藏在人工挖好的坑窖之内。窖藏一般都没有经过后世的扰动，为我们保存了当时的原状。这些窖藏一般每处多为一家贵族的礼器，器物成组成套，有的还有使用痕迹。铭文也互有联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周原窖藏出土的大批青铜器，不仅使我们得到了许多断代标准铜器，而且为我们研究西周社会历史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

饶有兴味的是，周原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从时代上看，包括了西周早期到晚期的各个不同朝代器物，其中尤以西周晚期为多，但不见王室东迁以后之物。窖藏铜器发掘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不少成组成套，但掩埋时放置零乱，使人有匆忙、慌乱之感。据学者们研究，这是因为周室东迁时，周王朝一些重臣存放在家中和宗庙里的财物、彝器来不及全部带走，只得把一部分铜器仓皇埋入地下窖藏起来。虽然贵族们忍痛割爱，仓促掩埋，但有的窖藏里还是撒上了防腐的木灰，以防铜器的损坏。说明他们还幻

想着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再从窖中取走这些财宝。

但是，周王朝东迁以后，岐周一带是秦、戎交战的战场，岐邑变成了一片废墟。东周以后，王室式微，东逃的贵族们再也没有机会回来开窖。年代久远物故人亡。这些窖藏被掩埋了二千七八百年以后，才得以重见天日，被我们的考古学者发掘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说，周原不断发现的青铜器窖藏，正是埋葬西周王朝的坟墓。

（五）“变风”、“变雅”与社会变动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人们观念形态中的反映。西周末期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的变动，也在我国古代典籍《诗经》一书的“变风”、“变雅”中得到了反映。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诗歌305篇，基本为西周初至春秋时将近五六百年期间所创作，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诗经》一书，不仅以它现实主义精神为我国后世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而且它丰富的内容也为研究我国奴隶社会兴衰史，特别是西周的历史提供了大量资料。

《诗经》一书由风、雅、颂三部分构成。风即十五国风，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共160篇；雅有《小雅》、《大雅》，是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诗歌，多为朝廷贵族官吏所作，用于各种典礼或宴飨时演唱；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是西周王朝和鲁国、宋国统治者祭祖或举行重大典礼于庙堂之上演奏的颂歌。

所谓“变风”、“变雅”，是东汉时郑玄在《诗谱》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国风》中除去《周南》和《召南》以外的大量诗篇和《小雅》的《六月》以下各篇、《大雅》的《民劳》以下各篇，多为“衰世”之作，内容多是讽刺、怨愤王朝贵族统治者，或

是抒发男女间悦爱之情，宣扬了“淫乱”，因而与歌颂周王朝先王和西周盛世的“诗之正经”有别，故称之为“变风”、“变雅”。实际上，这些“变风”、“变雅”不少来自民间，或是从贵族中分化出来的士大夫阶级所作的政治讽喻诗。这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揭露了西周奴隶主贵族的黑暗统治，谴责了奴隶主贵族的腐朽生活，反映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深刻的社会变化。

《诗经·小雅·正月》就是一首所谓“变雅”的诗篇。诗中唱道：

父母只知生我身，	（父母生我，）
哪知我一世受艰辛。	〔胡俾我瘉（yù）。〕
生前的世道我不知，	（不自我先，）
死后如何我也不挂心。	（不自我后。）
只气那些小人当朝政，	（好言自口，）
坏事做绝好话说尽。	（莠言自口。）
我忧愁得心神恍惚，	（忧心愈愈，）
所以我受到侮辱和嫉恨。	（是以有侮。）
我孤独又忧苦，	〔忧心惸惸（qióng），〕
失官也丢了俸禄。	（念我无禄。）
我们又有啥过错呢？	（民之无辜？）
却一落千丈，沦为奴仆。	（并其臣仆。）
我们这些人真可悲，	（哀我人斯，）
又从哪儿得到糊口的俸禄？	（于何从禄？）
还不如那自在的乌鸦，	（瞻乌爰止，）
它还能自由地选择住处。	（于谁之屋。）
……	……

这个小官吏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官场斗争失败了，连生活都成了问题。《诗经·邶风·北门》，是一首“变风”，诗中唱道：

懵懵懂懂出北门，　　　（出自北门，）
心中忧愁深又深。　　　（忧心殷殷。）
日子窘迫又穷困，　　　（终窭且贫，）
谁能知我日艰辛？　　　（莫知我艰？）
这一辈子算完蛋！　　　（已焉哉！）
只怨老天捉弄人。　　　（天实为之。）

这是对一个卫国贵族破落后，所过的拮据生活的描述。更有甚者，有的贵族连饭都不能吃饱了。《诗经·秦风·权舆》里描写道：

过去我住的房子高又大，　　　（于我乎夏屋渠渠，）
现在我连容身之地也没有。　　（今也每食无余。）
哎呀呀，可真是今不如昔！　　（于嗟乎不承权舆！）

过去我每顿吃四大碗，　　　　（于我乎每食四簋，）
现在却顿顿吃不饱。　　　　　（今也每食不饱。）
哎呀呀，可真是今不如昔！　　（于嗟乎不承权舆！）

西周中晚期土地交换和转让的日益发展，使不少贵族失去了土地。长期对外战争的沉重负担再加上天灾人祸，不少贵族破产了，沦为社会的下层。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原来地位较低的人经济政治地位上升，成了“暴发户”。《诗经》中一些诗篇，也反映了这一社会阶级关系的大变动。《曹风·侯人》唱道：

鹈鹕鸟不下河捕鱼，停在鱼梁上，
〔维鹈（tí）在梁，〕

原是怕水沾湿了漂亮的翅膀。
（不濡其翼。）
看啊，那个暴发户沐猴而冠，
（彼其之子，）
他哪配穿那样好的新衣裳！
（不称其服！）

诗的作者是一个旧贵族，他看到别人发了财，感到气不顺，骂人家不配穿好衣裳。《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描写一个贵族羡慕别人一个个都发了财，可自己却每况愈下，一味倒霉：

悠悠我心恨绵长，	（悠悠我里，）
忧虑成疾病在床。	〔亦孔之痗（mèi）。〕
左邻右舍发了财，	（四方有羡，）
独我一人叹愁肠。	（我独居忧。）
别人日子真安逸，	（民莫不逸，）
我为生活终日忙。	（我独不敢休。）
老天在上不显灵，	（天命不彻，）
哪敢逸乐把别人仿？	（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虽然这些破落的贵族穷得斯文扫地，但对那些顺应时代而生的“暴发户”——新的有产者，却妒火中烧，这些穷“老爷”骂人了。你听，他们在《诗经·小雅·巧言》里骂道：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彼何人斯？）
竟心安理得住在河边。	（居河之麋。）
你哪有一点贵族的气魄和勇敢么？	（无拳无勇？）
却是坏事的祸根乱事的源。	（职为乱阶。）

你腿生疮脚流脓多猥琐！　　〔既微且尰（zhǒng）！〕
哪有一点力量和才干？　　（尔勇伊何？）
搞阴谋诡计却是行家里手，　　（为犹将多，）
这帮坏蛋结成群伙和圈圈。　　（尔居徒几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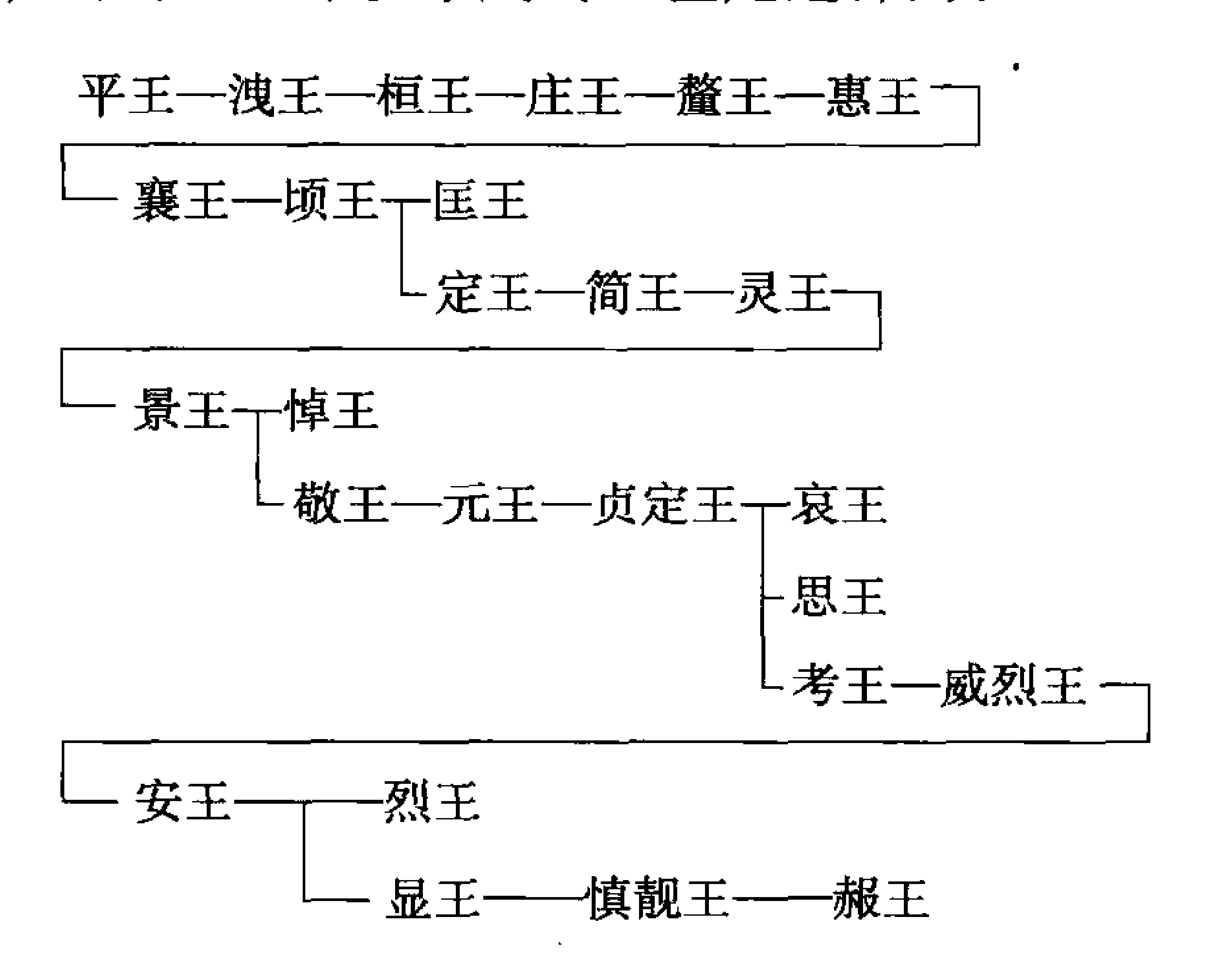
就是这些原来被老爷们看不起的人，上升了。他们破坏了奴隶社会原来主人与奴隶的正常关系，所以被骂为“祸根”，被骂为结帮拉伙的奸徒……

《诗经》里一些诗篇所反映的旧奴隶主阶级没落和新兴贵族的产生，与奴隶制母体内孕育的新的封建经济因素的发展、成长是并行不悖的。就是在这些没落贵族不在眼下的“无拳无勇”、面目猥琐的“小人”，终于成为时代的强人——西周奴隶制度的掘墓者。

而那些“变风”、“变雅”的作者们，他们对西周奴隶制度仍无限依恋与关切，妄图通过讽喻来扭转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西周奴隶制的颓势。但是，落花有意春去也。奴隶制经济的没落和西周王朝的灭亡正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变风”、“变雅”反映了奴隶制度内部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动，是唱给西周奴隶制王朝的送葬曲。

结语　西周灭亡话东周

西周灭亡以后，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东周自平王公元前770年建立至周赧王公元前256年被秦国灭亡，先后共25王，历时514年。东周的王世是这样的：



东周初期，见于记载的大小国家还有100多个，即所谓“东周列国”。由于“王室式微”，东周王朝的地位一落千丈，再也不能号令诸侯了。各国诸侯强凌弱，大并小，经过300多年的“春秋无义战”，只剩下了在政治上有一定影响的十几个国家；而在其后的200多年里，各国诸侯间“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真是“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战国策·序》）。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混一六合”，灭掉了韩、魏、楚、燕、赵、齐，统一中国，建立了秦王朝。那么，为什么史书上不把这个时期赫然写上二字——东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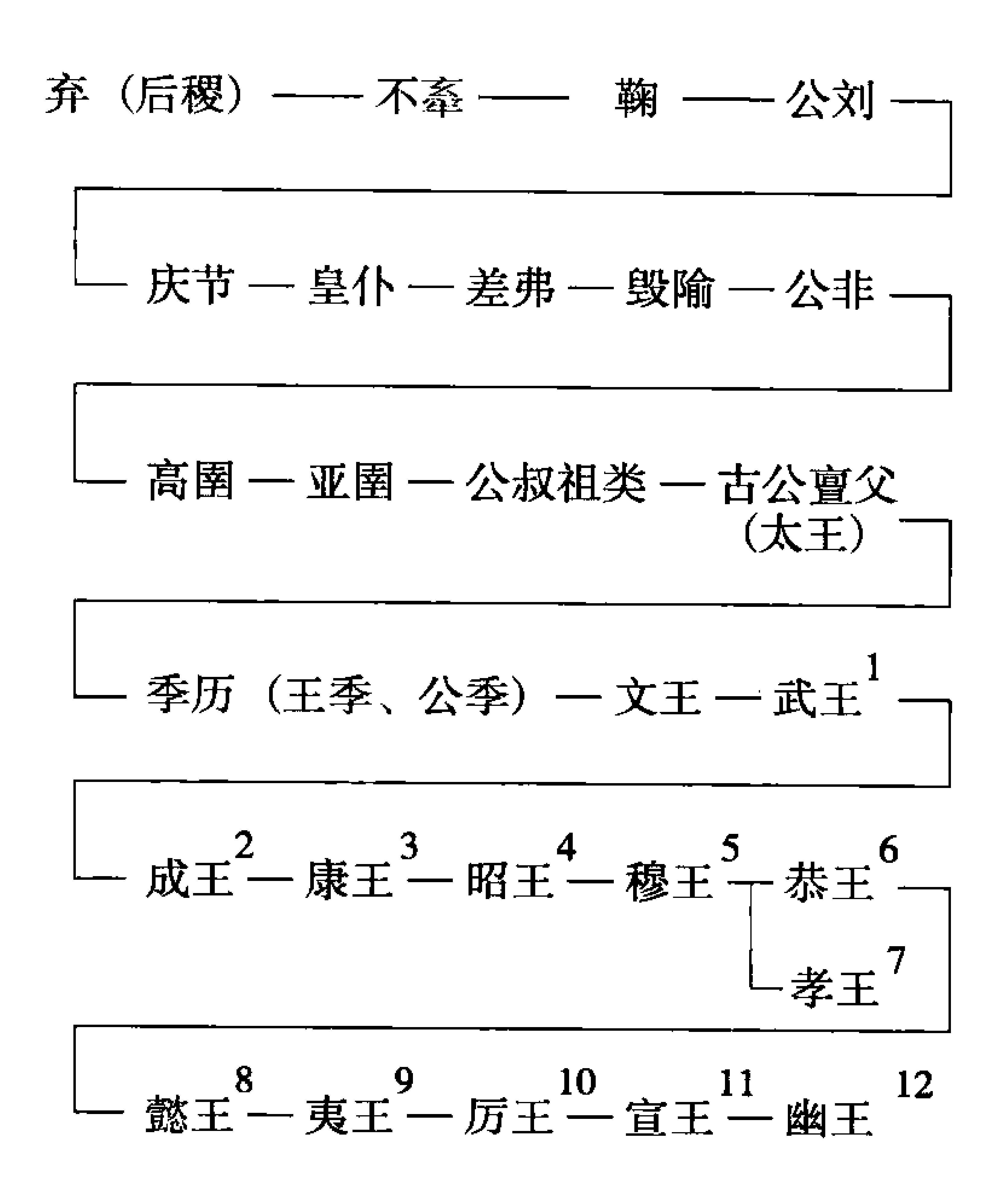
却称为“春秋战国”时期呢？

原来，在西周灭亡至秦朝建立前这一段500多年的历史时期里，“王纲解纽”。东周王朝由号令天下的“共主”，沦为大国诸侯的附庸，却苟延残喘，基本与这段历史相始终。虽然在进行“春秋无义战”的时候，有的诸侯为争霸的需要，还打着“尊王”的旗号，周“天子”居然也假戏真做，重温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旧梦；但随着“陪臣执国命”，“天下争于战国”（《史记·平准书》）的“七雄”混战时期的到来，就再也没人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了。因此，东周王朝只不过是在当时割据各地诸侯国夹缝中讨生活的一个小国而已。在当时各国中，它地盘小、国力弱、影响甚微，已不能作为左右整个中国政局的正朝；而那些较强大的诸侯国，不管是走马灯般昙花一现的“霸主”，还是纵横捭阖、攻交无常的“七雄”，也只不过是割据一方的地方性政权。尽管它们中有的历史比东周还要“悠久”，但哪个国家也没有资格成为整个中国的代表王朝。因此，历史学家把我国这段500多年的历史称为“春秋”（前770—前476）、“战国”（前475—前221）时期。

虽然学术界关于春秋时期的结束即战国时期的开始年代有种种不同看法，但作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时代，是为多数学者一致承认的。正是在这两个时代里，天子倒霉了，诸侯起来了；诸侯倒霉了，卿大夫起来了；卿大夫倒霉了，陪臣执国命……真是天崩地坼，风起云涌，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与新兴的地主阶级在轩然大波中搏斗着、浮沉着，有的沉沦了，有的升华了……新兴地主阶级终于成为时代航船的主宰者——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战国时期结束了。而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正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生的。

东周——一个跼促于河南西部弹丸之地、在群雄的鼻息下讨生活、苟延残喘了500多年的弱小王朝；而“春秋”“战国”——叱咤风云的“五霸”和“邦无定交”的“七雄”，成为500多年历史舞台上主要角色的两个伟大时期。这就是东周王朝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相同与不同。

附录一　周世系表



弃（后稷）——不窋——鞠——公刘
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
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太王）
季历（王季、公季）—文王—武王1
成王2—康王3—昭王4—穆王5—恭王6
孝王7
懿王8—夷王9—厉王10—宣王11—幽王12

附录二　西周大事记

武王

自丰迁镐。

观兵孟津，伐纣预演。

牧野之战，商军前徒倒戈，周军入朝歌。

商朝灭亡，西周建立。

第一次分封诸侯。

建立“三监”。

成王

年幼即位，周公摄政。

武庚及“三监”叛。

周公东征，杀武庚，管叔，伐夷践奄。

第二次分封诸侯。

康叔封于卫。唐叔封于晋。齐、鲁、燕就封。

召公相宅，周公营建洛邑。

周公制礼作乐。

成王亲政。

肃慎贡楛矢、石砮。

氐羌献鸾鸟。

越裳献白雉。

倭人贡鬯草。

与各国诸侯会盟岐山。

楚被封为“子”爵。

康王

征伐鬼方。

晋侯作宫而美，康王使让（斥责）之。

封宜侯。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而不用”。

昭王

伐荆楚，涉汉，遇大兕。

天大曀，雉兔皆震。

伐楚，丧六师于汉，昭王淹毙于汉水。

穆王

伐犬戎。

犬戎贡四白狼四白鹿。

荒服者不至。

穆王西行。

西王母来见。

对淮夷、群舒用兵，东及九江。

作《吕刑》。

恭王

灭密国。

懿王

孝王

封非子于秦，主马政，袭嬴姓。

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

夷王

蜀人、吕人献美玉。

烹齐哀公。

命虢公帅六师伐太原之戎。

与东南淮夷、群舒战争。

厉王

实行“专利”与“弥谤”的高压政策。

国内发生严重的虫灾。

国人暴动，厉王流彘。

共和行政

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确切纪年自是年始。

公元前828年

十年大旱至本年。

周厉王老死于彘。

公元前 827 年

宣王即位，不藉千亩。

宣王三年（公元前 825 年）

宣王命秦仲为大夫伐西戎。

宣王五年（公元前 823 年）

尹吉甫伐猃狁，取得胜利。

方叔伐荆蛮。

宣王六年（公元前 822 年）

召穆公伐淮夷。

宣王帅尹吉甫、大师皇父、程伯休父伐徐戎，至天淮。

西戎杀秦仲。

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 789 年）

伐姜氏之戎，战于千亩，大败。

宣王四十年（公元前 788 年）

丧“南国之师”。

料民于太原。

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 782 年）

宣王卒。幽王宫涅立。

幽王二年（公元前 780 年）

泾、渭、洛三川竭。岐山崩。

幽王三年（公元前 779 年）

褒姒得宠。虢石父掌朝政。

冬大震电。

幽王五年（公元前 777 年）

废申后，立褒姒为后。

太子宜臼逃至申国。

幽王八年（公元前 774 年）

郑桓公友为司徒。

褒姒子伯服立为太子。

幽王十一年（公元前 771 年）

申、缯联合犬戎进攻镐京。

杀幽王于骊山之下。

西周灭亡。

申侯、鲁侯等立宜臼为平王。

公元前 770 年

晋、卫、秦、郑护送平王东迁洛邑。

封秦襄公为诸侯。

郑伯为王卿士。

东周开始。

公元前 722 年

鲁隐公元年，《春秋》编年开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西周史话
作者＝王宇信著
页数＝１６１
ＳＳ号＝１２４１８６１０
出版日期＝２００９．１０